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51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北京



国防大学 2 062 2833 0

(京)新登字 071 号

责任编辑:汪 新 刘昌亮

中共党史资料(第51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35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密云春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6.625印张 150千字

199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6000册

ISBN 7-80023-670-6/K·623

定 价:4.50元

目 录

回 忆 录

忆抗大东北干部队挺进冀中

——兼忆张学思同志 高存信(1)

忆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 栗在山(20)

专 题 资 料

进军大西南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

——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用兵艺术的光辉范例

..... 李兆荣(37)

建国初期的城市工商业调整 徐棣华(54)

邓小平主持的 1975 年全面整顿 张 化(73)

邓小平与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 黄如军(100)

会议介绍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郑世铨(121)

大事记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
大事记(之一)…………… 编写组(139)

史实考订

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写作背景考
…………… 张保山 沈世昌 陈书壮(197)

小资料

与国民党谈判释放张辉瓒身历记…………… 涂作潮(202)

读者·作者·编者

对李志民回忆录《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
几点补充意见…………… 陈鹤桥(205)

忆抗大东北干部队挺进冀中

——兼忆张学思同志

高存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党中央对东北工作很关怀，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指示，统一东北抗日团体，成立东北救亡总会，把关内流亡的东北人团结起来，为收复失地而斗争。党对培养训练东北干部工作十分重视，1939年春，在延安抗大成立了以李延禄为队长、张松（即李范五）为指导员的东北干部队，孔飞、刘鹏、潘纯等同志都是这个队的学员。我当时给这个队讲过军事课。1939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到前方，这个队的大部分同志随抗大到敌后去了。

组建东北干部队，除了党的重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除少数投靠蒋介石反动集团外，绝大多数因为国破家亡，受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趋使，坚决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把日寇驱逐出鸭绿江之东。但在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卖国政策下，他们的正义要求不仅不能实现，有的人还被关进监狱，甚至镇压。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发动，国共合作，抗日御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挺进华北，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取得大捷，给在关内的东北人士以极大

的振奋。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战，主张只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状态，置东北、热河和察哈尔及冀东 22 县于不顾；而中国共产党则提出“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边”的明确主张，所以要求抗日的东北人士，莫不把打回老家去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八路军，很多人更直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当时的东北救亡总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动员输送革命青年到延安去受教育，刘澜波、于毅夫、车向忱、陈先舟、高崇民等东北的老一辈革命者，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1938 年 8 月，高崇民去延安，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接见他的时候，他曾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几个东北干部队，为挺进东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养干部。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意见。

一、东北干部队(以下简称东干队)的建立

1936 年底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逼蒋抗日停止内战而发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将军的四弟张学思还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十期二总队步兵科学习。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思立即被关押起来，直到张学良送蒋去南京后，学思才被放出来。此后，他为恢复张学良将军的自由而多方努力。1937 年春，经过交涉，他获准到奉化溪口看望张学良将军。张将军乘室内无人的短暂时间，悄悄地告诉张学思，要抗日复土还乡，还得依靠共产党。这时张学思已于 1933 年由王岳石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将军不知其情，仍相机嘱咐学思去找共产党，因为这是张将军多

年来为实现抗日复土还乡长期斗争的经验总结。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学思在周副主席的关怀下到了武汉，并与刘澜波、黄显声、宁致远等人在黄显声处开会，酝酿成立新东北军游击干部训练班，地点想设在河南的确山竹沟镇或郾城。经请示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彭雪枫（北方局书记）已经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和他研究。训练班成立应由张学思牵头。”张学思因为有张学良将军四弟身分，又为人正直朴实，思想进步，在东北军中和东北人士心目中有号召力。周副主席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1938年春节前夕，张学思到郾城张公馆的留守处，当时西安张学良公馆的人员已搬到郾城，由副官长张学孟负责。彭雪枫到留守处后与张学思商谈到深夜，彭认为干部训练班不宜设在郾城，确定在竹沟镇，定名为东北抗日先锋队游击干部学习班。派王岳石在学习班负责，内定宁致远为区队长。为组织学习班的工作，张学思亲笔写了不少信。他给贾陶、解如川（现名解放）写信，派王孟夫去东北军挑选学员，要求选思想好，抗日坚决的来受训。宁致远陪张学思北渡黄河到五十三军万福麟部队去选人，并拟在该军的掩护下开办学习班。但走到新乡情况吃紧，他们折回郑州，到郑州正赶上日寇对郑州大轰炸，学思同志从八路军办事处听说黄显声在武汉被捕，同时接到周副主席的通知，让张立即赶回汉口转去香港暂时躲避一下。于是张学思回到汉口只短暂停留，即化名去香港。行前，学思对筹组东北干部训练班问题，重新作了布置，责成以王岳石为首的几位同志留守汉口，继续工作，让在郾城的十几名同志去延安学习，由罗文沿途带队。

张学思到香港、九龙后，接受廖承志同志领导。他在香港积极学习军事技术，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后来学习开坦克。这是他的夙愿，要学好军事本领，听从党的指挥，打回东北去解放全中国。学思在中央军校十期学习时，他所在的二总队，学员 700 多人，他的学习成绩是第一名。该期学员毕业时主持毕业典礼发奖的是冯玉祥，他对学思说：“你考了第一，奖给你一个银盾，上面刻有东北地图，你是将门之后，不言而喻要为收复东北大好河山而努力。”他俩紧紧握手，学思激动得热泪盈眶。

武汉吃紧时，周副主席通知张学思离港北上。周副主席认为，不乘这个时机回来，他就很难到西安，也去不了延安。张学思同志在党的掩护和安排下，从香港回到了武汉，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之后，就换乘飞机到西安。大约是 9 月底 10 月初，张学思到西安七贤庄一号，化名马×德，换上八路军上士的服装，坐汽车去了延安。党为了在政治上积极培养他，让他进马列学院学习，同时在周副主席和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仍负责筹建东干队的工作。经他和金浪白等同志的努力，几个月的时间已联系有 50 多个在抗大学习的同学愿意参加东干队，最后经组织上批准，于 1939 年 5 月开始组建东干队。

1939 年上半年，中央根据敌后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抗大总校到敌后去办。6 月 1 日，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日，举行阅兵式，毛主席阅兵，罗瑞卿副校长进行了动员讲话，他讲了中央决定的精神，阐述了挺进敌后到太行山区去办学校的重大意义。我当时在抗大一大队二队（高级政治队）当队长。全队挺进敌后的各种准备都已作

好，等候出发命令。这时刘澜波和张学思两同志找我谈关于成立东北干部队问题，并就调我去东干队工作征求意见。我表示愿意参加东干队工作，服从组织分配。一周后，抗大一大队大队长苏振华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上确定我到东干队去工作，不随总校走了。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延安新组成抗大三分校。东干队编为抗大三分校的直属二队。直属一队是参谋训练队。

二、在延安抗大三分校的学习准备

6月中旬，我即到东干队任队长。当时罗文同志任东干队副队长，张学思同志仍在马列学院学习。党中央对东干队的组建非常重视，我去后不久，即派去了政治上比较强的红军长征干部为政治指导员，开始是张炽昌同志，1939年12月底换为徐健生同志，徐当时是中央组织部的科长，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在马列学院学习时，与张学思同班，相互十分熟悉。他来队后加强了党对东干队的领导，在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绩。

6月，东干队已到学员60多人，有的来自东北军，有的来自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东北中山中学。他们到延安来，有的是直接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有的是通过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延安分在抗大各大队学习。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经组织上批准调到东干队的。开学时全队共有72名学员，尔后陆续增加到80多人。拟在抗大三分校学习6个月即到冀东组建游击队，伺机挺

进东北。

1939年7月，制订了一个半年教学计划，主要是学军事，学政治。军事方面，重点学习游击战术、军事辩证法，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郭化若同志讲战略学，一般军事课程由队干部讲，参谋业务随直属一队共同听课。政治方面，重点学习社会科学、列宁主义问题。由抗大三分校专门选派干部讲政治课，并请吴玉章同志讲五四运动、中国革命运动史，何培元同志讲哲学，王若飞同志讲马列主义和华北问题，杨松和李延禄同志讲东北问题、日本问题、世界革命运动史。在实际工作经验方面，还着重学习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搞调查研究等等。在学习方法上，重视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到1939年12月，因敌后形势关系，东干队不能按原计划于1940年初挺进敌后，确定延长学习时间。这时，学思已从马列学院毕业回来，在队上任队长，我改任军事教员。他到职后和指导员徐健生密切配合，对工作抓得很紧，使东干队的工作大为加强。他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要求很严，无论工作、生活、学习，都能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背柴背粮，生产劳动，总是和大家一起干。学思组织观念特别强，他在马列学院学习时，有时回队研究队里的重要工作问题，总是先虚心地问我支部的意见怎样？他回队后，重大事情都是事先和徐健生指导员商量，尊重政治干部的意见。学思作风上也很平易近人，能密切联系群众，与大家打成一片，对学员的思想、学习情况，都了解得比较清楚。很多同学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真不象他那个家庭出身的人了，完全变成为一个很有修

养的共产党的干部了。”当时我俩住的窑洞中间是通着的，他总是夜很深了仍在看书学习，他那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令我十分钦佩。1940年，东干队又制定了一个半年学习计划，政治课增加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矛盾论》，军事课增加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等内容。到七八两个月准备向敌后挺进的时候，更着力解决如何提高学员参加敌后斗争实际能力的问题，并专请自敌后回延安的领导同志如宋时轮、舒同、孙志远等同志，作总结、讲授敌后实际工作经验和抗日游击战争经验的专题报告。这段学习收效显著，给学员以后参加敌后残酷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学习，不仅在军事、政治理论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尤其是大大提高了学员的党性，树立了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念，坚定了为党的事业而牺牲奋斗的决心。特别是当时东干队的成员并不都是东北人，在总共13个省市籍的学员中，东北籍学员只占了70%。学员们之所以愿来东干队，都认为解放东北是全党的责任。东北干部队顾名思义，目标明确，不仅挺进敌后，而且要挺进东北，东北受日寇统治多年，环境十分艰苦，特别是南方的同志，到东北去得不怕冰天雪地，这对他们的革命人生观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同志们不怕艰苦，不怕危险，一心要到最艰苦的东北，为驱除日寇，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当时全队团结一致，思想统一，劲头十足，组织纪律强。在抗大的一些集体活动中，东干队这个小队伍，走起来整齐划一，唱歌雄壮嘹亮，文体工作活跃，充分体现了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很象是经受过革命坚强锻炼的队伍。1939

年底,东干队在抗大三分校被评为模范队。

1940年9月,东干队即将挺进敌后,8月,中央组织部已决定政治指导员徐健生同志不随东干队到敌后去,改任我为指导员,但徐健生同志始终认真负责,一直工作到我们出发。全体同志对他都非常留恋。

三、挺进敌后的路上

1940年9月14日,东干队的同志们武装整队出发开始挺进敌后,行前我们再次向巍然屹立的宝塔山肃穆致敬,同在延河畔上许多送行的同志们握手告别。这时东干队除调出和临时决定留在延安的外,还有87个同志,其中干部85人(另有炊事员和勤务员各一人),编为3个区队9个班,副队长仍是罗文,区队长是史存真(现名林千)、杨国治和王军。队伍出发后第一天即走了60多里地,晚间宿营于青化砭。但由于过去长途行军锻炼较少,加上负荷量大,少数同志脚上打了血泡。为此队里及时组织起医疗小组,每到宿营地后,便进行检查,热水洗脚,保证行军。队里还组织了拉拉队,沿途宣传鼓动。

我们经过蟠龙、瓦窑堡,在九一八事变九周年纪念日那天,正好走到清涧,还开了纪念会。这个会也成了鼓动同志们挺进东北的动员会,虽然在崎岖的山路中已行军五天,但大家都忘掉了疲倦,晚会一开始,首先唱“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我们到处流浪……”歌声引起同志们的思念和悲愤,不少同学叙述了自己流亡经历,深感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更激励起挺进东北抗战到底的革命意志。当人们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和《游击队歌》时，那雄壮的歌声，顿使人心情振奋，抗日必胜信心倍增。

经一周行军，同志们已锻炼出来了，以前每天行军60里感到很累，这时每天行程增加到七八十里，也不觉得累了。我们经绥德（未进城）、米脂，在葭县过黄河。在波浪涛涛的黄河激流中，掌舵老艄公带头喊号子，指挥着船夫们与波涛搏斗，过了流最急浪最高的河中流，大家高兴得和船夫一齐唱起《黄河大合唱》中的船夫曲，真是身临其境，壮怀激奋。过黄河后，于10月初，我们到达一二〇师驻地兴县。

我们在兴县稍作休息，作过同蒲路的准备，这期间一二〇师也要和晋察冀军区联系，作接送我们的安排。在我们再次踏上征程前往晋察冀的前两天，一二〇师举行了欢送晚会，欢送我们挺进敌后。参加会的有贺龙、关向应、甘泗琪（政治部主任）、周士第（参谋长）等领导同志。贺龙同志在大会上讲了三条，党成立东干队的意义和东干队将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东干队的希望，说了很多鼓舞的话。关向应政委也在会上讲话，大意是：东干队经过党的培养，现在要到敌后去，希望东干队到前方发挥更大的作用。抗日战争是正义的事业，你们到前方不是靠你们几十人，而是依靠千百万群众，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抗日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同时要依靠那里的党，很好地接受党的领导，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过鸭绿江，收复东北失地。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的讲话，再次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周士第同志则专门讲了如何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

争的问题。

在兴县停留的八九天中，我们还抓紧时间作发展党员的工作，根据行军中的表现，讨论了几个同志的转正，并新确定了一批培养发展对象的名单。

10月14日，我们从兴县再次出发，由岚县、静乐之间，先过汾河，水深没膝，水凉透骨。过河之后，即向云中山挺进。带领与掩护我们过路的是一二〇师六团，团长是黄新廷同志，他每天都以急行军的里程（90—100里），率领我们前进，有意的加强对我们行军能力的锻炼。同蒲铁路比较难过，路两侧是敌占区，敌人把路两侧的村里人大都赶走了，形成相当长的一段无人区，无人区以外是游击区，敌我双方都经常到这些地区活动。按行程计算，穿过同蒲路的敌占区、两侧的无人区和游击区，到达晋察冀根据地一共要走180多里。我们过路的前一天住在游击区的边上。第二天午饭后，我们出发穿过游击区，傍晚到达山脚下的无人区，队伍坐下休息，不能做饭，吃的是自己背的干粮。

过同蒲路时，六团组成前后两个梯队，我们在中间。当时队里的组织工作做得比较好，根据同志们的体力强弱组成互帮组，五个女同志分别编在五个班里，每人都有二三个男同志负责帮助。过路那天晚间多云，但能不时见到星星，为了保证行军，每个同志的背包上都蒙上了白毛巾，这样后面的人容易识别，不致失去联络掉队。出发前，队长和指导员作了动员，说明过的是无人区和敌占区，不能掉队，掉队就很难走出来，有被敌人俘去的危险。同志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那天过午即出发，开始一段路还好

走，到天黑之前进入山区，六团领着我们跑步上山，同志们虽跑得气喘嘘嘘，两眼发黑，但是都咬紧牙关，克服困难，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一个跟着一个，一步也不放松，紧紧跟上。

云中山山路崎岖，陡而且窄，很难通行。一路上，上上下下，过了好多沟，大家都一个个紧紧相跟，没有一个掉队的。渐渐地到了平原地，约在夜间十二点多钟时，我们快步走到铁路边，队伍静静地停下来等待过路。但不一会儿，从排头传回口令，以尾作头，迅速按原路向回跑步走。同志们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跑了五六里地，停了下来休息，才知道送我们的~~一二〇师~~六团和接我们的晋察冀十九团，在~~约定地点没有碰上~~，铁路两侧危险，不得不暂时向后退。

跑了多半夜，利用~~这个时间~~才休息了一下。在这茫茫的黑夜里，同志们最感~~困难的~~得~~难受~~当时每班备了两个水壶，在游击区灌~~的水~~，~~同学们你让我，我让他~~，早已都喝光了。行军中间虽然越过许多条沟，但一个有水的沟也没有碰到。这时候虽然肚子已经饿了，但是没有水，什么也吃不下去。一二〇师在晋西北都是吃小米黑豆，为了照顾我们过路，拨给每人几斤白面。我们没有经验，把它烙成饼，怕路上没有菜又放了点盐，这样更不能下咽了。这时，我们才体会到，没有水比没有粮食更难过。夜静静的，只有从远处的村庄中传来一声声的狗吠声打破了寂静，秋夜的空气虽潮湿浸人，但不能解渴，同志们没办法，只有趴在地上吸地里散发出来的凉气，以湿润肺喉。

约莫等了 30 分钟，同志们正心急如焚，忽然一个命

令传过来，起立整队，跑步前进。这样一个喜讯，同志们都很高兴，不顾疲劳，不顾饥渴，一个跟着一个拚命地跑，不一会儿跨过了两根绵延无际的铁轨，这就是忻县平社以南，我们过铁路的地点。过路以后，继续跑步到一个村边，队伍停下来，十九团和六团办了交接。十九团从晋察冀赶来了许多骡子，驮的是棉花、布匹和盐巴。这些东西是从冀中、冀西送往晋西北和延安的。然后两个团又都急匆匆地分别向各自的目标前进，这时已经是凌晨二点多钟了。

我们随晋察冀十九团继续快步行军，敌占区的狗吠声连连不断。走到拂晓，我们又跑过一段平路，越过一座小山，天亮之后走到山凹里的一个小村。村里无人，有一口井，这是无人区。学思同志和十九团的同志分析了情况之后，决定暂在这里稍稍休息一下，山头上放出了哨兵。同志们用喂马的帆布桶，到井中打水，分给同志们喝。开始打的几桶是清的，以后就都是发黄的汤了。但由于渴得要命，不管泥不泥的也都喝下肚子了。正喝得起劲的时候，山下有机枪响，山上的哨兵打着旗语，在山头上已发现附近据点的敌人有向这个方向出动的模样。学思同志命令队伍立即整队跑步前进。虽然人们都已走了一天一夜，但在敌情面前，个个精神抖擞。走过了一段山路之后，甩掉了敌人。

午间，我们到了滹沱河一条支流的边上，啊！清清的河水，潺潺地流。同志们高兴极了，来不及拿缸子就用手捧着水大口大口地喝，尽情地喝，直到喝得不能再喝，才又整队出发。下午三点多钟，到了西烟镇。这里柿子特别多，从延安出来第一次遇到，大家都争先购买，吃了不少。

队上打前站的江波、刘云鹤、乔兴北等同志早已到达，并为我们准备了饭。我们在这儿饱餐一顿。这里已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边上，也是我们预计的休息地。但由于过路时可能已被敌人发觉，十九团的同志认为这里还不安全，再往根据地内走一段才好，队里决定吃饭后再前进40里。同志们已经连续走了190多里路，再走就不像在过同蒲路时，走的那样整齐了，有走快的，有走慢的，九点多钟，明月已经上了树梢，有九个同志最先到达了山沟里我们的宿营地，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就是张学思同志的爱人谢雪萍同志，这就可以看出她坚毅不拔的毅力。也有几个掉队掉得远的，最后不得不在经过的村中动员一辆车，把他们拉到了目的地。这近两个白天和一个夜晚连续行军，足足走了230多里。宿营后，各班烧了热水洗脚，队里决定再做一顿稀饭。大家边喝边说。这次连续行军，对同志们是一次毅力和体力的极大考验。

四、到达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

我们到了山西盂县的焦谭庄，这里是晋察冀二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接见了我们队的领导同志，分区还请我们会了一顿饭。休息两天，我们动身从山西到河北，一路下坡，腿都走软了。走了三天，终于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平山县陈庄。这已经是1940年10月下旬了。平山县北部到阜平地区，是根据地的首脑机关经常住的地方，群众条件非常好。当时秋忙季节仍未过去，人们都在忙于打场和收藏粮食；山上的柿

子树、黑枣树和酸枣树，也都结满了累累果子，正待收采；街上还有卖大饼和卖面条的，比起陕北来要富裕一些。我们到这里是第一步的目的地，一方面要大休息，另一方面还要决定我们下一步向那里去。平山的气候正是秋高气爽，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季节。同学们越过同蒲路到了晋察冀，情绪也特别活跃。

在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张学思，学思同志则把写在一张旧信纸上的毛主席亲笔写的介绍信面交给聂司令员。内容大意是：荣臻同志：兹介绍张昉同志（是张学思的化名）来你处，张昉是张学良的兄弟，是张学良所喜欢的弟弟。这个同志到延安后，表现很好。由他率东干队经晋察冀，相机向东北挺进。希您多注意对他培养帮助，并酌情安排。

聂司令员看过信后指示说：东干队经冀热辽去东北，从现时情况看还不行。已请示中央军委，拟让东干队留在晋察冀军区，先到冀中军区去参加工作，以后看情况再说。学思从聂司令员那里回来把这个决定只向我一个人讲了，未向下面传达。毛主席给聂荣臻同志的这封介绍信，学思没有给我说过，尽管当时他是队长，我是指导员，而且他也没有跟自己的爱人谢雪萍讲过。直到1982年新年前后，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原在冀中工作过的老同志开座谈会，在闲谈中，我才听到当年聂司令员接见张学思时在场并看到过这封信的参谋张元泰（现名张侠）讲起这件事。从学思对毛主席这封信严加保密，说明他谦虚谨慎，不吹嘘突出自己。毛主席对他的评价，他都保密起来，从不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来炫耀自己。这是学思同志的党性

与高尚品德的表现，很值得现在的人们深思和学习。

我们到晋察冀军区后，政治部组织了晚会热烈欢迎我们，在晚会上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彭真同志。过了两天，聂荣臻和彭真两位领导同志又一起接见东干队的全体同学，聂老总给我们报告了全国抗战形势，彭真同志报告了敌后根据地的形势。当时正当敌情紧张，工作繁忙之际，这充分体现了晋察冀军区首长和党组织对我们东干队的关怀。在休息的几天中，军区还为我们组织了篮球比赛和表演。很快敌人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开始了，这是百团大战后日寇对华北军民的报复“扫荡”。军区决定让东干队归抗大二分校指挥，跟抗大二分校一起反“扫荡”。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是一位严格治军，水平较高并具有优良作风的党的高级干部，他善于打游击，侦察工作做得细致，对敌人情况及其活动规律都摸得比较清楚。由于学校本身没有什么战斗任务，以保存自己不受损失就是胜利。所以孙毅天天领着我们兜大圈子，经常是白天在山沟里休息隐蔽，夜间行军百八十里，有时攀爬陡峭的高山，有时跨越稻田，在过田埂时，后面的人排队站在那儿打盹等着前面的人通过，后面的人过了田埂就猛跑追赶队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追上队伍为止，否则掉了队，那就有可能失去联络。特别是我们东干队第一次遇见敌人大“扫荡”，地形、群众情况都不熟悉，尤其怕在反“扫荡”斗争中脱离本队失去联络。敌人这次“扫荡”将近一个月，我们绕了20多天的圈子，始终未让敌人的战斗部队“咬”住过我们，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五、驰骋在冀中平原

反“扫荡”之后，学思同志把中央军委关于东干队先留在冀中军区分配工作的指示向全队宣布，并进行了动员。大家一致拥护，愿意在平原上参加游击战争。由此我们即准备过平汉路到冀中军区去。平汉路比同蒲路好过得多，它虽然处于广大的平原之中，但敌人没有形成封锁面，而仅仅是一条封锁线，有的地区连封锁线也说不上。我们在铁路沿线的村庄颇有工作基础，领我们过路的向导，就是铁路两旁村庄拥护我们的基本群众或党员，他们虽然手中敲着锣，嘴里喊着“平安无事！”好像是在给敌人放哨，实际上却是在给我们指路和护送。11月底，我们胜利地越过了平汉铁路，抵达冀中军区机关驻地定县的甄村。在我们到达前，冀中军区早已接到中央关于东干队到冀中分配工作的电报。我们到达后，军区领导机关为我们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沙克副参谋长都讲了话，欢迎东干队到冀中区工作。

冀中区又是一种样子，崇山峻岭看不见了，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平原，村庄比较密集，物产丰富得多，更新奇的是大车道都挖成了纵横交错的道沟，这也使我们深深领会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确实是存在于群众之中，是群众智慧和力量才把平原变成了“山”。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这儿环境还不很紧张，军区机关在一个村庄还可以住上五天到一周，有时还可以住十天以上，偶而也有因敌人突然出动，军区机关在一个地方住二三天就

得转移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军区机关刚刚住下，确定火线剧社给我们演《日出》，台子搭好了，汽灯点上挂起来了，队伍都整队集合坐下了，附近各村群众纷纷来到台前，等待开演，突然发生敌情，附近据点敌人出动了，军区领导决定停演，拆掉戏台，立即转移。这正体现了敌后平原上坚持游击战争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情况来得快，随时要有转移的准备。过了这年的元旦，我们随军区机关到达了安平县的佟家羽林。这一个时期队里主要是做好分配学员的工作；对于表现好的发展对象，批准他们入党；并分别从行政工作、支部工作进行总结，结束东干队的工作。总结之后，我和学思同志还进行过交谈，总的来说，我俩在工作配合上是密切的，感情上是团结融洽的。我觉得学思同志在工作中很突出的一点是党的观念强，总是把自己置于党支部领导之下，队内一切重要事情，没有不经过支部讨论而由他作决定的，就是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支委会也是照常开。在东干队胜利完成向敌后挺进光荣任务的整个过程中，一切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与党支部对全队工作的领导与保证是分不开的，而这其中学思同志是起了主导作用的。

东干队当时到冀中军区的干部共 84 人，分到司令部的军事干部 47 人，这部分同志大部是来自原东北军的军事干部和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炮兵学校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事干部，特别又在抗大受到革命军事理论和参谋业务的专门培训，军事素质都有一定基础，参加冀中工作后对于加强冀中军区司令部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干部中分配到政治部的有 33 人，分配到卫生部

的4人,他们大都是上过大学或中学的知识青年,有的经过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抗大、女大培训,有的是从石友三等部队中撤回的政工干部,这部分同志在政治工作和马列水平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参加工作后对加强冀中军区的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这84人中还有三名朝鲜同志,即:高建基、张志民和吴明星,根据他们会日文的特长,分配在政治部敌工部工作。1941年冬,十分区抓到一个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少将,王乃天同志审讯他时,翻译就是东干队的朝鲜同志高建基。朝鲜同志在冀中从事抗日工作热情都非常高,他们不怕生活艰苦,不怕环境残酷,与中国同志一起战斗在冀中的广大平原上。吴明星同志在1942年极其残酷的反扫荡中光荣牺牲在冀中。日本投降后,高建基和张志民同志返回怀念已久的祖国,后来他们都成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高级干部。东干队的同志们,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在创造铁的党军中绝大多数被评为模范干部,受到了奖励。随着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胜利反攻,他们大部分随军挺进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实现了他们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的宿愿;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又在辽沈、平津、淮海和渡江等战役中随部队转战于大江南北和祖国各地,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祖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在战争中光荣牺牲的有周复、詹金泉、雷吼、高鲁、戈军、刘寒、齐英、贾白水、常攻、马斐文、吴明星(朝鲜籍)、辛冷、张克己、邢纪东、谢东平等15位同志;长期工作积劳成疾而病故的有刘金声、鄂立克、朱德宝、崔德胜、冷戈等12位同志;张学思、杨再田、石拓、欧阳飞四位同志,在十年

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其他同志,现在大部是我党的高、中级干部。当然,革命潮流中也有泥沙混杂的不坚定分子,在那残酷的抗日战争中,东干队也有两个人被俘后动摇,成为可耻的投敌分子。

在冀中军区学思同志被分配担任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我分在作战科,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由于他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政治思想水平,工作很有魄力,善于筹划,细致认真,勤于督导,身体力行,作风朴实,成为吕正操、程子华等首长的得力助手,在司令部机关是一位有威信的领导。在司令部工作的建设方面,他在认真了解原司令部工作的基础上,针对冀中平原的工作特点,主持建立和健全了参谋人员专业知识的军事学习制度,提高参谋人员的战术素质;还主持建立了一系列工作规章制度,使大家明确职责,又注意互相协作,工作秩序井然,这些对于首长掌握和分析敌情,以及下决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以身作则,强调守纪律,听指挥,反对游击习气,并作到赏罚严明。他也非常强调团结,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在学思同志和大家的努力下,司令部的面貌确实出现了一个紧张团结、认真钻研业务的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东干队的同志们在冀中军区正式分配工作后,整个东干队就算正式结束了。自此,抗大东北干部队便成为一个历史名称,但作为这段历史的身历者和见证人,我把它写出来,一方面是提供一点有关抗日战争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我对老战友张学思同志的无比怀念。

忆党和国家领导人 视察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栗在山^①

1958年3月的一天，空军干部部的同志通知我，让我到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办公室。肖副主任对我说：军委决定让你到正在筹建的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当政委，你到炮兵大院去找孙继先吧。从此，我便踏上了国防尖端科研事业的道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筹建机构，组织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平沙万里绝人烟”的戈壁滩，我自己在那里一干就是12年。

早在50年代初期，面对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毛泽东主席说：“我们现在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毛主席的决策下，党中央在我国国民经济还非常困难，科学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独立自主发展我国的国防尖端武器。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叶剑

^① 作者于1959年2月至1970年4月任第20训练基地政委，本文是他对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基地情况的回忆。

英、聂荣臻、黄克诚、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这个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基地组建初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亲自批准靶场选点方案。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多次主持召开军委会议，确定靶场建设的基本原则、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并确定靶场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训练基地。1958年10月他赴西北视察时，还在酒泉专门听取了孙继先关于基地工程建设的汇报。陈云副总理亲自为靶场第一期工程建设审批经费，调拨物资器材。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多次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开会，研究解决基地工程建设和组织机构的各种具体问题。在基地场区移民和划定军事禁区过程中，我与孙继先、张贻祥找到乌兰夫副总理，他更是给予了全力支持。基地正式组建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仍然非常关心基地建设，他们在日理万机之中多次到基地视察，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中央领导的热情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就没有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腾飞；没有导弹、原子弹尖端武器的发展，就没有象今天的人民中国在世界上这样一个地位，也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么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来搞社会主义建设。

周恩来总理的殷切期望

1965年3月的一天，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在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的陪同下，在访问了尼泊尔、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之后，途经基地 14 号机场，在基地视察一天。初春的戈壁，乍暖还寒，冷风刺骨，陈副总理不顾多日出国访问的辛苦和飞机颠簸的疲劳，一下飞机就去视察基地的技术阵地和发射阵地。他非常平易近人，见了干部战士就问长问短，尤为关心大家的的生活和工作，到了哪里就给哪里带去一片欢声笑语。当天下午，陈副总理向场区全体干部作了国际形势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副总理在讲话时很幽默地说，你们赶快把“两弹”搞出来，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这句话一直铭刻在我心中，它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尖端武器的发展对于提高和增强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陈副总理临走时还对我们几位送行的基地领导说：你们在戈壁滩能把基地建成这个样子，真不容易，有机会我让总理也来看看。

1965 年 6 月 1 日，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途经基地 14 号机场。这天，机场上空碧空万里，阳光明媚。11 时 57 分，一架银灰色飞机徐徐降落在 14 号机场。周总理与陈副总理站在舷梯上亲切地向大家招手致意，随后走下飞机，与我们一一握手，并与前往欢迎的基地领导合影留念。总理说：毛主席工作很忙，来不了这里，我们来看看大家，毛主席很关心这里的建设和试验任务。你们的事业是很光荣的！总理为我们带来了党的关怀，带来了毛主席的关怀，我们听了非常激动。

在基地第二试验部接待室里，总理详细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姓名、职务、简历。他对大家说：“你们战斗在戈壁滩，掌握我军的尖端武器，一定要搞好。这里靠近河西

走廊，是当年红西路军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有了尖端武器，我军就无敌于天下，红西路军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总理还问：“你们都是什么文化程度？”张贻祥副司令员回答说：“我们没上几天学，文化不高。”总理听了指示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后来有了飞机、大炮。过去你们谁见过导弹？现在你们亲自发射导弹，还不都是在实践中学来的吗。今后我们还要发射人造卫星，凡是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所以，我们要注意学习。”当我们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介绍到部队刚进场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我们就组织部队自己动手搞建设，在戈壁滩开展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创造条件改善部队生活，一方面为国家分担些困难，减轻国家的负担。总理听了很高兴，称赞我们做得好。

吃过午饭后，基地二部的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在通往机场的道路两旁夹道欢迎总理。这天，正好是国际儿童节，二部组织幼儿园的小朋友站在队伍前面。周总理走到他们中间，抱起一个小朋友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齐声说会唱，总理亲自指挥着，与孩子们一起唱起了歌，13时10分，总理登上了飞机。我们凝视着远去的飞机，直到看不见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机场。

6月9日，周总理结束出国访问，乘机从卡拉奇回国，于23时12分再次飞抵基地14号机场，第二天早晨回京；6月18日，周总理又一次出国访问，在基地作短暂停留；7月7日，总理回国，途经基地只停留了24分钟便

飞抵北京。他每次路过基地，国防科委都先通知我们。因为总理工作繁忙，不能久留，有时是在二部驻地吃顿饭就到了机场，有时就在机场接待室见见基地领导就又匆匆上了飞机。总理每次到基地，时间虽短，可在这有限的的时间里，他一分钟也舍不得休息，认真听取我们的汇报，了解基地科研、试验和场区建设的情况，询问干部战士、职工家属的生活。有时让我们拿出场区分布图，他看得很认真，问得很详细。即使是吃饭，总理也是边吃边问。我们都被他那种废寝忘食、不辞劳苦、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所深深感动。

1966年6月下旬，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之后，于6月30日经由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回国，并于当天下午14时40分到达基地。这次总理在基地视察了一天。他一下飞机即不顾疲劳，在基地第一招待所接待室听取了我们几位基地领导的汇报，还与正在基地检查工作的总参谋部杨成武代总长谈了话。接着，又参观了地地导弹发射阵地和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的实弹发射。当导弹喷着浓烈的火焰，直刺蓝天时，总理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遮着光线，全神贯注地看着导弹在天空飞翔。导弹准确地命中目标后，总理热烈鼓掌，并向我们表示祝贺。他那朗朗的笑声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晚餐时，总理端着酒杯和一盘切好的苹果走进厨房，我看到后，急忙跟在总理身后。正在忙着做饭的炊事人员一看总理来了，一时激动得不知怎么才好。总理热情地招呼大家，给每个人斟满了酒，然后一一碰杯。听着总理那

高亢有力的声音，望着总理那高大的形象，在场同志一个个眼泪夺眶而出。在为总理组织的晚会上，他亲自打拍子，与大家一起唱《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总理外出散步，在干部战士中间谈笑风生，嘘寒问暖。我们在总理身边，毫不拘束，心情格外舒畅。

第二天上午，周总理由杨代总长和基地李福泽代司令员陪同，空中视察了场区以北居延海、黑城子、乌苏木、赛善桃来等地，还视察了兰州军区的防务工事。回到招待所后，总理对我们说：这个地方很有前途，设防还要开发这一地区，从河西走廊至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带沿着黑河流域进行屯垦、放牧，建设大量的农场、牧场，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你们把甘肃省的领导找来，在一起好好研究研究。总理还指示：大庆是学解放军的，解放军也要学大庆；人家是红旗，你们也要成为红旗，而且是特等的红旗。总理这些深刻而亲切的教诲，为基地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多么宏伟的远景，他对基地的长远建设抱有无限的期望。

周总理心里时刻装着群众，关心着战斗在戈壁滩的干部战士。在临上飞机前，杨成武代总长、基地李福泽代司令员和我陪同周总理乘敞蓬汽车接见了基地和在场区执行国防施工任务部队的干部、战士、职工和家属。总理非常谦虚，我让他站在中间，他说：你是主人，应该站中间，我在边上便于见群众。总理站在右边挥动着右手向群众亲切招手，所到之处一片欢腾，到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周总理深切关怀着我国国防尖端事业的发展。基地

每次进行重大试验,他都要亲自听取汇报,仔细询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批准发射试验的方案。进行重大试验时,他更是日夜守候在电话机旁,及时作指示。他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一直挂在我们基地技术阵地的墙壁上,挂在高高的发射塔架上,挂在各种测量仪器上,铭刻在我们的心坎上,时刻鼓舞我们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

196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及蔡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查了西北四省、区的工作后,同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及陕、甘、宁、青的省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一行40余人到基地视察。专列到达基地机关驻地附近的列车停靠点时已是深夜。邓总书记为了不影响部队休息,决定在火车上过夜。随行的余秋里、赵尔陆下车见到我们说:你们这里条件艰苦,吃住都不方便,就不给你们增加麻烦了。明天早上你们向邓总书记和李、薄副总理汇报一下情况我们就走。我说:我们这里有招待所,吃住都不成问题,干部、战士都盼望着能见总书记呢。我们陪同余秋里、赵尔陆等同志到基地第一招待所后,他们说:你们这里条件还不错,明天早晨我告诉总书记,让他住下来,到处走走看看,第二天一早,赵尔陆告诉我:我们不走了,都下车。邓总书记下车后,兴致很高,同我们前去欢迎的几位基地领导亲切握手后,他

对我们说：原来这个导弹靶场建在这里，组建时还是我批的。这里很艰苦，你们在这儿当无名英雄。

当听了我们的工作汇报后，邓总书记又说：你们这里建设的很不错，过去是风吹石头跑，现在有了铁路、公路、树木，不会飞沙走石了，这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但现在看来这个地方离边疆太近，属于一线了，应该再到三线选择新靶场。邓总书记还问附近的山延伸有多高、多远？李福泽代司令回答说：东西长 50 多公里，纵深比较大，山最高是 300 多公尺。邓总书记说：这样高够了，可以防御。他还指示我们要抓紧三线建设，说阿坝是个大草原，看来可以考虑。

邓总书记一行在 3 号发射阵地参观了地地导弹操作表演，在 17 号阵地观看了地空导弹发射。发射成功后，邓总书记和李、薄副总理充分肯定了我国战略武器研制的迅速发展，高度评价基地干部战士的创业精神。回到 10 号区后，我们陪同邓总书记沿着黑河散步，他说：这里的地下水很浅呀，戈壁滩只要有水，就可以发展生产，你们要多栽树，一颗树就是一个小水库。树栽多了，将来气候就变化了。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说：这块地方要搞好，我回去后，搞些部队来，与乌兰夫同志合作，共同搞好这块地方。

第三天，邓总书记接见了基地首区^① 12000 多名官兵、职工和家属，所到之处，干部战士夹道欢迎，情绪热

^① 弹道导弹发射试验除要有一个发射区即首区外，还要有一个降落区即尾区，当时尾区官兵在千余公里之外，没有参加这次接见。

烈。之后，邓总书记和李、薄副总理一行同基地 18 级以上干部以及基地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代表 500 多人一起照了相。

其后，遵照邓总书记的指示，我们一直把植树造林作为场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每年春节都要发动全体官兵斗戈壁沙石，战狂风寒流，挖沟换土，栽树种花，美化营区，逐渐把昔日春风不度的荒漠戈壁，建设成了一片“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的沙漠绿洲。

叶剑英元帅亲临基地设防

1964 年 9 月 21 日，叶剑英元帅为西北设防问题到基地视察。叶帅在 14 号机场下飞机后，握着我的手说：我没来过这里，今天来看看你们。当我们乘火车从机场到位于基地中心区的第一招待所后，他不顾劳累，让我们陪他到处走走。我们边走边向他汇报基地的情况，他听了高兴地说：我坐飞机一过银川贺兰山，就是戈壁滩，没有树，光秃秃的，实在难看，到了你们这里不象戈壁滩了，是个很漂亮的城市。

当我们在招待所接待室拿出地图向叶帅汇报了场区周围的设防情况后，他说：这个地方古时候是居延塞呀，居延海北边就是要塞，汉武帝时就开始在这里设防，象你们基地中心区周围的土堆子叫烽火台，沿着黑河往下游叫溺水，两侧有些土围墙叫遮虏帐。黑城子、绿城子都是屯兵的地方。现在我们也要在这里设防，从济南军区、兰州军区调部队到这里进行设防。我们有两个基地，一个是

你们 20 基地，一个是 21 基地，这是检验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国防力量达到了什么水平的标志。你们不要把它简单看作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你们搞出“两弹”（原子弹、导弹），在人家看来，我国的工业水平上升了，国防力量增强了，那我国的国际地位就提高了，我们的祖国就更不容易受到侵犯，世界和平也就更有保障。你们这个基地很重要，所以要设防进行保护。

22 日，叶帅观看了第 4 发“东风 2 号”地地导弹的发射试验。发射成功后，他在阵地上接见了发射连全体指战员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叶帅高度赞扬了基地在导弹试验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危，关系到世界和平。试验中你们一定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千分之一厘米，万分之一厘米，一点都不能差。”他勉励大家：要鼓足自己的勇气，开足马力，把我们的时间缩短一点，尽快实现我国尖端技术的突破。

当晚，我们为叶帅组织了欢迎晚会，叶帅利用这个机会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员，了解他们的情况，问他们在这里工作是否安心，家里有什么困难等。23 日，叶帅在基地连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基地各方面的工作都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这个地方越是艰苦越要把它建设好；我国尖端技术越是落后越要搞上去！”这谆谆教诲，令我们终生难忘。

聂荣臻元帅指挥我们搞试验

1960年9月10日,是基地首次成功试射苏制P—2近程地对地导弹的日子。这次发射试验的成功,全面考验了部队的技术水平和试验能力,使大家彻底克服了迷信、依赖思想,极大地增强了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念。继苏制导弹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又下达了执行发射仿制苏联P—2导弹制造的国产“东风1号”导弹的试验任务,要连续发射2发战斗弹,1发遥测弹。1960年11月4日,技术阵地完成了第一发导弹的测试,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亲临基地,亲自组织指挥这次发射任务。

11月4日下午,聂帅乘专机飞抵基地14号机场。他健步走下飞机后,与我们前去迎接的基地领导和7169部队领导一一握手,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在苏联专家撤走不到一个月,就成功发射了苏制导弹。在乘坐进入基地机关所在地的火车上,聂帅不顾疲劳,急切地了解导弹在技术阵地的测试情况。基地孙继先司令员、李福泽副司令员作了简要汇报后,聂帅严肃地指出:这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导弹,试验工作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各级党组织要对每个参加工作的人员进行思想动员和采取组织保证措施,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天,我们就将聂帅的指示向部队作了传达。广大参试人员一致表示要坚决做到“稳、准、好、细”保证圆满完成试验任务。

5日晨,聂帅及其随行人员赶赴3号发射阵地。朝阳

映照在戈壁，远远看去，耸立在发射台上的导弹就象一颗绿色宝石镶嵌在空旷的戈壁滩上，经晨光照射，闪闪发光，十分壮观。到发射阵地后，聂帅兴致勃勃，他叮嘱发射中队的同志：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就要从你们手中起飞，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党信任你们，人民信任你们，现在就看你们的了。在我们的提议下，聂帅高兴地与发射操作人员在即将起飞的导弹旁合影留念。接着，基地举行了发射剪彩仪式，聂帅为发射剪彩。

隆冬的戈壁，寒风凛冽，可大家高涨的热情驱走了寒意。发射时刻到了，当时，人们都在离发射台几百米的硬戈壁上观看发射。我们陪同聂帅、张爱萍、陈士榘、钱学森、方强等领导同志就站在阵地附近一个活动房跟前，拿着望远镜观看发射时的壮丽景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广大参试人员兴高采烈，纷纷涌向发射台，阵地上一片欢腾。当天下午，在基地第一招待所小礼堂举行的祝捷宴会上，聂帅激动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

1966年10月25日，聂帅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第二次飞抵基地，指挥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5日夜场区将有强寒流和20米/秒以上的大风，直接影响着发射准备程序的顺利进行。聂帅到达基地后，立即召开了试验临时党委会，听取了导弹、核弹头测试情况和气象部门的汇报。聂帅说：我来之前，毛主席对我说，你过去是打胜仗的，这次也可能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怕。毛主席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打无准备的仗。这

次试验前三发“冷试”是顺利的。所以“热试”时一定要更谨慎。聂帅同意按原定程序进行弹体转运、加注燃料和发射，但组织要更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要绝对准确，一定不能出差错，并要求立即将这一决定上报科委和周恩来总理。

导弹、核弹头到达 50 号发射阵地后，聂帅、科委张震寰副主任及二机部、七机部的李觉、钱学森副部长冒着大风一直在阵地上，仔细观察着操作分队吊装的每个环节。在进行对接、瞄准、校零及临射前各项测试检查时，聂帅始终在试验现场，哪里有危险就在哪里坐阵，直到下达了“30 分钟准备”口令后，才撤到发射指挥所。聂帅这种深入细致、高标准、严要求以及平易近人身先士卒的作风，给部队以很大鼓舞。

发射成功后，聂帅在发射指挥所立即将这一好消息报告了周总理。27 日晚，基地在中心区大礼堂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聂帅在讲话中说：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正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是对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的沉重打击，是对世界革命人民的巨大鼓舞。聂帅还勉励大家：要“安心工作，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把基地建设成一个大庆加大寨式的试验基地，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同年 11 月 17 日，聂帅与七机部钱学森副部长由乌鲁木齐返京时再次路过基地 14 号机场，在机场接待室接见了我们几位基地领导。聂帅对我们说：我这次专门来，是有个事要和你们商量。现在科学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整个人造卫星发射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筹

建要交给你们 20 基地管。我回去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各个大军区组织实施，实行双重领导，地址勘选、设备安装、业务工作都由你们负责。你们抽出技术骨干，到各个台、站负责技术工艺性建设和设备安装。科学院的“701”工程处也交给你们，他们乱了，管不了了，人造卫星发射试验 1970 年一定要实施，不然就赶不上了。当聂帅看出我们对接收“701”工程处有畏难情绪时，他说：你们“先吃后吐”嘛！先全部接收过来，再慢慢消化，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总体设计、设备抓总、机构组建、管理使用都要交你们管。根据聂帅的指示，我们于 1967 年 2 月派出技术骨干赴京，之后又组成了“671”工程筹建处，逐步接收了科学院的“701”工程处。从此，卫星测控系统的研制与地面观测台、站的建设，在基地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展开。在 1970 年 4 月 24 日发射我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卫星试验任务中，测控系统第一期工程除渭南控制计算中心尚未完工外，其它 7 个台、站都投入了使用，顺利完成了卫星测控任务。

杨尚昆副主席检阅核反击演习

1983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参谋长杨得志莅临基地检阅了二炮在东风场区组织的核反击集训和实弹发射演习，并视察检查了基地各方面的工作。

14 日下午，杨副主席、杨总长到基地后立即就听取了二炮、基地领导的汇报。杨副主席说：我是第一次到 20

基地来,这次来一是参观二炮的发射,二是对基地的同志表示慰问,代表邓主席和几位老帅来看望大家。你们在戈壁滩上经过 25 年的艰苦努力,一点一点地把场区建设成今天这样大的规模,很不容易,这是同志们努力的结果。基地有许多干部在这里工作了 20 多年,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杨副主席、杨总长还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二炮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15 日上午,杨副主席一行在发射场参观了导弹发射。这次核反击演习是从 3 号、63 号、1 号、50 号发射阵地,以每发弹间隔 30 分钟连续发射 4 发“东风 2 号甲”导弹。发射成功后,杨副主席、杨总长热烈鼓掌并向大家表示祝贺。杨副主席高兴地说:这些过期多年的产品还能命中目标,还有一定精度,证明我们的制造部门、科研部门有很高的水平。根据这次试验的结果,有效期可以延长,还能使用,这就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之后,杨副主席、杨总长还视察了技术阵地、指挥控制站机房和基地展览馆。在展览馆杨副主席为基地题词:“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开创基地建设新局面。”

杨副主席在基地视察时,不管走到哪里,都要与科技干部亲切交谈,关心了解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勉励他们要努力学习,提高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工作能力。16 日上午,杨副主席、杨总长在二炮和基地干部大会上分别作了重要指示。杨副主席说:第二炮兵和 20 基地是建国以后坚持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建立起来的,在短短的 20 多年时间内,使我军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这充分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体现了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久经考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能够打现代化的战争。但是,我们和先进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差距,今后仍然要继承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依靠自己的力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杨副主席还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出发,就我们军队的建设方针和任务,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目标,以及我们基地的任务和我们应对建设大西北作出什么贡献等,广泛作了指示。杨总长在讲话中则肯定了这次较大规模核反击战役集训和演习的成效,高度赞扬了我国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和基地广大干部战士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并对加强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要求。杨副主席、杨总长的讲话和视察活动,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科研战士的关心及对国防科技事业的重视,使基地干部战士受到很大鼓舞。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为国防科研事业培养了一批批又红又专的国防科技专业技术人才,完成了多种型号导弹、人造卫星的发射试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追忆往昔,基地从勘察选点到组建队伍;从场区建设到试验设施的更新换代;从培养技术队伍到科研试验,都渗透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都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确领导和基地几代官兵长期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结果。当然,我国发展尖端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 and 世界和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战斗在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官兵将继续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为

加速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逮守标整理)

进军大西南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

——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用兵艺术的光辉范例

李 兆 荣

进军大西南,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以及第四野战军3个军共60余万人(以下简称各野战军为一、二、三、四野)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川、黔、(西)康、滇进军,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伟大斗争。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铁流千里,叱咤风云,一举歼灭国民党军90余万人,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固守大西南建设“反共”基地的战略意图,解放了川、黔、康、滇四省,谱写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篇章。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制定了英明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役的指导原则,这是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西南局领导集体则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许多富于独创性的真知灼见和重要建议,并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采纳。他们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经验,精心指挥了进军西南的伟大战略行动,也为加速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高瞻远瞩,统览全局,正确地 选择进军大西南的恰当时机

1949年4月21日,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

上签字以后，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①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第二、三野战军，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用了1个月零7天，歼敌40余万。这一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灭亡。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调整部署，将1948年12月确定的，在渡江战役之后由二野三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的战略部署，改为由三野经营东南，二野在恰当时机进军西南，经营川、黔、康、滇的部署。那么，何时向西南进军为有利呢？毛泽东深谋远虑，全局在胸。于1949年5月23日提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② 当时，他提出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主要是从以下四个因素考虑的。

第一，为对付美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有可能铤而走险直接出兵干涉中国革命。毛泽东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③ 由此可见，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美国出兵干涉中国革命是做了充分的考虑和准备的。对之，采取的主要对策是：命令各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力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毛泽东决定二野在六七两月内不要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5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29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17页。

西进军,在现地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①毛泽东预计两个月后,上海、宁波、福州、青岛等沿海城市将获得解放,那时美国直接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在这时二野全军就可以西进了。毛泽东周密地考虑到客观情况的瞬息万变,但预计毕竟不是现实,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所以,他阐明:“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②“行动时间,如届时筹备不及,可以推迟一个月。”^③“积极准备在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④毛泽东的预见非常英明,6月初青岛解放,8月17日叶飞率三野第十兵团解放福州,由于上海、宁波、青岛、福州等沿海大城市的解放,美军不费大的周折即可顺利在中国登陆的登陆场也随之失去,这使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抑或可以说美国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的可能基本解除。在这时,毛泽东果断决定二野不再担负战略预备队的任务,可以向西南进军了。

第二,为使二野有充裕的准备时间。

渡江战役结束后,二野各军主要分布在浙赣线及其附近地区,担负着战略预备队的任务。6月17日,中央军委指示:“二野西进时机似以九月为较适宜。”西进的时机,由原来预计的8月初往后推延了一个月。选择9月西进的理由是:“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那时才能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彬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⑤前两则谈的是二野出发前要有充裕的准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29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30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315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320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334页。

备时间和能够解决粮食问题。根据二野挺进大别山行动中的经验,邓小平认为这种准备“应包括思想、组织、政策、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准备。”^① 进军西南需要抽调、训练和集中几万名干部,需要大量补充兵员和牲畜,需要准备几百万斤粮食和几十万套冬装。从浙赣线进军大西南,山高水险,气候多变,长途跋涉数千里,与敌亦会有恶战,困难甚多,做好出发前的思想政治动员和各方面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为便于各野战军间的密切配合。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年初规定,1949年夏秋冬季人民解放军将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9省的大部或全部。渡江战役后,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适时正确地作出了我军提前实施向西北、西南、华南进军的战略决策,要求一野进军西北,在两马主力被歼解决西北诸省无重大困难情况下,可以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决甘、宁、青、新四省,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二野进军西南,经营川、黔、康、滇;三野以3个军进军福建,1个军夺取并守卫青岛,其余11个军分别守卫南京、上海、浙江等地区;四野进军中南,经营鄂、湘、赣、粤、桂。

毛泽东将二野向西南进军的时间确定在9月,是从上述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出发,周密考虑到各野战军间的相互配合做出的。三野6月占领青岛8月占领福州,为二野9月向西出动提供了可能。毛泽东要求四野主力7个军于八九两月到达湘粤桂边一带。四野主力7个军和二野第四兵团3个军,兵分三路,经湖南、江西,于9月初向两广前进。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部精锐4个师,鄂、湘两省大部地区的解放,为二野顺利通过华中地区,减少西进中的困难,掩护二野主力隐蔽靠近川鄂、川湘、川黔边创造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25页。

极为有利的条件。四野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派出第42、47、50军暂归二野刘邓首长指挥,这三个军直接参加了进军四川的战斗,为解放重庆、成都,歼灭宋希濂、胡宗南等部国民党军卓立功勋。一野为配合二野入川完成大迂回包围任务,按照毛泽东6月27日指示调整了原定在消灭胡宗南部一部分主力后,乘胜追至汉中、广元的计划,暂时不占领汉中,让汉中多留在胡宗南部手中几个月,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南逃。毛泽东从战略全局考虑,一野第18兵团入川的时机,选定在12月二野主力已到达并占领重庆等地时最为有利。他指出:第18兵团入川“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①可以说,进军西南的胜利,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英明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密切合作的胜利。正如刘伯承所说的:“整个解放战争全国是一盘棋,一野、四野等部队和二野、三野是配合作战的。”“没有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全国的胜利与各部队的配合,进军西南是不会那样顺利的。”^②把进军西南和向西北、中南进军紧密联系起来综合考虑,高度重视发挥各野战军的协同配合作用,表现了毛泽东非凡的指挥才能和远见卓识。

第四,充分掌握主动,调动敌军以利我之聚歼。

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痛感“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他在6月的一篇日记中表示,要以所谓“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要前进,莫退”把反共反人民的“事业”继续下去^③。4月22日成立了以他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的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7月16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声称:“本党非常委员会的成立,是表示本党历史已翻过崭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349页。

② 《刘伯承回忆录》第39页。

③ 《蒋经国自述》第255页。

新的一页。”^①从5月到10月,蒋介石为确保台湾,力保广州,稳固西南,象走马灯一样,来往穿梭于定海、福州、厦门、广州、重庆、成都、昆明、台北、台南、高雄等地,视察前线,部署防务,给士气沮丧的将士们鼓劲打气。还于这年7月10日和8月6日先后出访菲律宾和韩国,希图拼凑远东国家反共联盟。他“仆仆风尘,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重要节日亦不能在家休息。”^②忙活了几个月,空费一番心血,时局的发展对蒋介石愈来愈不利。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布,从本日起迁往重庆办公。毛泽东英明预见“广州伪府迁渝时间当在九十月间”完全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6月27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大批工作人员已去重庆。”“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广州伪府迁渝时间,当在九十月间。我刘邓九个军,可于九月由现地出动。”^③让蒋介石和广东的国民党政府放心的迁往重庆,做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的迷梦,以利于人民解放军聚歼西南诸敌,把二野进军西南的时机选在广州伪府迁往重庆之时,再一次显示了毛泽东高屋建瓴、娴熟驾驭战争指挥全局的卓越才能。

二、随机应变,锐意创新,大迂回 歼敌方针的形成

对敌实施大迂回、大包围迫敌就歼的方针是全国解放战争实践经验的产物,是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208页。

② 《蒋经国自述》第29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349页。

方针的继续和发展。这一方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二野、三野京沪杭战役总前委直接指挥的渡江战役为大迂回大包围歼敌方针的形成积累和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预计了渡江成功后的敌情,规定了战役进行中三个阶段的具体任务,要求渡江后西线之三野第7、第9两个兵团主力应与东线三野第8、第10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解决京沪杭之敌。二野以1个兵团(或主力)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南京之任务;以1个兵团(或主力)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断敌退路。^①照纲要规定,二野从枞阳镇至望江段渡江,渡江后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行军路程在500里左右。显而易见,这一纲要规定的是一个较远距离的迂回分割包围敌人的战法。4月20至21日晚,二野、三野百万雄师从江阴至湖口东发起渡江作战,迅速突破了敌军防线,23日解放南京。敌军陷入混乱局面,难以抵挡三野4个兵团锐不可当的钳形攻势,纷纷向上海、杭州、浙赣线撤退。在此情况下,总前委及时调整了军事部署并上报中央军委批准。改令二野全军3个兵团9个军全部南下浙赣线。随后,二野全军以势如破竹之势,千里迂回穿插于浙赣线上,相继占领了鹰潭、上饶、衢州、金华、义乌一线,前峰进抵闽北、浙西及江西的吉水,一举割断了汤恩伯与白崇禧两大军事集团的联系,切断了京沪杭之敌向西向南逃跑之路,取得了远距离迂回包围歼敌的作战经验和重大胜利。

二野上述战役行动的成功经验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艺术的宝库。5月23日,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中,提出:“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32—133页。

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①6月2日,中央军委更明确肯定了二野创造的经验,指示四野南进时可以“如象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②。7月上旬四野第12、第15两兵团和二野第4兵团发动湘赣战役,准备歼灭白崇禧部的第3兵团。由于采取了近距离迂回包围方法,仅歼敌4600余人,敌军大部逃出包围圈。7月16日,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湘赣战役的经验教训,针对敌军力避决战的新特点,提出了对中南、西南诸敌应实行远距离迂回围歼的方针。他指出:对“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的白崇禧,“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③在同一个指示中毛泽东还谈到他就二野进军西南问题已与邓小平面谈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④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于8月19日拟定了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以下简称“8·19命令”)该命令指出:“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⑤这个命令创造性地把毛泽东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29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32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379—380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380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426页。

和中央军委关于“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歼敌方针加以具体化，首次使用了“大迂回”的概念，它比“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提法更加鲜明、简练、易于把握。“8·19命令”对大迂回的战略意图、进军方向、兵力部署、具体要求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命令要求二野主力以大迂回的动作，从黔北进入川东南，切断包括宋希濂、孙震两部在内的川中所有敌军南逃贵州、云南之路，以利我之包围聚歼。然后再与一野第18兵团协同作战歼灭胡宗南部，解决全川问题。命令具体要求：5兵团于9月初由（江西）上饶弋阳等地出发经南昌、长沙，10月10日以前到达（湖南）武冈、邵阳、湘潭之线，11月20日以前攻占（贵州）贵阳、黔西。尔后第17军留置贵阳，兵团主力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四川）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3兵团作战。3兵团10月10日以前到达（湖南）常德、江陵之线，11月20日以前攻占（贵州）遵义、彭水、黔江。尔后以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四川）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外，兵团主力12月10日以前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协同5兵团作战。两兵团协同作战，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顺势攻占富顺至璧山之线。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双层大迂回包围歼敌的计划。（如果将二野4兵团进军云南，阻敌逃往国外计算在内，则是三层的迂回包围）第一层大迂回包围由3兵团实施，第二层更大范围的迂回包围由5兵团完成。一旦这个双层大迂回包围的计划实现，川东和重庆之敌南逃云南之路将被彻底截断，使其难逃被全歼的命运。“8·19命令”很好地体现和补充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力求全歼敌人于国境之内的战略思想。因此中央军委于8月20日迅速回电，对刘伯承邓小平拟定的“8·19命令”表示完全同意。9月12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二野四野领导人再次指示中说：“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

方针。”^①至此，大迂回大包围歼敌方针完全形成。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采用了“8·19命令”中“大迂回动作”的提法。这一事实表明，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们的卓越智慧非凡才能和丰富经验为这一方针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主要作用，这一方针生动地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

三、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正确地选择 进军西南的方向

四川是西南要地，蒋介石把守住四川看得至关重要。为此，他把胡宗南、宋希濂两大嫡系军事集团和其他派系军队，共约90余万人主要部署在四川及其周边地区。而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正确地选择进军西南的方向，就成为我军能够顺利进军、解放西南各省的关键。就我军的入川方向来说，可走川陕边、川鄂边、川湘边，川黔边。但在我实行战略追击，向全国进军的条件下，从哪个方向入川好，这是由总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决定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从全歼西南诸敌，不使其逃往云南和国外的战略目标出发，确定了二野主力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以钳形包围夹击之势，歼灭宋希濂、孙震、罗广文等部盘踞川东之敌，占领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然后，二野主力挥师进击川西，一野第18兵团经川北入川向成都方向前进，两大野战军南北夹击，进而将胡宗南集团彻底消灭于成都周围地区。这一战略决策从初步提出，到完备和全部实现经历了大约半年的时间。

进军西南先经贵州入川的决策是1949年5月做出的。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中指出：“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456—457页。

军断其退路不可。”“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并规定年底或明年初一野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贺率领，经营川北。”^①7月16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明确二野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②至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南的方向完全确定了。

刘伯承、邓小平采取了诸多措施，认真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攻略大西南进军方向的决策。由他们制定的“8·19命令”就是一个严格把中央“经贵州入川”指示加以具体化并极富创造性地付诸实施的范例。在实施“8·19命令”过程之初，刘伯承、邓小平从“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和有计划地给敌造成错觉出敌不意的军事思想出发，成功地领导二野全军实行了一系列的调动和佯动。9月中旬二野第5兵团和第3兵团第10军从浙赣线出发经赣西和湖南的湘潭、邵阳地区，隐蔽秘密地向湘西黔东集结。此时，四野第12兵团正在经湘潭、湘乡向南进军，第13兵团经湘西向南进军，起了掩护二野主力西进的作用。二野第3兵团则公开由浙赣线出发经南京北上，到达南京时，南京人民举行了热烈欢送二野北上的活动。一列列火车从浦口往北开，在徐州转陇海路西进郑州。刘伯承在郑州人民欢迎二野的大会上公开发表讲话，表示经陕西南下四川的决心。新华社对此还发表了消息，既起了掩护二野第5兵团向贵州进军的作用，也给敌造成二野主力将首先从陕南入川的错觉。接着二野第3兵团由郑州秘密南下，经信阳、孝感等地向鄂西秘密挺进。九十月间，当二野全军正秘密向鄂西、湘西、黔东地区集结时，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出现在北京。8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筹备会议上作报告。10月1日，刘邓在北京出席开国大典。在此期间，毛泽东与刘、邓、贺一起当面会商了我军进军西南问题。其后，直到10月20日，刘、邓才离京赴湘，就近指挥已到达常德、湘潭一线的二野向四川进军。刘、邓北上之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29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年10月版第18册第380页。

时,当二野主力通过华中地区,隐蔽地向湘西、黔东开进集结时,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完全以四野部队的名义出现,其作战事宜也统由四野首长指挥,这既有利于两大野战军的协同配合,也有利于隐蔽二野向西南进军的战略进军方向,实现出奇制胜的意图。此外,在6至8月间,陕南军区、湖北军区、四野第13兵团等部队分别在川陕边、川鄂边实施了军事佯动,亦给敌造成了错觉,以为人民解放军将从陕南、鄂西先入川,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二野的军事行动。上述这一切,打乱了敌人的思路和部署、使其错误地把防御重点放在川陕、川鄂边,对川黔边则疏于防范。

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最快的速度对中央决策加以贯彻,以求得最佳的实施效果。这也是刘伯承、邓小平坚决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南战略部署的显著特点之一。毛泽东原要求二野主力争取于12月占领宜宾、泸州、重庆一带,10月19日毛泽东把这一要求改为必须于12月占领上述地区,这是毛泽东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考虑“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①有利于四川解放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的英明决策。为了认真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10月23日迅速做出决定:要求第5兵团11月15日前攻占贵阳,25日攻占毕节,12月10日攻占宜宾至纳溪地带。还要求第3兵团11月25日攻占遵义、黔江、彭水之线。“在5兵团未到毕节前,不得先到黔江,以免过早惊动宋、孙等匪,俾其先我西撤,妨碍我渡江作战。”12月10日左右,攻占泸县、江津地带。“非有特殊原因,不得推延这一时限”^②以上规定之时间比“8·19命令”明显提前,即占领贵阳、遵义的时间都提前了5天。比毛泽东规定的时间提前的更多。事实表明,刘伯承、邓小平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的楷模。11月1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5页。

② 《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日,在鄂西、湘西隐蔽待命的二野第3、5兵团、四野第42、47、50三个军,在北起巴东,南达天柱的500多公里的地段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猛烈攻势。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气候恶劣,道路泥泞,山河阻隔,供应不足等困难,以大迂回动作,每天以120里至180里的行军速度,跋山涉水,向黔北川南急行军,发扬了邓小平所提倡的“我们的胜利在脚”和“要敢于走路”^①的精神。5兵团11月15日攻占贵阳,28日占毕节,30日占叙永,12月初攻占纳溪、合江、自贡等地。3兵团11月16日攻占彭水,21日占领遵义,11月25日占领南川。遵义、贵阳等地的解放,完全切断了川敌南逃黔、桂的道路。在此期间,敌宋希濂部第14兵团在咸丰地区被歼灭,第20兵团大部和罗广文第15兵团3万余人在川南地区被歼灭。二野第3、5兵团,四野第42、47、50军分地段渡过长江,对重庆形成夹击包围之势。蒋介石见势不妙,11月29日夜宿白市驿机场,30日凌晨乘飞机仓皇逃往成都。当天,重庆获得解放。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赋予二野经鄂西、湘西、黔北入川并占领重庆的光荣任务。二野主力和四野3个军的广大指战员进军之神速,攻占既定目标掌握时间之准确,创造了人民解放战争史上惊人的奇迹。

四、海纳百川,从善如流,正确地决定 不在重庆聚歼胡宗南集团

11月13日,蒋介石惊叹贵阳危急,重庆难保之际,陈立夫和70余名立法委员发电报至台北,催促蒋介石快点赴渝坐阵,挽救危局。11月14日,蒋介石怀着“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

^①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102页。

为”^①的心情，不得不再次飞抵重庆。蒋介石拟调胡宗南的军队增援重庆，做挽救重庆危局的最后努力。毛泽东从歼灭胡宗南集团迅速扩占全川的战略目标考虑，提出了吸引胡宗南部据守重庆加以歼灭，打一个象“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的想法。为此，他于11月27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商量这一设想是否可行。电报说“根据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② 同一天刘伯承、邓小平迅速复电，向毛泽东提出了不宜在重庆聚歼胡宗南部，不宜迟缓攻占重庆之行动，“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注意或夺取重庆为较稳当”的建议。言简意赅陈述了六条理由：“（一）蒋调第三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广文能守住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下，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歼灭了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的情况下，蒋又可能改变其计划。”^③（以下五点理由的引文出处相同不再注）实际情况的演变果被刘邓所言中。11月26日，二野占领綦江，罗广文兵团主力被歼。蒋介石见重庆已难以守卫，准备撤退其重庆守军，但为了确保成都和川西地区，又采取了力求缓撤的做法。“（二）我12军及11军主力，明俭日（28日）可能占领綦江及其以北之龙岗场。敌第三军养日（22日）始由汉中南开车运亦难赶到，即使赶到，如没有后续亦无大作为。蒋胡之持久战，似亦不致加调兵力置于此绝地。”事实上，没有等到28日綦江就解放了，重庆已难以防守，从汉中到重庆，山路崎岖要走500余公里，从22日到28日很难赶到，即使赶到了，仅仅一个军的疲劳之师，又没有后续部队的支援，妄图对抗二野几十万精锐之师是

① 《蒋经国自述》第303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65页。

③ 《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徒劳无益的。而胡宗南派出的一个军也仅仅运到一部分很快被我击溃了。“（三）我西路三个军至迟亥月（12月）10号可达泸州、合江江边，如我迅速渡江并控制泸州、松山之线，则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即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水、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与康东之沿线。”在胡宗南集团逃往云南之唯一一条公路线被切断的情况下，胡宗南只能退往成都方向，蒋介石更不会将胡宗南部调往重庆方向，这样在重庆地区吸引胡宗南部并加以聚歼是不可能的。“（四）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在这条理由中，刘、邓还从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深谋远虑，考虑要保护好重庆的工业设施，以便为将来经济建设创造好的条件。当时，重庆工业设施确实面临大破坏的严重局面，蒋介石已制定了破坏重庆的计划，从台湾调技术人员到重庆执行破坏任务，由毛人凤、徐远举等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因此，尽快解放重庆，保住大工业设施，挫败蒋介石的大破坏计划，不给敌人以从容破坏的时间，是非常必要的。“（五）重庆城地形险要，如较多兵固守，攻取费时。”这是从重庆地形险要的角度，说明不适宜吸引胡宗南部到重庆加以聚歼。”在列举了上述理由后，刘、邓审时度势提出：“（六）在敌薄弱时，至少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以上这封电报深刻地反映了刘伯承、邓小平善于独立思考，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全面而周密地考虑问题的非凡才能。他们热爱和尊敬毛泽东，为了党的事业，又能勇于抒发己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们为我们树立了自觉的认真的创造性的执行上级指示的光辉榜样。接到刘邓请示电后，毛泽东很快即于11月28日回电答复：“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

是适当的。”^①毛泽东完全采纳了刘邓的建议。他的回电突出的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胸怀宽广，海纳百川，从善如流的崇高品德。毛泽东视野广阔，考虑问题周密全面，在28日的复电中，他又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和应采取的相应对策供刘邓考虑：“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11、12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②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毛泽东在11月27日的电报中连续两次使用“是否”二字，在11月28日的电报中则强调：“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他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尊重实际，尊重下级、发扬民主、善于集中党的集体智慧的作风鲜明的表现于电文的字里行间，读来令人肃然起敬。这和当时蒋介石专断强横，与下属勾心斗角、貌合神离，互相拆台形成了鲜明对照。

12月初，二野在胜利占领重庆等川东地区之后，以主力向川西挺进。12月9日，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四川彭县联名通电起义，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亦在昆明通电起义。此前两天蒋介石在众叛亲离局势危如累卵情况下，于12月7日宣布伪府迁往台北，10日再乘飞机从成都飞往台湾。在飞机上蒋氏父子“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这是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结果。12月15日以后，二野5兵团先后占领乐山、青神、眉山、丹棱、蒲江、名山等地。3兵团占领了新津、大邑、邛崃、雅安等地。四野第50军进占遂宁、简阳。一野第18兵团10万人则兵分三路由川北向成都开进，先后占领绵阳、什邡、新都、三台等地，由陕南撤到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已被层层包围。人民解放军运用书写标语、口号、送信、散发传单，广播、喊话、释放俘虏等多种方式向被围之敌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尤其是向国民党各兵团指挥官发出警告，规劝他们投向光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7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70页。

明。政治攻势发挥了强大威力，国民党军感到大势已去，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迅速分化瓦解。郭汝瑰率第22兵团、董宋珩率第16兵团、罗广文率第15兵团残部、陈克非率第20兵团残部、裴昌会率第7兵团、朱鼎卿率第3兵团、李振率第18兵团等部共约40余万人先后起义或投诚。胡宗南部第5兵团负隅顽抗被歼灭，兵团司令李文以下5万余人被俘。12月27日，成都解放，进军大西南战役基本结束，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57天。1950年2月，二野四野两个军配合作战发起滇南战役，歼灭国民党第8兵团。3月，二野出动13个团，歼灭国民党军贺国光部1万余人，占领西昌。至此，川、黔、康、滇四省全部获得解放。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也告达成。其后，人民解放军派军进驻西藏。西南五省全部解放，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的迷梦。

进军大西南，解放川、黔、康、滇、藏，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艺术的伟大胜利，是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坚决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系列重要指示实施卓越指挥的结果，是二野等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战斗的结果，是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南各族人民积极配合踊跃支援的结果。进军西南的胜利，充分地体现了以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卓越智慧和高超的军事艺术，是大迂回、大包围战略进军方针的成功实践。

建国初期的城市工商业调整

徐 棣 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正处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关头。统一财经、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的胜利,改变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所造成的长期通货膨胀和商业投机严重的现象,稳定了经济和市场秩序,使社会的生产和流通沿着正常的轨道前进。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和改造国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但是国民经济改组是一个十分艰巨复杂的过程,我在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金融物价时,“刹车”又急了一些。因此,从1950年4月开始,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商品滞销、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失业增加等问题,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亦比较紧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逐成为当时党和国家一项急待解决的任务。

一、通货和物价稳定后私营工商业的困难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在整个工业(包括手工业在内)中所占比重,职工人数为18.3%,固定资产为17.8%,产值则占48.7%,即将近一半。资本主义商业的比重,在批发总额中占76%,在零售总额中占83.5%。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对于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其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1949年我国私营工商业是逐步恢复发展的。有些行业,如银楼、古董等高档消费品业冷落了,进出口业因帝国主义封锁而陷于停顿,但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影响不大。

1950年3月实现财经统一,物价趋于稳定后,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私营工商业经营的主要产品,却普遍出现滞销,生产迅速下降。例如上海,3月的工业产量比1949年1—3月平均月产量减少:棉纱27%,毛绒54%,卷烟59%,水泥85%;库存普遍增加:当月存货占产量的比重,棉纱为66%,羊毛纱33.8%,卷烟100%,火柴115%,水泥470%,面粉为250%。又如广州,3月的工业产量比1949年月平均产量减少:机织布19%,手织布53%,卷烟71%,胶鞋64%,牛皮65%,火柴42%,电池80%,而进入4月粮食公司和百货公司每日销售量只相当于过去的10%。再如重庆市,私营企业主要商品销售1950年4月比3月一般减少50%以上,其中油50%,煤50%,棉花93%,纱25%,布匹70%。到了1950年的5月,全国私营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同1月比又大幅减少:棉布38%,绸缎47%,卷烟59%,烧碱41%,纸31%。

由于商品滞销,市价步步下跌,企业生产成本升高,亏损不断增加。上海卷烟每箱成本约350元,而市价只325元,亏本25元;20支纱每包成本535元,市价只487元,亏本48元,出现了生产愈多,亏本愈多的局面。私营企业本来资金就短绌,商品滞销更使资金周转不灵,负债累累。据上海市当时显然偏低的估计,全市私营企业负债共计6700万元。其中纺织业最多,截止3月20日,私营53家纱厂,负债3500万元。很多企业被利息拖垮了。全上海私营纱厂10个月负担的利息相当于棉花24万担,厂家不仅欠国家

银行、私营银行、公营贸易公司的债，还欠发职工的工资^①。

在经营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私营工商业中关厂歇业不断增加。上海是我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地方，据统计，有工厂1.2万家，商店公司9万多家。自1950年1月起，该市向工商局申请停工的工厂有928家，其中3月为243家，4月为274家；申请歇业的商店为2948家，其中3月796家，4月1440家，歇业的厂店由小厂店发展到大厂店，一般性企业转到日用工业必需品工业，华商发展到外商。其他地区，也与上海一样。3月至5月初北京市已歇业的有工厂215家，商店1411家；天津市已停歇业的有工厂411家、商店902家；武汉市申请停业的有工厂437家、商店1117户^②。据5月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统计，1950年1—4月，在14个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关门。在16个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困难的程度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上海重于其他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且工厂越大困难越重。从行业来说，以粮食、布匹等批发业及高级消费品行业最重^③。资本家外逃者迅速增加。上海临解放前，就有少数大资本家外逃，计工业31人，商业10人；解放后至国民党1950年对上海“二·六”大轰炸，又逃跑一些，计工业21人，商业5人；2月后至5月又逃跑了155人（其中工业72人、商业83人），相当于过去的2.3倍。另外还出现了个别私营工商业者自杀的现象。

工商企业减产和停工歇业，使工人失业增加。根据全国总工会的估计，1950年三四月间，全国新增加的失业职工约10万人，其中上海5万人，武汉2.5万人，天津1.4万人。实际上还不止此

① 1950年5月工商局长会议上有关城市发言。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档案科存1950年第126号卷。

② 1950年5月工商局长会议上有关城市发言。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档案科存1950年第126号卷。

③ 《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8页。

数。全国各大城市失业总人口约 38 万至 40 万人,其中上海完全失业 16.2 万人,半失业 7 万人。全国失业人口总数达 117 万人(包括东北的 12.5 万人),占城镇社会劳动者总数的 7.6%^①。失业工人生活十分贫苦,个别人走投无路,也有自杀的。

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情况下,城市工商业所以会出现上述困难,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通货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过去,在国民党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下,私营工商业中许多人以商业投机为经营的基本内容。上海靠“踢皮球”“抢帽子”的投机者有 20 至 30 万人,平津两市 200 家行庄中,96% 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投机。许多正当工商业者也以其相当大的资本从事货物囤积、图取暴利。1949 年至 1950 年 2 月物价几次大幅度波动,投机商人包括其他私营工商业者大批囤积货物,特别是粮食、棉花和纱布等短缺物资,宁愿举债,也不肯轻易卖货,企图从中渔利。他们没有料到,3 月以后我国物价从此稳定,而且不断下降。以 3 月的全国批发价格指数为 100,到 4 月便降到 75.1,5 月再降到 69.2,银根则一直很紧。这时,私营工商业急于抛售存货,却愈抛价格愈低,愈是难于销售,结果市场上虚假繁荣顿时消失,投机商业和钱庄纷纷倒闭,大批商品滞销,连纱布、面粉等人民基本生活用品,也暂时出现了生产过剩,工商业普遍萧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饱经多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人民群众,过去为了避免货币贬值的损失,宁愿购买和囤积并不是为了消费的货物,而不愿存放货币,由此形成了虚假的购买力。币值和物价稳定之后,人民开始信任人民币,而且当时利率较高,储蓄比存货有利,居民有钱改向银行存款,据统计 6 月银行存款余额比 2 月增加 4 倍以上。他们不仅不再囤积货物,并且将过去所存货物吐

^① 《陈云文选》(1949—1956 年),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88 页。

到市场上来,从而加速了虚假购买力的消失,使市场上物资一时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

(二)一些商品因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而失去市场。旧社会我国的消费结构是畸形的。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贫穷,连简单的日用必需品也买不起;一方面是极少数人奢侈享受,花天酒地。解放以后,过去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工商业,如为少数上层人士服务的大饭店、舞厅及经营奢侈品,金银首饰的工厂商店,进一步压榨穷人的典当业,为外国人服务的洋行,完全依赖国外原材料、市场的工厂,以及经营封建迷信品的企业等。随着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被消灭,这一类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也逐步由冷落到萧条,有的转业,有的倒闭,从而引起一部分工人失业。

(三)城市消费水平的变化使购买力相对降低。新旧政府更迭,反映到消费上有很大变化。人民政府干部有 240 万人,军队干部 120 万人,共 360 万人,他们的消费水平较之国民党时代的公务员低得多。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月能够自己支配的钱仅合 50 斤小米,较之原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祯相差甚巨。过去消费水平高、解放后消费水平降低的地主,至少有 200 万人,依靠搞投机倒把生活的,也有 50 万人。此外,城市大、中、小学教员大约 50 万人,他们的消费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总的估算,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平均降低约 20%^①,而且这种降低不可能一下子恢复,有的也不应恢复。购买力降低,必然使商品销售不景气,发生生产相对过剩现象。

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将近 90% 在农村,农民的消费是城市日用工业品的广阔市场。在老解放区,由于土改的完成,农民收入增加,使农村日用品需求也增加,刺激了公私企业的发展。沈阳市

^① 《陈云文选》(1949—1956 年),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88 页。

1950年初,一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衰落后,私营企业数3月反比1月增加了233家,全市工商营业额3月比1月增加了14%,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但是1950年上半年,广大新区的土改,或者还未进行,或者刚刚开始,上年因灾情严重,农业欠收,三四月份又属青黄不接季节。另外由于解放不久,城乡间贸易没有很好恢复,人民币下乡范围很窄,农村大批土特产品没有收购,也限制了日用工业品的销售。

(四)经济发展中的盲目性使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解放前,我国私营工商业绝大部分生产经营轻纺产品,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私营经济固有的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容易使产销脱节;长期战争造成的全国分割状态,又使各地为了适应军事需要设立了许多工厂。如西北,由于胡宗南几十万军队集中在那里,因而开了大量面粉厂。又如西南,为满足抗战时国民党军队、政府的需要,重庆等地迁入和新开了不少企业。解放初期,各地在恢复经济中,又盲目发展了一些企业,以致某些本小利大,技术简单的行业,如火柴、肥皂、卷烟、面粉等生产能力潜伏着严重过剩,当全国分割状态消除,商业和交通恢复时,这种潜在的过剩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质次价高的企业不能维持生产,有的就此倒闭。例如火柴业,全国生产能力每月约15万箱,6月前实产7.7万,相当于生产能力的1/2;实销5万箱,相当于生产能力的1/3^①。西安市的火柴厂在交通未恢复前,生产情况良好,月产1万箱,畅销陕甘宁、河南等地;交通恢复后,济南、青岛等地火柴入陕,私营各厂跌价竞争,结果许多小厂从此跨台^②。

(五)许多私营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生产效率很低。以纺

① 中财委《关于火柴专业会议及会后情况向中央的报告》国务院秘书厅机要处档案科存第16号卷。

② 1950年5月2日全国工商局长会议上有关城市发言。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档案科存1950年第126号卷。

纱厂为例每1万纱锭，上海需270人，重庆需1000人。企业机构也十分臃肿，资方任意安插了不少亲戚朋友，如重庆民生公司有顾问80人，裕华布厂和福华公司职员与工人的比例分别为1比3和1比1.8。经营方法不合理浪费大成本高利润少甚至还要亏本。这也是引起许多工商业缩小营业甚至停工歇业的重要原因。

(六)政府工作中也有缺点。首先是公债和税收过重。原决定二期公债共2亿份，极大部分落在工商界身上，认购公债的时间又和税收挤在一起，这样集中地回笼货币，对稳定金融物价起了重要作用，但从当时情况看，确实加重了工商业的困难。同时由于制度不健全，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不足，税款的征收和公债的分摊中都存在畸重畸轻现象。

其次，公私关系处理上也有偏差。有的在经营范围上国营贸易控制得过大过多。如华北地区，粮食棉花、纱布、煤炭、煤油、食盐等主要商品销售额，国营贸易加合作经营平均达80%左右，有些商品在某些城市，甚至达100%。其他日用必需品，国营贸易经营亦较广，加上普遍设立另售店，甚至摆摊、赶集、游乡入户地推销商品，使私人感到“没什么可干”。在价格政策上，批发价与零售价不分，地区价格差额不多，代销手续费也太低，私商无利可图。在金融贷款政策上，国营贷款占80—90%，私人贷款为数甚少，且时间很短，一般三个月，周转不过来。此外在原料分配和交通运输安排上，也有类似问题^①。

第三，劳资关系的处理不利于发展生产。解放初期工人成分很复杂，其中混有异己分子；对一部分落后工人当时也来不及教育。因而有的工人不遵守劳动纪律，报酬和福利则要求很高，甚至对资方实行过火的斗争。有的劳动部门在执行劳资政策上，因怕

^①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调整工商业和改善公私关系的政策问题向毛主席、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第一卷，第479—483页。

人说右倾，不能从发展生产出发，合理解决劳资纠纷。

由上述原因的分析中可见，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后城市工商业的困难所以突出起来，主要是因为长期存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所说，是“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暂时来说，这种改组确是一种困难，一种痛苦，但这是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过程中的痛苦和困难。1950年夏，解放战争已在我国大陆基本结束，开支减少财政赤字逐日大幅度减少；国营经济已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并且在市场上掌握了主动权；同时社会上货物的过剩量并不多，如棉纱存量，估计有50万件，而社会需要量约为120万至150万件。随着土改的展开和农副产品的收购，农民购买力普遍提高，基本日用工业品不但不过剩，有的还会不足。所以只要认真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主动改进工作，完全有能力帮助城市工商业解决面临的困难，促进经济的繁荣。

二、调整城市工商业的方针原则和具体措施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第七次会议，决定调整城市工商业。

陈云向会议报告了财政状况和改进财经工作的意见。他说：“整理收支、缩小赤字，仅仅是财经工作的一部分，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急待解决。已经做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征收公粮中的畸轻畸重现象应加改正；现行税则在执行中还须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审查，其中不合适者应予修改；税款负担和公债推销，应达到合理和适当的程度；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征收工作中的不良作风必须整顿；对税务人员要进行整训，防止贪污偷漏；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使公私兼顾的原则在实际政策和具体办法

上体现出来；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应该改进；国营工厂的管理有待于改善；公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应减少盲目性，逐渐增加计划性，如此等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六个月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财政方面，达到了平衡收支、稳定物价的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数月的工作，除坚持财政工作方面一切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并克服工作中发生的缺点以外，将召开若干必要的会议，拟订若干必要的法令，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工商业方面去，并做出成绩。”^①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②

4月29日，刘少奇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宣布要实行工商业的调整。他说：“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根据共同纲领与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采取一些具体办法来调整工商业与公私关系，使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能在目前的条件下加以组织与计

^① 《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78页。

^② 《对调整工商业争取财经情况根本好转的指示》新华月报1950年第5期。

划,以便克服公私企业之间以及各企业部门之间许多尚未进入正轨的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对于那些有可能维持、又于国计民生有益、但是发生困难的私人生产事业,人民政府应该给以帮助,这些企业的主人和工人群众也必须各尽所能,共同努力,以便把这些企业维持下来,等待情况的好转。”^①

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调整工商业的政治意义,动员全党切实做好这项关系全局的工作。他说: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他说,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要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②。

5月8日至25日,中财委召开了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研究了工商业困难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检讨了公私关系,提出了对公债和税收问题的意见,讨论了劳动部提出的劳资关系问题和救济失业工人办法草案等。际云在总结报告中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了5项措施:以加工订货方式重点维持生产;以收购农产品增加农民购买力和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组织工业品出口来开导工业品销路;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重点举办失业救济^③。会后,调整工作即全面铺开。

6月下旬,中央贸易部召开各大区贸易部长及华北五省二市商业厅(局)长联席会议和公私盐业运销会议,具体商讨了召开研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五卷第22页。

③ 《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88页。

究公私关系的各种专业会议的方针,并对国营零售贸易和土产收购作出了具体安排,会上还商定了全国纺织品加工任务的分配和盐业运销问题。各工业部从6月起,相继召开专业会议,具体研究公私关系,并根据以产定销原则安排了下半年生产。中财委于七八月份还召开了有公私双方参加的进出口会议和金融会议,具体商讨了在这两个领域中调整的方针和办法。通过这一系列具体工作和各级政府的努力,到9月末,私营工商业即逐步由萧条走向繁荣。

1950年夏开展的合理调整工商业工作,主要是调整公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但也包括调整公营与公营之间的关系和私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调整工业与商业、金融业与工商业、城市与乡村、国内各区域之间及各企业内部的关系和企业间的相互关系。

调整公私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民政府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益,但是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而从事投机倒把的行为。国营经济是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对公私关系的基本政策,即共同纲领规定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

调整工商业的措施办法,必须与稳定金融物价的政策相辅而行,这也是调整工商业期间财经工作的一条基本方针。因为经过12年通货膨胀之后,决不能希望多数人在两三个月时间内就会相信物价能稳定,当我们增加货币发行,大量收购农副产品和其

^① 《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02页。

他日用工业品支持工商业恢复生产时,投机资本有可能集中攻击我们物资中的弱点,当时主要是纱布、进口物资和工业器材,带动物价上涨。正如陈云所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所以,必须在继续稳定金融物价基础上实施调整工商业的措施。在调整工商业时,要注意掌握足够数量的纱布以弥补国家掌握的物资中的不足;扩大人民币的流通面积,以减缓可能出现的货币冲击^①。

调整工商业的具体工作当时主要抓了三个基本环节:即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

(一)调整公私关系,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一是调整负担。

第一,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其实质是一方面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反对当时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者要求与国营经济“划分地盘”的思想;一方面要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得其所,反对一部分干部中排挤私营经济的思想。在财政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贸易已经代替投机商业成为市场的领导因素之后,国营经济一个方面的任务就是如何使私人经济能“得其所”。这里主要的出路是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救急的也是正常的办法,则是对于若干主要的私人工业实行加工订货或其他方式的扶助,使他们按照国民经济需要而生产,取得自己的正当利润。对于私人商业则是在不允许投机的前提下,国营贸易应在价格与营业范围上给私商以出路,以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具体说:

工业方面:扩大对私营工业企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财经委员会统一组织各国营企业和机关部队所需要的加工订货的定单,合理分配给公私工厂;国家掌握的主要原材料,如棉花、粮

^① 中财委《关于召开公私关系各种专业会议的方针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国务院秘书厅机要处档案科存 1950 年第 14 号卷,第 18—23 页。

食由中财委提出统一分配计划,以调节公私营工厂及地区之间的矛盾。国家还有意识地对机器制造业等进行压资订货;投放货币,收购暂时滞销的产品,如化肥、烧碱、玻璃、火柴等,扶助私营企业渡过难关。1950年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产值为21亿元,比1949年的8.1亿元增加了1.7倍。为了扩大工业品的市场,政府投放资金收购农产品。据各地不完全统计,国营贸易公司1—11月收购粮食10多亿斤、棉花600万担、猪鬃900万公斤,鸡蛋9亿个,各种皮子220万张,各种绒毛4500多万斤,植物油130多万担,油料200万担,茶叶30万担,鲜茧40万担(华东区),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困难,而且对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工业品销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商业方面,在国营商业扩大批发阵地的情况下,减少国营零售店的数量,其设置以能够稳定零售价格、制止投机商人扰乱市场为限度;设置的地区,主要限于大中城市及大工矿区,小城市则以批发为主,机关部队经营的商业一律撤消。国营零售业经营的商品,由过去一二十种减为粮食、煤炭、纱布、食油、食盐、石油六种人民必需品,把其他的大量零售业务交给私营商业和小商贩去经营,国营商业全部或大部掌握的商品中,如粮食,也允许私商根据国营商业的供应计划,按照规定的供应办法和零售牌价经销代销,使其获得一定利润^②。农产品有无销路和销得快慢,当时是一件有关民生的大事。由于农村十分分散,国家资金有限,国营贸易公司只经营主要的大宗的农产品和外销农产品的一部分,其余农副土特产品,都组织与鼓励合作社和私商收购贩运,既扩大私商

^① 《半年来调整工商业的成绩及经验教训》中财委编《中央财经通报》第4期,第118—123页。

^② 中财委《关于国营零售贸易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党的工作编委会编《党的工作》第51期,第18页。

的经营范围,又使集中于城市的游资分散到农村去^①。进出口贸易,国营贸易公司除办理统购统销的进出口物品外,只经营进口物资中的工业器材、军用器材,用以调剂供求稳定市场所必需的民用器材和一部分主要出口物资,其余进出口商品,均归私人经营。在国家经营的部分中,还采用合同的方式,委托私商代购代销,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私营进出口商与国外联系多、门路广的优势。私商所需外汇,由外贸局视市场和生产需要予以批给,但私营工厂购入的物品,不能转售^②。盐业运销,为避免供求失调,影响盐价,私商可按季、按月编造运销计划,经批准后,可在销商所在地销售,不得跨地区经营,但鼓励其下乡推销。在适当调整公私经营范围的同时,按照照顾产运销三方面利益的原则,在零售与批发之间、产区与销区之间、季节与季节之间、原料与成品之间规定适当的差价,以鼓励私商在城乡与地区之间进行贩运,使他们有利可图。为了加速城乡物资交流,使农民与城市人民都受其益,当时强调,既要维持农产品的适当价格,保护农民正当的生产利益,又必须照顾销路和运销利润。在这同时,地方人民政府对私商的运销手续及运输条件,也提供以充分的便利,并在税收政策和税收手续上给予适当照顾。

金融方面,在巩固国营银行领导地位的同时,鼓励私营行庄积极扶植工商业生产,沟通城乡、内外交流,吸收侨汇,促进资金回流。行庄为扶助城乡交流开展汇兑,人民银行可以代为调拨资金汇率七折优待;放款发生周转不灵时,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转抵押、转贴现。私营行庄可办理人民银行委托的代收税款、代理储蓄、保险等业务,在中小城市还准予增设机构,以维持私营行庄能

① 中财委《关于土产收购问题的指示》,国务院秘书厅机要处档案科存 1950 年第 21 号卷,26—27 页。

② 中财委《关于出进口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国务院秘书厅机要处档案科存 1950 年 14 号卷。

继续经营并略有发展^①。为了调整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关系,由国家银行或联合私营行庄力量,增加对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并连续两次降低利率,帮助私营工商业资金周转。

第二,调整负担。其实质是在保证国家财政需要的前提下,适当地减轻民负。在农业方面,农业税只向主要产品征税,并以正常年景产量为标准,税率由17%减为13%;农村中的交易税也只向大宗货物征税。在工商税方面,货物税目由原来的1136种减为358种,并强调征收时不得超过应征税率。税收方法由原来单纯民主评议改为按照会计制度的差别状况,分别采取自报查帐、依率计征,自报公议、民主评定、按率计征和定额纳税三种办法,以免再发生“以小挤大”的现象。盐税减半征税,以利广大消费者^②。公债方面,工商业者已认购的一期公债,其尾欠能交者就收,不能交者就停;二期公债1950年不再发行。

(二)调整劳资关系

当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1)必须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2)必须有利于发展生产;(3)劳资间的问题,用协商方式解决,然后过渡到更固定的合同关系;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根据上述原则,在各地工会推动下,私营企业纷纷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由劳资双方直接见面,定期开会,商议克服困难的办法。一方面,责成资方积极改善经营,精减冗员,节省开支,降低成本,反对他们抽逃资金,躺倒不干。另一方面督促工人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协助厂方搞好生产经营,并顾全大局共同克服困难。有不少工人忍痛主动减薪,轮班回家或疏散,为维持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做出了很大牺牲。国家则大力救济失业工人。当

^① 中财委《关于全国金融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国务院秘书厅机要处档案料存1950年第17号卷,第65—75页。

^② 《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02页。

时中央人民政府拨出 4 亿斤粮食，作为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各地方人民政府也拨出一部分资金，企业均按月缴纳一定的失业救济金。救济办法以以工代赈为主，以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发给救济金为辅。当时曾有重点地尽量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参加国家公共工程的建设，如兴修水利、修建市政工程等，帮助渡过困难。随着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工人复工复薪，有的还增加了工资和福利，劳资关系趋于缓和。

（三）调整产销关系。

即如何逐步地克服无政府状态，这是经济改组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当时，私营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一下子就对其实行高度的计划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商业投机基本上受到控制之后，相对地、初步地作到私营经济的有一定计划性的生产，已成为可能；私营工商业因生产经营萧条，也有这方面要求。为了尽可能做到产销平衡，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召开了钢铁、机电、水泥的有组织订货会议，以及粮食加工、食盐运销、百货、煤炭、火柴、橡胶、毛麻纺织、复制印染、卷烟、油脂等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会上公私代表一起参加，开诚协商。按照以产定销（个别的也有以原料定生产）的原则，研究订货任务，制定产销计划，确定成品的质量标准，然后根据公私兼顾的方针合理分配生产任务，并且有重点地照顾困难地区。会上还公开比较成本，制定合理价格，粮食、棉纱、食盐等确定各自的销售范围，橡胶制品、卷烟等，则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自由贸易的原则。为了指导工商业的改组，早在 4 月底刘少奇讲话中就公开说明，过去服务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企业已没有前途，不适应国民经济需要和生产过剩的行业应该转业。转业的方向是服务于人民的需要，特别是适当地服务于农民的需要，而国家现在又不能办，或者虽然办了但还很少的事业。包括交通运输、矿产开采与提炼，电力和医药等重工业，国家都可以在适当条件下与私人订立合同，

允许私人办理^①。7月4日,中财委还发布了《关于适当限制某些已经过剩或已达饱和状态的生产的公告》,指出,火柴、卷烟、肥皂、面粉、纺织、酱油业已严重过剩,地毯、丝织手帕、针织、干蛋等依赖外销市场的工业,已超过国外市场需要,都应按产销状况适当限制产量。橡胶、玻璃、染织、硫化氢、油漆、毛巾、被单、钢笔、铅笔、灯泡、干电池、电珠等业已达饱和,不应再盲目扩充生产能力^②。诚然,资本家出于追求利润的本性,是不愿受产销计划约束的,当市场好转后,他们就力图摆脱国家计划的约束。但总的看,1950年下半年在解决私营工业经营困难时,调整产销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对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改组旧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三、调整工商业的成就

由于采取了上述正确的方针和措施,加上这一年农业有一个好收成,调整工商业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国民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在:

(一)私营工商业户从歇业多、开业少,转变为开业多、歇业少。据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济南五大城市统计。3月至6月,歇业超过开业的户数,工业为2.1倍,商业为4.3倍;7月至10月倒过来了,开业超过歇业的户数,工业为6.5倍,商业为3.5倍。开歇业的变化中,以上海的变化为最大。该市8至10月,工业与商业申请开业的平均户数,即分别相当于4月份的29倍与17倍;而申请歇业的户数,仅及4月份的12%。其它中小城市私营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9页。

^② 中财委《关于适当限制某些已经过剩或已达饱和状态的生产的公告》中财委编《中央财经通报》创刊号,第103页。

工商业开歇业变化，一般也自6月起，由歇多开少转变为开多歇少。由于生产逐渐恢复，各种产品产量逐月增加。以上海为例，该市棉纱、毛纱、火柴、水泥、面粉、碱、白报纸等七种主要商品，8月比4月增长约1至4倍。棉纺业不但原开工纱厂增加了开工锭数及开工时间，而且停工已久的14家纱厂的24万纱锭也于10月份恢复了生产。另据重庆市统计，该市工业用电（大部分为私营），6月比1至3月平均用电量增加28.6%，9月又比6月增加了44%，主要行业棉纺和卷烟9月分别比6月增加23%和35%^①。

（二）各地市场日益活跃，成交量增加。在商品市场成交量方面，仅据京津沪汉四大城市统计，10月较4月，面粉增加了54%，大米增加2.9倍，棉纱增加1.3倍，棉布增加2.3倍。内地中小城市同样活跃，据重庆市对8种主要商品成交量统计，7月比6月增加37%，8月比7月增加24%，9月又比8月增加86%。在票据交换总额方面，9月与3月比较，上海增加了50%，天津增加了2倍多。由于市场成交活跃，运输与汇兑也大幅度增加。10月铁路货运量与7月相比，北方各路局增加1倍以上，南方各路局增加3倍以上。全国汇兑额（国营银行部分）11月份较3月增加了3.6倍，而且中小城市快于七大城市，说明城乡物资交流相当活跃^②。

（三）带动了金融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全国七大城市公私合营及私营行庄，10月份比4月份存款余额增加80%，放款余额增加1.5倍，汇出入增加将近3倍。由于生产增加，市场交易活跃，国家税收也大幅度增加^③。据全国十大城市私营工商税收统

① 《半年来调整工商业的成绩及经济教训》中财委编《中央财经通报》第四期，第118—123页。

② 《半年来调整工商业的成绩及经济教训》中财委编《中央财经通报》第四期，第118—123页。

③ 《半年来调整工商业的成绩及经济教训》中财委编《中央财经通报》第四期，第118—123页。

计,1950年第3和第4季度比第1季度分别增加了90%和80%^①。

其次,国民经济从更深的层次上进一步优化改组。通过调整工商业,私营企业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逐步淘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不断增加。许多投机商业资本,在国家帮助下转向正当的工业生产;企业的经营方针改为面向农村,面向城市广大人民,经营方法也普遍地得到改善,并建立了新型的劳资关系。为了适应新的产供销情况,同一行业中不少企业联合起来,统一采购、统一销售,并且分工合作,扩大生产批量,提高生产效率,试制新产品。特别是通过有计划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不仅使国家掌握了更多的工业品,用以调剂市场、稳定物价和满足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而且限制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改造了私营工商业旧有的生产关系,引导他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① 中贸部《关于调整公私关系工作的总结》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档案科存1950年第332号卷。

邓小平主持的 1975 年全面整顿

张 化

1975 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严重混乱,使全国工作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毅然抓住历史机遇,大刀阔斧地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系统地纠正左倾错误,由此展开了与“四人帮”的一场新的斗争。

(一)

1975 年初的政治局势复杂而严峻。

发动“文化大革命”已达九年的毛泽东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为了维护和坚持“文化大革命”,1974 年他批准发动了反对所谓“复辟倒退”的“批林批孔”运动。左倾方针的再次强制推行,特别是“四人帮”的乘机作乱,使全国自林彪叛国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稍有好转的形势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1974 年国民经济没有完成预定计划指标。原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1%,实际仅增长 1.4%。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主要产品如钢、原煤、棉纱等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 26.6 亿元,出现 7.7 亿元的财政赤字;国家财政支出比上年减少 18.5 亿元。

面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中国社会再度出现的严重混乱,

毛泽东一方面对此感到不安,对于实现社会安定,发展国民经济表现出强烈愿望;另一方面继续坚持他的带有空想色彩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74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他在同李先念等人谈话时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他果断地揭露了江青等人在四届人大组阁问题上的野心,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把希望寄托在从长期革命斗争中表现出卓越领导才能的邓小平身上。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认定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74年底,毛泽东作出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强调要对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认为由于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及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由于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左倾方针,1975年1月四届人大通过的报告和宪法都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这些文件完全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作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四大”的权利。这些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仍在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的不断作乱仍使全国陷于混乱之中。1975年初,“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可是,一年前江青等人在全国“点火放炮”、“放火烧荒”、再次“夺权”的影响仍然严重存在。“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把四届人大的召开看成是权力再分配的机会,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张春桥公然鼓吹:“造反派要打天下,而且要坐天下”^①,“四人帮”一伙甚至内

^① 见中发(1977)37号文件。

定了国家和地方各级领导班子的组阁名单。他们在各地的帮派骨干分子也在“要砸开党的大门，改造党委领导”^①的叫嚣下，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有的造反派还迫不及待地给当地市委“发出‘通牒’”，附去具体的名单，“强令‘三天内落实‘官位’。”^②由于毛泽东的批评反对和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坚决斗争，“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最终遭到了失败。这使曾为“坐天下”而坐卧不宁的“四人帮”一伙人大为不满。四届人大闭幕后，他们唆使其追随者，继续在各地拉山头，搞武斗，抢夺部队武器，致使一些地区的邮路已经中断，铁路运输面临着中断的危险。在新华社编发的《国内动态》中可以看到徐州地区的情况反映。

1975年1月25日《国内动态》载：徐州×××等纠集一些人冲击领导机关，强占着市委办公大楼进行所谓“办公”。他们派人四处追寻市委领导干部，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只好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他们还在市中心私自架起十一只高音喇叭，日夜进行宣传，声称“不砸碎徐州市委这个乌龟壳决不罢休！”他们说：市委现在还象钟一样地正常运转。要使它停摆！我们来干！当市委负责同志给他们做工作，要他们落实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时，他们却说：市委是最大的山头。市委的大山头不撤，我们的山头就不撤。

“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不仅制造武斗，搞乱社会，而且千方百计地搞乱企业，破坏生产。他们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说成是“走资派所有制”，说什么“破坏一个工厂，搞乱一个企业，就是给走资派脖子上增加一条绞索”。在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地区和部门，则推行什么“用法家的手段管理工厂”，“用专政的办法办

① 1975年10月27日《国内动态》。

② 见中发(1977)37号文件。

农业”^①。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领导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怕”字，工作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75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防科委和江苏省委的报告中反映：不少单位的领导班子长期分裂。“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一部分人“还在那里你攻过来，我攻过去”，“争输赢，比高低，互相乱扣帽子，你骂我是‘宗派主义的产物’，我骂你是‘新的分裂主义’，还互相攻击对方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复辟势力’等等。”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

领导班子的状况，直接影响到生产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时不断出现紧急警报。在《国内动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反映：

××省“因缺煤，停产限产情况严重”。“目前，全省主要厂矿普遍只有两三天用煤”；××厂因生铁煤电供应不足，“1月份的生产仅完成月计划的54.1%”；“××市三分之一的工厂被迫停产……”

××省有“三个县部分社员群众外流要饭……”

“××市市场供应紧张”；××市“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春节前，杭州市从副食品到蔬菜，“大部分商品供应量下降”。“棉布、猪肉、蔬菜、食盐、糕点、火柴等都很缺，造成群众心理紧张，一看到有脱销过的商品出售就排长队抢购……”

这些反映各地情况的材料，虽然只记录了1975年初国内形势的几个侧面。从中，却可看到全国形势的严峻和艰难。

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和社会现状强烈不满，寄希望于老一辈革命家。当社会实践再次证明“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倒行逆施

^① 1978年第10期《红旗》杂志特约评论员：《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

的严重危害时，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和社会现状的不满更加强烈了。在一些大城市，抨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大字报公开张贴于街头。有的群众直接投书老一辈革命家表达殷切期望。四川成都市的一位工厂技术员在致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的信中痛斥“四人帮”这“三男一女”祸国殃民的罪恶，他写道：“军内军外，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们的眼睛都快要冒火了。”“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是谁，使国家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是谁又使国家落到这步田地。谁是人民的儿子，谁又是民族的罪人，人民都看清楚了。”“拯救民族和国家的重担，已经落在你们身上。”^①在工矿企业、社会团体，人们公开地对宣传媒介报道的“形势大好”提出种种疑问。各种讽刺“四人帮”的顺口溜和民间笑话在大街小巷不胫而走。1975年初，虽然四届人大通过的文件还在号召“全国人民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是，来自社会的大量信息表明，这场运动已经难以为继了。

由于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反对斗争，由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一直存在的良好愿望，1975年初中国政治舞台上新的转机出现了。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第1号文件，任命于1973年3月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四届人大的这两项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反响，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2月2

^① 《位卑未敢忘忧国》，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09—213页。

日,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提出在他治病疗养期间,由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的报告。从此,邓小平已实际上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二)

四届人大刚结束,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紧张地工作起来。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消除派性的问题。以此为开端,整顿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配合下,在各条战线逐步展开。

针对铁路运输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影响,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邓小平决定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战线进行整顿。正如1975年底,邓小平回忆全面整顿的发展进程时所说:“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各方面生产。所以,我提出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5日,邓小平到会讲话。他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〇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①这里,邓小平旗帜鲜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4页。

明地提出了要以四化建设为大局的思想。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提出的两步设想对于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还不充分,对阶段性战略目标也缺乏明确的规定,另外,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还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但是,以四化建设为大局这一思想的提出,却在实际上把四化建设提到了“纲”的位置,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树起了一面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立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邓小平还尖锐地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他强调,“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他说“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在这次会上,邓小平以紧迫的责任感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影响着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据一位负责同志回忆:工业书记会议召开那天,邓小平同志走进会场,见了大家没有握手,并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这一出乎意料之外的独特见面方式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第9号文件,即《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在这份文件上,邓小平亲笔加了这样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后,当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在全国铁道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九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他要求全国铁路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万里率领

工作组一边讲，一路跑，在很短的时间里，到了徐州、太原、南昌、郑州、长沙等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经过整顿，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严重堵塞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二十个铁路局中的十九个铁路局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平均日装车多1万多车；煤炭日装车达到7800多车，是五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

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整顿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3月下旬，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专门检查了九号文件的贯彻情况。这次会议提出：九号文件的精神，除了体制问题外，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这样，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整顿工作迅速在整个工交战线开展起来。随着整顿工作的开展，工业生产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局面。1月至4月，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

在这样的形势下，解决国民经济的另一薄弱环节钢铁生产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975年前四个月，全国欠产钢195万吨，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钢厂欠产严重。5月8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6月，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批示》指出：钢铁生产上不去的情况，“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地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在整顿工交战线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强调要以四化建设为大局，加快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时，有时也使用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这

三条是互相联系着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①。从邓小平的多次讲话和 1975 年中央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主要是针对着“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只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却不提后两项指示，意在强调三项指示不可分割；而在这三项指示中，邓小平强调的重点又始终是后两项，中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强调的这个中心，在他对国家经济状况的清醒估计上表现得十分明显。邓小平反对盲目吹嘘、夸大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他批评那种认为 26 年来工业生产总产值比 1949 年增加了 25 倍的看法，说：这不对，1949 年的基数太少，这样比，“会产生盲目性”。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公开讲，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当时江青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马上把她顶了回去，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②。

鉴于这种认识，9 月 19 日，当胡乔木报告说当前报纸上宣传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文章太少，已经布置邓力群负责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时，邓小平极为赞同，说：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如果写得好，我可以约几个副总理研究一下，再送主席审阅。主席同意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这篇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出发点，旨在批驳“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的文章写成后，虽然邓小平当时没有看到，但是 1977 年当他看到这篇文章时却十分赞赏。他借用了“四人帮”的说法讲道：“‘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

① 《党的文献》1989 年第 6 期，张沅生文《邓小平与 1975 年的全面整顿》。

② 见《党的文献》1989 年第 6 期，张沅生文《邓小平与 1975 年的全面在整顿》。

草。”

邓小平以四化建设为大局思想的提出和整顿工作的初见成效,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受鼓舞。但是,绝不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煽动反对所谓“经验主义”,便是他们对整顿工作的一次干扰。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借谈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提出了“反经验主义”的问题,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他别有用心地说,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张春桥还要求把学习理论,反对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姚文元则立即指使《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点突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要求新华社立即“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评论,这样才效果好。”江青亲自下达电话指示,强调:“现在我们党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①

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反对“经验主义”的文章,“反经验主义”的鼓噪一时甚嚣尘上。“四人帮”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时间,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危险”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舆论宣传领域。

“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骨干也四处活动,紧密配合。他们重新拉起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纷纷聚集在“反经验主义”的大旗下,一方呼喊,四方应合。其队伍组成有了不同于以前的特点,正如在中共广东省常委会上一位书记指出的:目前抬头的派性,

^① 中共中央(1976)24号文件。

表现形式有个特点,主要不是“派”与“派”之间闹,而是“派”与“派”联合起来向党闹。这些造反派公然鼓吹:“又一次反潮流开始了!”“要夺权!夺权!夺权!”他们公开煽动停工停产,扬言:“要拖住生产,硬把他们拖垮!”“要坚持斗争,与老家伙血战到底!”“反经验主义”声浪的卷起,又一次扰乱了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思想:

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是反击斗争,还是妥协忍让?关系到整顿工作的进退成败。半年前,针对“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对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的攻击,邓小平毫不退让,针锋相对,曾当面对开“帽子公司”、“钢铁公司”的江青说过“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的话^①。整顿工作开始后,他要求干部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起来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现在,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定要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其锋芒所向也很清楚,无异于是在政治局内部捅“马蜂窝”。许多老同志都为邓小平此举捏着一把汗。

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毛泽东还指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

^① 1974年7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江青动辄给人扣“帽子”,打“棍子”的作法,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江青故意把矛头转向邓小平,说“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吧”。这次会后不久,邓小平对江青讲了此话。

政治局委员谈话。虽然年迈多病，头脑仍很清醒的毛泽东，从“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中，对“四人帮”，尤其是江青断章取义、另搞一套的作法，又一次产生了警觉。他反复强调安定团结的方针和“三要三不要”的原则^①，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

毛泽东的指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但是，“四人帮”并没有认错。他们攻击政治局会议上大家的批评“讲话过了头”，是“突然袭击”、“围攻”。针对着“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同志继续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邓小平明确驳斥说，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他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也先后发言驳斥“四人帮”一伙的谬论。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义正辞严的发言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默然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九年来，象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这还是第一次。一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江青等人，现在沉闷垂首地接受批评，这也是第一次。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于一年多里“四人帮”干的三件事逐项进行了检讨：“第11

^① 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最后,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四人帮”煽动“反经验主义”的阴谋破产后,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自周恩来生病后,曾在名义上断续主持过中央工作的王洪文,至此结束了这一空名。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这时起,邓小平全面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这次斗争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为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打开了通路。

在以四化建设为大局的思想指导下,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形势日益好转。一直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四大钢厂的生产逐步上升。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帐。7月17日,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三)

正当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时,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务虚会。他说,前些日子一个一个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研究长远规划,通盘考虑一下。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9月中旬,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全国各方面都要进行整顿的任务。他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他还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他鼓励干部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要敢摸老虎屁股^①。

为了进一步扭转“文化大革命”以来各条战线被搞乱了的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全国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是整顿党组织,加强领导班子和党员队伍的建设。

在各方面的整顿中,邓小平认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②。邓小平把领导班子的整顿作为整顿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上半年,在工交战线进行整顿时,他就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③

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在“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手中,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就同“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进行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经过斗争,不仅在党中央内部形成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领导整体,而且在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启用了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这些老同志有着长期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8—9页。

革命经历和丰富的领导经验,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各条战线上的领导者。他们对于党在此过程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着比较深切的体验,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中思想觉醒较早,对于“四人帮”的面目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整顿领导班子时,邓小平明确告诉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同志要敢于使用老干部,同时,要注意选党性强、有经验、身体好的中、青年干部。他说,不要怕有人说你是什么“还乡团”、“复辟”、“倒退”,由他去骂,无非是让他骂十年。他认为,当前存在的一些值得注意的、令人担忧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①

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1975年中央在解除干部审查,重新分配工作方面采取了诸多重大步骤。4月底,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将原卫生部负责人贺诚女儿写给他要求给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提出了意见。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上作了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②。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③。针对王洪文1975年夏天在上海所谓“十年后再看”的扬言,邓小平与周恩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4页。

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要共同努力，决不让党、国家、军队的领导权落到“四人帮”手里。7月17日在中央下发的第16号文件中批准了浙江省委关于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上邓小平加了一句话：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报告提出要对“双突”人员抓紧教育，严肃处理，把被坏人“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

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区、各部门在整党中突出了反对派性、增强党性的教育。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在省委会上说：“现在还有人在搞分裂，搞阴谋，要顶住”，“要拼着老命干，不要怕打倒！”浙江省委规定：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参加任何派性活动。杭州市连续三次召开批判派性的大会，每场参加者逾万。

福州、武汉等地也召开了批判派性、对带头闹事的造反派头头进行审判的大会。

二是整顿军队，消除林彪集团在部队的影响，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建设遭到很大破坏。为了抵制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对军队建设的恶劣影响，早在1月25日邓小平就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军队的整顿问题，即改正不正之风和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邓小平于7月14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军队的状况，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他说：“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针对“四人帮”插手军队，煽动派性的问题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他提醒大家

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叶剑英还亲自给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一个一个地找人谈话，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透露给他们，严肃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会后，经毛泽东批准，叶剑英亲自主持了对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同时，对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部署也进行了调整。经过对军队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落实党的政策，在科技、农业、教育、文艺战线进行纠“左”斗争。

“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属的各研究机构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改变这种与实现四化的目标极不适应的状况，邓小平提出必须对科技工作进行整顿，尽快把科技搞上去。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担负着国防科研任务的七机部问题的报告。随后，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率工作组对七机部进行整顿。张爱萍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过来！他说：在困难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7月，中央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的报告，随即派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工作。针对当时存在的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看待，科研人员不敢钻研业务的倾向，胡耀邦鲜明提出：“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我们要进行新的长征……就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他尖锐指出，现在许多政治思想工作不是帮助科研发展，而是妨碍甚至破坏科研。他提出，业务、政治、行政三大部门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把科研搞上去。胡耀邦等人明确主张恢复室主任制，提出在科技战线不要提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当

有人说这是“复旧”时，胡耀邦反驳道：“不要以名词吓唬人，把科研搞上去，谁都得服从这一条。”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耀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起草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经邓小平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再由胡乔木主持修改，产生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9月26日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汇报提纲》，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份以纠“左”为中心，促进科研发展的文件，对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同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了要对农业进行整顿的任务。他着重强调了搞好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实现四化，更加费劲的是农业，如果搞不好，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会后，全国各地很快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开始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为了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所有这些，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

在科技整顿的同时，教育战线的整顿也在积极着手。四届人大组阁时，经过斗争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老干部周荣鑫上任后，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于教育的意见，针对教育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他否认十七年教育路线的要害是所谓“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提法，否定了“四人帮”帮派骨干提出的“与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他批评所谓的“两个估计”说：把十七年培养的学生都说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把知识分子都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错误的。他提出教育战线的主要问题是智育抓不上去。他说：“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他还说：大学教材搞压缩饼干，这不能算改革。课程不能只跟政治形势，不跟科技发展的形势。“四个现代化

不是业务,是最大的政治。”“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根据这些意见,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着重阐述这样一个中心思想: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文艺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使文化领域百花凋零,一片萧条。7月中、上旬,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谈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他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现象深为不满,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努力促进文艺政策的调整。他提出,文艺“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同时组织人调查文艺界的状况,向毛泽东转呈文艺界人士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件和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等问题。毛泽东先后对其中的一些信件和材料作了批示。7月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编剧的来信作了批示,指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立即批准发行了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与此相联,鲁迅的著作开始出版;在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时,《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节目重新公演;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批准举行。文艺界出现的新气象,使长期受压制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深受鼓舞。许多人开始对文化部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人公开提出,被“四人帮”一伙把持的文化部是一个有后台支持的“大行帮”;中央音乐学院有人贴出了指斥“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为亿万人民所不容”的大字报。所有这些,都对“四人帮”极左的文艺政策形成了强烈冲击。

四是加强思想理论战线的整顿工作,与“四人帮”争夺理论宣传阵地。

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理论宣传工作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可是,当时的思想理论和舆论宣传部门却为“四人帮”严密控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均掌握在“四人帮”手中。为了系统地阐述全面整顿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更加有力地与“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在全面整顿深入发展的重要时刻,邓小平提出:思想整顿量很大……思想整顿是关键。他把加强思想理论战线的整顿作为整顿全局的重要步骤,着手建立不受“四人帮”控制的思想理论队伍,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四人帮”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争夺战。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6月中旬,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于光远、邓力群七位老的理论工作者负责领导。7月中旬,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开始工作。邓小平提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并着手筹办可以“代表党的路线”的综合性刊物(后定刊名为《思想战线》)。当时,胡乔木在谈到创办这一刊物的宗旨、任务时,曾这样说:毛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思想战线》要反映“迫切的、尖锐的问题”,“比如,……现在全国有些地方不是还存在抓生产危险的思想吗?要在刊物中表达反映。”《思想战线》不单单是学部纯学术的机关刊物,它是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应当办成具有战斗性、现实性、理论性的、能代表党的路线、解决各条战线上许多思想理论问题的刊物。《思想战线》的创办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姚文元交待说:这件事在我思想上引起不小的震动。我管《红旗》,又要创办《思想战线》,不是要唱对台戏吗?《思想战线》一创办,会批判到我自己头上……。

作为全面整顿的产物,政研室一成立便适应通盘研究各条战线整顿发展的需要,参加了国务院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在工交战线整顿和科技战线整顿的过程中,政研室先后起草、修改了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两个文件，一个在工交战线，一个在科技战线，相互联系，紧密配合，有力地宣传了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成为工交、科技战线上实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文件。政研室还以邓小平关于整顿的一系列讲话和有关中央文件为指导，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文章集中概括了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尖锐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言论。这些文件的形成，在全面整顿深入发展的时刻，初步总结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和帮派活动，打破了“四人帮”在理论宣传领域的一统天下。

(四)

整顿工作的全面铺开，在短时间内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上层建筑领域，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它在政治上有以四化建设为大局的明确目标，在组织、经济、思想文化领域有针锋相对的纠“左”措施相配合，从而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又一次触及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

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又一次反思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从思想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认识。这些思想认识，开始散见于整顿中邓小平的多次讲话和中央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后经政研室理论工作者的概括，总结，集中反映在《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中。这些文件系统地概括和阐述了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一些思想理论是非，成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理论宣传

领域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的思想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要全面地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9月底，邓小平提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他还针对“四人帮”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中砍掉“百花齐放”的事实，指出：“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这就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在毛泽东的旗号下移花接木，另搞一套的伎俩。邓小平还提出，“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①。这个思想，在《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中得到了反映，这一文件提出：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不断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安定团结。《工业二十条》等文件指出，为了实现党内外的团结，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等。要加强组织纪律性，服从中央领导，服从上级领导，服从党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容许任何党员、干部拉山头、搞宗派，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和单位搞成独立王国。此外，对于造反，对于反潮流，要看造哪个阶级的反，看反什么性质的潮流。对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进行阶级分析。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3—34页。

——加快经济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工业二十条》等文件提出，我们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一切政党工作成就的大小好坏、路线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大小。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决不能把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针对林彪、“四人帮”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恶劣影响，《汇报提纲》等文件指出，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运动，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各有自己的特殊矛盾需要解决。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研工作都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的口号。要鼓励科技人员努力钻研技术和业务。在搞好大量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科学技术。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化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

——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在工业整顿中，邓小平对于总结我国已有经验极为重视，他向毛泽东建议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7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上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当国务院根据计划工作务虚会上多数同志要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意见，决

制定一个全面整顿工业的文件时，邓小平提出要在过去工业七十条的基础上制定这个文件，他说：“过去的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是要废除^①”。针对当时很多企业实际上实行的“党委书记一长制”，邓小平提出现在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如果将来工代会的制度健全后，革命委员会是否还存在？那时恐怕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精神在《工业二十条》中表述为：“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直接处理……要按照生产的需要和精兵简政的原则，建立精干的职能机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工业二十条》还提出，要建立和健全各项生产管理制度。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每一件工作，每一个岗位都要有人负责；每个干部、每个工人，每个技术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

——要多引进一点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8月18日，邓小平在谈到工业发展问题时说：“这是一个大政策”，“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②。《工业二十条》等文件进一步提出，发展生产要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

——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农业现代化。8月中旬，在国务院讨论《工业二十条》时，邓小平就提出过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的思想。根据这个思想，《工业二十条》写道：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安排，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工业越发展，工业比重越增大，越要重视农业。”工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9页。

业部门要支援农业现代化。城市要带动农村。每个工业城市要带动一个到几个县,帮助他们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举办小型工业,增加社队收入,改善城市供应。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在国务院讨论《工业二十条》时,邓小平还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①《工业二十条》写进了这个思想,具体表述为:按劳分配“在现阶段,它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要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

——关心群众生活。在整顿工作中,邓小平还专门提出:“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他说:“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②。”根据这一精神,《工业二十条》等文件提出:各级领导要生产、生活同时抓,要把群众生活上的问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尽管《工业二十条》等文件后来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但是,这些文件在起草的过程中曾在一定范围内征求过意见,它所包含的切中时弊、富有远见的思想还是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在“四人帮”发动的批判中,这些文件被广泛地印发,更是成为人民群众进行正反两方面对照,认清“四人帮”鼓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7页。

吹的极左思潮反动实质的绝好教材。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对此,邓小平始终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他几次讲过,各地经验证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拥护中央精神的。不高兴的人是少数,相信这一点。最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与1974年仅比上年增长1.4%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增长3.4%;钢增长13.2%;原煤增长16.7%;原油增长18.8%;发电量增长16%。1975年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清楚地表现出其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邓小平和他的战友组成的“作战指挥部”,“横下一条心”所要“扭转”的,不仅是严重混乱的社会和生产秩序,而且是力图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虽然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却是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他不断听到“四人帮”的亲信毛远新的汇报,经过思考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不过,他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他指示在政治局内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希望能够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小平婉言谢绝了。答复是: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11月2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对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了攻击和诬蔑,受到邓小平的严正驳斥。邓小平说:“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

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的态度导致了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11月底,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持续9个月的整顿工作至此中断。不久,邓小平再次受到公开批判,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虽然被迫中断,但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人民群众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矛盾却迅速地激化了,直接导致了1976年丙辰清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全面整顿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76年10月,党中央终于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它不仅有力地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的进程,而且成为后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先声。

邓小平与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

黄如军

在当代中国改革的时代大潮中,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受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在他的设计和指导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几乎是同时起步,并有步骤地稳步向前发展。

一、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提出和改革的初步进行

革除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弊端,避免“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演,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也是1978年至1984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关于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错误重演的提问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制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邓小平的谈话向国内外表明,正处在拨乱反正过程中的中国

共产党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深刻认识到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使人们清晰地意识到，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正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巨轮。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在引导全党总结、记取“文化大革命”教训时，就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一讲话和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充分的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践踏民主、破坏法制而提出的拨乱反正的重要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现在的体制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及有关问题。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邓小平在讲话中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除了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领导制度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强调制度方面的原因，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也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

走向反面。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因为在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这些弊端,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就不能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过去出现过的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问题,今后就还可能发生。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着哪些弊端呢?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又集中地表现为权力的过分集中,一方面权力过分地集中于某些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在中央和地方、党同政府、党同经济组织、党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上,权力过分地集中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基层权力集中于上级机关。权力的过分集中派生出其他种种弊端,这不仅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而且也不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号召全党要不断总结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坚定彻底的改革。通过改革,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只有这样,“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为了从根本上革除体制的弊端,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肃清封

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并着重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重大改革的六项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是:建议修改宪法,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的组织和各项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应当在宪法上表现出来;建议设立党中央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做是为了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干部的年轻化;真正建立起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以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推广和完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以解决基层组织党政不分的问题;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既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又提高办事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同时,准备有步骤地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必须尽快改革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以利于选拔和使用大批现代化急需的各种建设人才,搞好新老干部的交接班。邓小平指出,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因此,必须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不仅如此,这项工作还必须抓紧进行,太慢了不行,要趁大批老同志还健在的时候解决好这个问题。

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不仅仅限于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建国以来我国政治体制上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其实质是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

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建国以后,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我国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同时也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避免的,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臃肿、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等种种弊端,已不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实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三中全会后,他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郑重提出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认为,党政分开的实质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解决党如何正确领导的问题。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党委应当只管大事,管大政方针政策,而不管具体事务,不要具体抓经济管理部门。因此,“今后凡属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根据上述原则,从1980年起至1983年初,党和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划分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组织的职权范围,扩大和加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权,适当增加地方的权力。此外,党政分开还涉及到基层组织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就针对我们长期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普遍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果继续实行这个制度,就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从1980年起,在部分企业中开始试行厂长负责制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改为行政首长负责制,使企业事业单位的决策权从党委转到了行政首长,也使企业的党委摆脱了行政和

经济事务,集中精力抓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这样,既解决了党政分开的问题,又使厂长、经理有职有权,建立起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

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迫切要求解决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与党和国家各级组织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矛盾日益突出。对此,邓小平曾多次做过分析和论述。1982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他指出,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各级组织继续目前这种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就无法充分贯彻,人民是不会赞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现代化事业没有希望,甚至要亡党亡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他认为,要下大决心搞好这场革命,工作要细,要把精简机构和选拔、培养接班人结合起来,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进就是选好接班人,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各级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精简机构的工作首先在中央领导机关进行。到1982年上半年,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工作第一阶段结束。改革后的国务院副总理由13人减少到2人,新设国务委员10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过机构精简,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为60个,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3左右。仅据38个部委统计,正副部长、主任共减少6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32%,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58岁。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局级机构减少11%,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7.3%,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15.7%。在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16%,平均年龄由64岁降为60岁从

1982年至1984年,各地也先后开展了精简机构的工作。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稳步进展。在加强人民民主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及监督方面的功能大为增强;1980年进行了县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的素质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群众享有的民主权利也随着新宪法及其它有关法律的颁布而得以扩大并得到初步保障。在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方面,除采取党政分开的初步措施外,党中央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各级党委都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得到恢复和健全,随着纪律检查系统的设立,党内监督制度大为增强。在干部制度改革和建设方面,遵循“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通过设立顾问委员会、建立健全干部离退休制度等措施,大力提拔优秀年轻干部,干部队伍素质明显改善,初步形成了新老干部合作交替的格局。

总之,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从拨乱反正、医治“文化大革命”创伤开始,发展到改革整个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弊端,效果显著,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政治体制改革宏伟蓝图的制定和 这一改革的深入与“暂停”

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党在基本完成拨乱反正的情况下,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以建立商品经济新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步伐。改革的深入使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但同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却由于种种原因

进展缓慢,已经实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未能彻底落实,有的地方甚至程度不同地出现一些反复,例如1982年到1984年的机构改革就没有取得巩固的成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许多弊端,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现象依然相当严重,各级领导机关仍缺少应有的活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谋私、为政不廉、搞权钱交易、拉关系走后门等腐败现象仍严重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放权,一些地方却以各种借口往回收权,中央的方针政策难以有效地贯彻执行。甚至许多早已在中国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也鱼龙混杂出现在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中。

显然,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加紧迫的要求,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摆脱滞后状况并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发展。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并不是单纯地来自旧的经济体制,而且还来自与旧的经济体制紧密相联的旧的政治体制,“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①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再次郑重的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多次发表谈话,对进行这项改革的意义、目标及内容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看法和意见。

(一) 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邓小平首先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76、160页。

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① 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逐步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建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就要求缩小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程度,实行政企分开,适当分权放权,以利经济发展。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显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② 不仅如此,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邓小平指出,实践证明,中国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搞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生产力。

其次,邓小平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政治体制改革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其实质是通过改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民主权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显然,它的成功与否关系着国家、民族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兴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③

(二)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充分发挥社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7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64页。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① 其后,经过几年的改革实践和深思熟虑。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即把改革的目标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即长远目标无非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② 或者说,总的目标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③ 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邓小平认为,第一,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克服官僚主义,真正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概括起来就是增强活力、提高效率、调动积极性三大目标。

增强活力,就是增强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能力。邓小平指出,增强活力的最大问题,是干部的年轻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在解决干部的年轻化问题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就。但是,干部人事制度依然存在严重的缺陷,论资排辈、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退等现象还未能从根本制度上解决。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党和国家的活力,不坚决改革就会妨碍我们的事业。因此,邓小平再三呼吁,哪一天中国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优秀政治家、经济管理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就好了!他认为,中国将要有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学家担负重任!为此,要制定一些鼓励年轻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制度,要坚决执行干部年轻化的方针。当然这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能在15年内实现就很好了,邓小平设想,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到党的十五大时完成这个任务。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32、2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7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1页。

提高效率,就是提高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邓小平指出,效率不高同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等各种官僚主义现象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的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依然存在,机构精简走了一条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路子,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因此,邓小平强调,要把解决好党如何领导的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要通过改革解决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但是党政要分开,党要善于领导,党不能干预太多,机构要精简。

调动积极性,就是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的积极性。邓小平总结了我国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指出,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成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人,真正拥有相应的各项民主权利,名副其实地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因此,邓小平再次提出权力要下放,要下放到基层的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让他们参与管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还一再批评改革中出现的放权收权的问题,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继续放权。

(三)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确定了改革的目标之后,应当从哪些具体问题入手实现上述目标? 1986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指出,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第三

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还有一个内容是提高效率。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要找人理一下,理出个头绪。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86年9月决定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下工作。同时,中央还组织了各方面的理论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就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等组成了七个小组,进行各个专题的调查研究 and 论证工作。与此同时,学术理论界也就此开展了大规模的学术理论研究和探讨。在中央各专题研讨小组和学术理论界广泛的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过近一年时间,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经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于1987年10月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上述方案,并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共十三大的报告。

(四)描绘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致蓝图。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报告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第一,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

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报告强调,中央、地方、基层的情况不同,实行党政分开的具体方式应有所不同,报告还就此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

第二,进一步下放权力。报告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提出的改革原则是:“凡是适宜于在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提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在政府同企业事业单位的关系上,在党和政府同群众组织的关系上,报告也都提出了相应的处理原则。

第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报告强调,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要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控制能力。

第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报告指出我国现行干部人事制度上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使我们长期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年轻优秀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二是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报告指出,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

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制和规章,对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

第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目的是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其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第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报告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今后应继续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加强自身建设,加强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加强人民政协的组织建设,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能够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继续加强基层民主生活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

第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方面,加强立法工作,改善执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法制建设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成果得以巩固。逐步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总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法律化。

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设想,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方案出台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

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重要课题。

十三大以后,党和政府按照方案的要求,积极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党的领导和党内民主建设在制度化方面取得进展。根据十三大报告的要求,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通过了《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试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规则(试行)》、《十三届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试行)》;中央委员会全会也由每年一次改为每年二次;党内差额选举制度也开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实行。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先后制定了类似的工作规则,实行了类似的制度。其次,党同政府、人大的关系,特别是党中央同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基本理顺。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国务院也制定了自身的工作规则。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规则的制定,使党中央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自职能、工作范围和工作方式按照职能分开的要求,形成了合理的格局并且制度化。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十三大的要求进行了同样的改革。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基本形成。再次,根据十三大的要求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部署,各地普遍进行了企业党政分开和改革工作。经过改革,全国大多数企业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取得初步进展的同时,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和困难。除了旧体制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外,改革的深入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党政分开后,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关系的上下左右不协调现象增多,矛盾也相应增多;权力下放后,有些地方为了自身的局部利益而不顾国家大局,依然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不能很好落实,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有严重削弱的危险。正当党准备采取措施深化改革,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前几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一些问题,在1988年开始暴

露出来,使党和政府不得不集中精力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而随后发生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得十三大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度因之不得不大大放慢了步伐。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更深层次和更扎实基础上的继续推进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及当时国际形势的大气候,使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有必要冷静地反思过去,考虑未来。

首先需要考虑和回答的问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行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不对?相应的指导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错了没有?今后应当怎么办?这些都是急待回答而又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就在那场政治风波刚刚平息的1989年6月9日,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明确宣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具体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中共中央和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描绘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从总体上讲也没有错。有些问题与其说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某些改革措施引起的(的确有人这样认为),倒不如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还没有完全实施和深入推行所造成的。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也必须经历一个重新认识,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就是全党重温并再次确认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原则思想。

(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保持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①此后,邓小平多次阐述了这一根本原则。此外,无论是从改革的性质还是内容都要求改革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要有秩序,最主要的是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②

(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足本国实际,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针对一些借改革之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要求搞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邓小平一再严肃地指出:“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就是说不能搬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实行改革的步骤。”^③所谓“西方那一套”,就是一些人竭力推崇的“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议会制,他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对这些错误认识,邓小平曾作过分析,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00—30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99页、284页。

③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446—1447页。

办法我们不能采用。”^①1989年政治风波刚刚过去，邓小平又明确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的三权鼎立制度”。^②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点，符合中国国情，坚持这一制度，就是从根本上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三）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采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是对旧体制的革命，又是新体制建设的过程，只能在不断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生产力、提高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同时相应地进行，决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获得成功，更不能指望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因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适合于“破坏旧世界”，而不适合于“建立新制度”，“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上不同的两回事。”^③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体制上的问题要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要先从一两件事情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④

（四）政治体制改革要勇于探索，细心谨慎。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本身的需要，原有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不改革就没有出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9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0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96页。

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9页。

路,改革是势在必行。但是,改革又不可能有任何现成的本本和经验可资借鉴,也不可能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以供搬用,只能是通过自己在实践中勇于探索、找到道路,只能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所做的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有些事业不可能一次完成,甚至有时还可能出些差错。这不要紧,只要我们勇于探索,而又细心谨慎,错误就可以随时得到纠正。”^① 勇于探索和细心谨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之所以必须细心谨慎,因为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②

在党重温和确认政治体制改革一些基本原则的同时,也基本上完成了对经济工作进行治理整顿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92年初视察中国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我国的改革开放又掀起了新的大潮,使一度处于“暂停”状态的政治体制改革再次启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对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步伐作了新的部署。其中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四大报告指出,为了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十四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民族团结,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切实发挥职工代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4—145页。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9页。

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加强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

根据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十四大提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项任务：

第一，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这次机构改革的重点在于，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十四大报告指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因为，目前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许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障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必须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下决心对现行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进行改革。报告要求这项改革在三年内基本完成。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相当一部分部门已相继完成机构改革。

第二，加快人事劳动制度改革。一方面，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关于国家公务员制度，自中共十三大提出这项改革任务后，有关部门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这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将从根本上改进传统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使干部人事制度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94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法国发表重要演讲，并再次重申：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相互配套、相互适应。那种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至少是一种误解。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我们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巩固和完善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改革和完善我们国家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实行政企分开,精简党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干部制度,以利于增强国家机关的活力,调动各个方面特别是广大基层的积极性。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正在得到发展和健全,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从而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证。^①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并经过党的十四大的再次启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在更深层次和更扎实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地向前推进。

^① 《人民日报》1994年9月13日。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郑世铨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是党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严峻的形势与任务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了除台湾和西藏以外的全部国土,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但是,当时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首先,旧的经济结构解体,新的经济体系尚在形成中,工商业界发生了严重的困难。1950年5月8日到26日中财委召开的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出,这“主要表现在商品滞销,生产减缩,关店歇业增多,失业人数大大增加。”“困难的程度是大城市重

于中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重于其他地区。”^①

据上海等十一个大中城市的调查,歇业的厂、店高达 12750 家,开业的不及 1/3,仅 5903 家。当时国民经济的特点表现“大国小生产,小生产又表现为很大的过剩”,存货很多,卖不出去。

中财委主任陈云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他说:“第一是通货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这就是说,人们在过去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时期,为了避免钞票跌价的损失,不愿存放钞票,宁愿竞购和囤积并不是为了消费的货物。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他们不但不再囤积货物,而且将过去囤积的物资吐到市场上来。这样就使市场上若干货物一时供过于求,生意不好,许多工商业者发生困难。……第二是过去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另有许多货品也不合人民需要的规格。这种情况引起了一部分工商业的倒闭,从而发生一部分工人失业的现象,需要救济及转业。第三是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企业经营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润少,甚至还要亏本。这也引起许多工商业发生缩小营业,甚或停工歇店的现象。必须重新调整,才有出路。第四是经营中的盲目性,同一行业内部盲目竞争,地方与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这也引起许多企业减产、停工和倒闭。至于因为长期战争,人民购买力大为降低,使得工商业不景气,则是人人共知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这些问题现在之所以突出,是因为长期间存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情况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②

其二,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组及其所带来的暂时困难,使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第 21 页。

② 《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101—102 页。

资产阶级和我们的关系一时显得很紧张。他们怀疑共产党要实行社会主义,惶惶不可终日,消极经营,乃至遣散职工,关厂歇店,有的资本家甚至弃厂潜逃。武汉的商人说:“挂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表现了内心的惶恐不安和对我们的不满。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改组,私营工商业的停工歇业,更带来了失业大军的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3月至5月初,“各地新失业的有十万人,全国失业人数达到万人。”^①

由于战争在继续,新区在扩大,财政支出在增加,工商业者的负担在加重,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最重。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意。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②

其三,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到1950年6月,台湾、西藏还没有解放;在已解放的土地上,尚有40多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以及土匪在兴风作乱。三亿一千多万农村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这些地区的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依然尖锐地存在着。不完成土地改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就不能巩固,经济就不能恢复,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起来。倘若决计实现三亿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他们会扑过来全力反对。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第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6页。

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①

其四,帝国主义继续支持蒋介石,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新中国建立不久,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不稳定时期后,其驻外使馆开始得到明确指示,称美国目前不想讨论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其后,并处心积虑地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统一战线”。

为了遏制新中国,美国还拉拢、拼凑一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对新中国的包围圈,妄图抵消新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大幅度地改变对日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植日本,使日本变成它在远东地区对付共产主义的“遏制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通过拨款法案,加强了对中国周围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

美国还阴谋策划分割我国领土台湾。为达此目的,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曾设计了种种方案:在台湾培植取代蒋介石的势力,其主要对象一是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一是反共的台独分子;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削减对大陆国民党的经济援助,把重点转移到台湾;争取国际支援,实现台湾“托管”等。但这些方案都没有能行通。1949年10月间,美国政府终于确认蒋介石是“台湾的最终真正权威”,决定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当天,美国军方即要求艾奇逊进一步向台湾提供军援。5月3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交给艾奇逊一份备忘录,宣称美国应当在台湾显示“决心和信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台湾“中立化”。驻远东的美军事将领麦克阿瑟公然提出台湾在战时将是美“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防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1—22页。

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甚至还提出要考虑美国不惜动用军队拒共产党于台湾之外。不久,美国政府公然决定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由此,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鉴于如此严峻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我党必须及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继续完成民主革命尚未彻底完成的任务,同时必须迅速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以巩固新生的政权,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而最根本的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是一场异常艰巨的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所面临的形势和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会议的一般情况

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议程和要求,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26日作了决定并发出通知。

中央通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将于6月11日开会,为了准备和通过提交全国委员会讨论的各项主要问题并讨论其他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前,召开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全会议程为报告并讨论土改、财政、经济、军事、政治和整党的组织及整党等项问题。”“全会日期定于6月6日到6月9日,共四天,准时开会,不延期,不延长。各地同志务于6月5日前到达北京。”“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现在北京、天津、太原者,必须一律出席,各大行政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必须留原地主持工作或因交通不便无法赶到者外,亦须一律出席。”“各直属省、市党委会书记,与交通便利地区的省、市书记,均列席中央全会(灾情严重地区除外)。”“中央直属各部委及中央人民政府党组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列席人员名

单,由中央决定后通知。”

其后,按照中央通知的要求,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 35 人,候补中央委员 27 人,并有各省市党委书记及其他工作人员 43 人参加会议。在如期举行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此外,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全会讨论了并一致同意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及其他报告。

全会上,还另有三个专题报告:薄一波关于税收问题的报告;安子文关于党的组织情况及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胡乔木关于整党工作的报告。此外,几个大行政区的负责人也在会上发了言。

这次全会,还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关于撤销刘子久同志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以及关于撤销黎玉同志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

中心任务及策略方针

七届三中全会作为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会议,不仅因为这次会议是在伟大的历史转折之后执政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而且还在于这次会议主要的中心的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以及为此所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全会讨论并一致同意的毛泽东的报告,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刘少奇等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也主要是围绕着怎样创造条件实现

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这一中心议题。

毛泽东充分肯定从渡江战役起 13 个半月以来所取得的胜利。他说：“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他还说，“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①“我们现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要经费的大量节减。”^②

为了创造上述三个条件，力争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并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毛泽东提出全党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以下八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应在 1950 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2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18 页。

力^①。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②。

要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需要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制定战略策略方针的指导思想。

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6日的开幕会上讲了话,9日闭幕会上做了总结,会议中间于8日还讲了一次话。这三次讲话,毛泽东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充分论述了“争取多数,反

① 当时任军委代参谋长的聂荣臻指出:“到一九五〇年六月,我军总人数达到五百四十万人。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保留这样大的一支军队,显然是不适宜的。根据中央指示和同各大军区商量的结果,确定我军保留总人数为四百万人。”“确定保留四百万人,也就是说,要复员一百四十万人,这在全国是破天荒头一次。”——见解放军出版《聂荣臻回忆录》(下)第721页。

② 关于八项工作的内容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8—20页。

对少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的思想,并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后来,根据这几次讲话,整理成题为《不要四面出击》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不要四面出击”,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几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对《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书面报告作的说明,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报告》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①

在“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指导下,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对民族资产阶级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就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处在领导地位,它和私人资本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页、24页。

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不同，要加以区别。但在其他问题上，则要“一视同仁”。即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应、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陈云在三中全会上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说，“五种经济成分是兼顾好，还是不兼顾好？当然是兼顾好。”“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国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①

为了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央决定减去许多税目。原先税收项目有 1110 多个，全会后减去 800 多个，只剩下 300 多个，有些税率也减轻了。这样做，大大缓和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时也缓和了同工人阶级的紧张关系。

——认真而谨慎地处理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

统一战线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的一大法宝。建设新中国，依然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全会指出，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②

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应当“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无产阶级的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待遇上，要“一视同

^① 《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23 页。

仁”。关于团结各界民主人士，毛泽东指出，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①

——缓和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

建国之初，我们从乡村到城市，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宣传教育机构、学校和文化团体、企事业单位。对这些单位中的大量知识分子，我们采取什么政策，至关重要。是要他们还是不要他们？是团结他们还是抛弃他们？是改造他们还是赶走他们？中央认为，不要排斥他们，不要抛弃他们，而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他们为新中国服务。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约有 200 多万人，他们的绝大多数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性。但是，他们还没有同共产党相处，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在他们头脑里主要还是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使之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指出，改造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他说，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他主张缓进，主张用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19 页。

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①

——处理好同少数民族的关系

当时，全国少数民族约有 3000 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务必谨慎地稳妥地进行。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强调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② 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③ 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关于土地改革的新政策

如前所述，七届三中全会是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召开作准备的一次中央全会。中央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要提交全国政协委员会审查讨论；刘少奇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因此，研究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是这次中央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的任务，也是巩固新生政权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毛泽东指出，在全国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是获得财政经济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2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2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版，第 23—24 页。

状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条件。道理很简单,全国90%以上人口在农村,农业人口超过4亿,当时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只有农业人口1.45亿(总人口约1.6亿),尚有约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总人口约3.1亿)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各地请求在当年(1950年)冬季实行土地改革的人口就有1亿多。正如刘少奇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最后说的,这样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有秩序有步骤地有分别地去完成,“就为我们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就在政治上将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政府就能达到从来未有的强大和巩固了。”^①

我党有关对富农经济的政策曾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的修改中,加写的一段文字,对这个过程作了这样的说明:

“1946年7月至1947年10月,华北、山东及东北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和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实施土地改革中,没有能够按照中共中央在1946年5月4日颁发的基本上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指示,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动,将富农的土地财产和地主一样也没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工商业,并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将某些富农当成了地主,将某些中农当成了富农。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10日颁发了土地法大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7页。

纲,将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但允许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同年冬季,中共中央颁发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文告,任弼时也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演说。从这时起,农村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轨。”

而在建国后的这次土地改革中,对富农经济实行什么政策,对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至关重大。党中央对此十分审慎。三中全会之前,毛泽东特电各地征询在对待富农策略问题上的意见。电报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关于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重要。”^①

由于酝酿已久,到了这次三中全会,意见成熟。全会决定,党对富农经济采取新的政策——即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一政策明文写进了中央建议草拟的土地改革法。后来,这个土地改革法(草案)被提交1950年6月14日开幕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审查讨论,并于6月28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6月30日又由毛泽东主席颁布命令正式施行。

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就土地改革法有关条文作了如下说明: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4页。

“第一，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加以保护，不得侵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富农经济。

第二，富农所有的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因为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不多，为了确实地中立富农，并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富农这一部分出租土地，也是有必要的。但在某些特殊地区，则有不同的情况，富农出租的土地相当的多，如不征收富农这一部分出租土地，贫苦农民就不能分得适当数量的土地。因此，在这些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第三，是有少数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者，对其出租的土地则是应予征收其一部或全部的。例如富农出租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时，这就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富农，而是一种半地主式的富农了，所以土地改革法草案规定：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或雇人耕种的土地的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①

为什么在过去的土地改革中曾经允许农民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而现在又主张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呢？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这次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防止乱打乱杀；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情况不同了，土改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大，地主叫唤的声音亦将特别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第 36 页。

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全会上,刘少奇纵观全国形势的发展,说明我党对富农经济实行新的政策的可能和必要。他说:现在形势已经与过去根本不同。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基本结束,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的性质,已经不同于我们在过去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现在的困难主要是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是恢复、改造与发展社会经济上的困难。同时,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革命大团结,已经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的也比以前有了改变,如果人民政府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一般的是能够争取富农中立的,并且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都是必要的,是比较对于克服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为有利些。

消灭封建制度,保存富农经济,这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刘少奇在《报告》中讲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于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①

全会指出,为了汲取历史上(1946年7月至1947年10月)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所执行中央政策产生的偏差的经验教训,在今后土地改革中,不能允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允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0—41页。

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

全会的伟大历史作用

七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历史证明，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三中全会的路线指引下，党的各项工作迅速见效。到1952年，即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除台湾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1952年6月24日，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讲话，列举事实说明了两三年来，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已达到了预期的要求。他说：“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大体上已恢复并部分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水平。就粮食来讲，如以1949年的总产量为100，则1951年的总产量已增加到128，今年预期可以达到137，将要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平均年产量，其中小麦和大米等主要粮食将要超过抗日战争前的平均年产量。棉花的增产更加显著，如以1949年的总产量为100，到1951年总产量已增加到252，今后预期的产量又会超过去年，这样，我国棉花的产量就远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其它农产品的产量，三年来也有同样显著的增长。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并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使我们可以不再依靠从外国运来的洋米、洋麦、洋棉，完全依靠自己的生产来满足全国人民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在工业生产方面，我们也同样已经恢复并部分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我们的重工业原来是很幼稚的，战争中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恢复起来，并进行了初步的调整。今年煤、铁、钢锭、钢材、机器等主要产品的预期产量，有的可以接近，有的可以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轻工业的恢复

同样显著,就最有代表性的纺织工业来讲,如以 1949 年的棉纱产量为 100,则 1951 年的棉纱产量已增加到 124,今年预期可以达到 162 以上,也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的年产量,此外如造纸、橡胶等工,都有显著的发展;就连最困难的卷烟工业,今年预计产量也将要远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现在我们的轻工业还有相当大的潜在力量,我们的工业产品又有着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它的继续发展是完全有保证的。除生产的恢复外,我们还开始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速度,进行着某些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如从满清末年以来四川人民盼望了几十年而没有兴修的成渝铁路,现在以两年的时间即已建设完成,下月一日即可通车;陇海铁路在今年十月也可以通到兰州。从去年开始的伟大的淮河水利工程和今年开始的荆江分洪工程,按其规模和进行速度来讲,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当然从中国经济建设的远大前途来讲,我们还只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①

对这三年的成就,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亦于 1952 年 8 月在他的《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作了这样的概括:“1950 年 6 月,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大约需要三年时间,现在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目标。”^②

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同时,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政治上,社会秩序稳定,各族人民安定团结,人民民主专政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而这一切都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① 《新华月报》1952 年 7 月号第 33 页。

② 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形成发展大事记(之一)

编 写 组

编者按:为配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的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我们以这一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为主干,组织编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大事记》,用意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提供比较系统、精粹的历史背景材料,以帮助读者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在中国继续开拓前进的历史需要而产生、形成和发展,以及这一理论又如何反作用于实践,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世所瞩目的巨大成功。从而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晰、完整地看出这一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对当前的学习有所助益。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命题的正式提出

(1978.12—1982.9)

概 述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得以在全党确立,在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中,在总结建

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两大基本问题,在认识上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时,首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同年11月,他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其后,以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标志,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终告基本完成。十一届六中全会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总结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10个要点。六中全会并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重要判断,这不仅标志着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上的重大认识的进展,更直接为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这一理论后来形成体系提供了初步的基础。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明确提出也就成为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显著标志。以这一科学命题作为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把继续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提出了在本世纪末使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历史任务。这些不仅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这一阶段,党在全面清理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理论的影响,在各条战线全方位的实行拨乱反正,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同时,其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一

是1979年初以后党积极总结了四川、安徽等地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使之向全国农村迅速推广，形成了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业改革大潮；与此同时，党还积极领导、进行了国营工业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并初步为下一阶段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二是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并在一年后批准在两省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之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迅速展开。特区以其特殊政策吸引了海外大批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办法，使特区经济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活力，为内地的开放发挥了窗口和示范的作用，极大地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而这一阶段亿万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创造出的新鲜经验和作法，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材料。

政 治

1978年

12月18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这一中心，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合社会主义实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实行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还郑重宣布：“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

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严肃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实行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并在科学总结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巨大历史功勋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调整、充实了中央领导成员。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等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等9人被增补进入中央委员会，从而实行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全会还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提出了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最终结束了党和国家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工作的徘徊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三中全会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基石。这样，以完成工作重点转折和号召全党解放思想，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作为一个伟大的转移点而被载入党的历史。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始，也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被历史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开始发生巨大的、全面的飞跃。

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副秘书长,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会议决定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2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授权发表声明,重申南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外国对南沙群岛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1979年

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和平统一祖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建议台湾和大陆之间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文艺观摩;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同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热烈拥护《告台湾同胞书》,表示要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同心协力,共同奋斗。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问题已提到了具体日程上来。《告台湾同胞书》是一个具有意义的文献,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也根据《告台湾同胞书》和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命令,自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1月4至22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研究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问题,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有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1月5日 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我们将采取多种

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的统一问题。”

1月7至11日 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问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他还在这次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

1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此,中央决定:除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方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1月18日至4月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胡耀邦作会议引言,讲了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3月30日,邓小平向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在批评怀疑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倾向的同时,也尖锐地揭露了当时某些人以所谓“社会改革”的名义

鼓吹全盘资本主义化。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为此，他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阐明：“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讲话中，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提法相对他在50年代提出的搞建设要“面对国家的现实”的提法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总之，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为尽快把国家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生产力所实行的改革事业，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明确提出，则标志着无论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完善，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续发展丰富，都大进了一步。

1月29日至2月5日 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应邀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说：“用什么方针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邓小平这个讲话表明，作为建设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理论实际上已经初步提出。1月31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2月1日，发表新闻公报。

2月14日 叶剑英接见新华社记者谈法制建设问题。他说，法律和制度必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绝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检察机关和法院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忠实于人民利益，

忠实于法律和制度。要有一批无私无畏的检察官和法官，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要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他强调，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

2月17日 中共中央宣布撤销1967年1月13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同日 中共中央转发《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纪要》。中共中央的批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检察机关的工作，充实检察机关的力量，并使之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以便检察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畏权威，不徇私情，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3月9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问题平反的通报》。《通报》指出，康生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必须予以推翻。

3月19日 中共中央作出撤销1971年8月1日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批判了《纪要》否定教育战线17年的伟大成绩的“两个估计”，解除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搞好教育工作的积极性。

3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党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告》。《通告》指出，当前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一定要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把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

5月3日 中共中央同意总政治部的请示报告，决定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对受株连的同志一

律平反。中共中央批语指出，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给予纠正和平反。

6月15日至7月2日 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他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他又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6月18日至7月1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致开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确定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对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作了科学分析，纠正了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倾观点。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七个重要法律。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即在全国展开。

7月9日至25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纪委成立7个月来纪律检查工作的情况，分析了党风、党纪的现状，研究了进一步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坚决而有步骤地搞好党的建设的若干问题。胡耀邦于22日向会议作了题为《关于搞好党风，严肃党纪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对如何搞好党的建设提出要求：1. 教育党员干部坚持执行和

维护党中央所确定的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一整套政策；2. 认真地坚决地同派性作斗争；3. 把各级党的组织生活搞正常；4. 要努力克服一部分党员，特别是党的某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腐蚀党的肌体的歪风邪气；5. 恢复党内斗争的优良传统；6. 有步骤地改革党的干部制度。

7月14日至8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在京召开全国检察工作会议，讨论确定施行新法律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具体措施。彭真讲话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干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全国任何地方、任何人都统一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办案，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7月29日 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作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讲话。他指出：现在我们已经确立和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

8月15日至9月3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当前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性质、任务、方针和基本政策。会议强调，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包括广大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乌兰夫在总结讲话中指出：遵照中央的指示，现阶段统一战线当称为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它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担负着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和统一祖国的双重任务。其基本政策精神，就是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题目，严格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坚持正面说服教育方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

9月5日至10月7日 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提出要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胡耀邦就关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问题讲话指出：当前组织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提高全党同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坚定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他还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党的组织工作上一些与四个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问题，要准备花三年左右的时间加以解决。组织工作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在全党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今后再也不用这种办法了。

9月14日 中共中央批准的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在北京大学传达。决定指出：1958年，对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和综合平衡问题的讲话、文章，错误地进行了点名批判。他的“新人口论”的观点和关于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各部门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观点是正确的。

9月25至28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历史经验，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选举赵紫阳、彭真为政治局委员。全会提出了今后的奋斗目标，强调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对统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有重大意义。

9月29日 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取得的重大成就，初步总结了建国30年来的经验教训，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10月14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中央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要把统战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要加强统战政策

的再教育。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提出的新时期统一战线的 10 项工作为:1. 继续抓紧落实政策,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 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工作。3. 加强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工作。4. 认真贯彻对党外人士的安排使用政策,搞好党与非党的合作共事关系。5. 继续做好对原工商业者的工作。6. 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实践中帮助党外人士继续实行思想改造。7. 加强民族工作。8. 全国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9. 开展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10. 开展对外友好活动。促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10月19日 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邓小平在当晚招待会上讲话强调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实现四化和统一祖国大业共同奋斗。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11月2日 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的报告。报告说,人民群众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干部特殊化。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首先就要从高级干部整起。为此,中央制订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一经下达,就要当作一个法律坚持执行(规定于11月13日正式下达,就高级干部的宿舍、房租、生活用具、交通工具、食品供应、外出休养等作了10项规定)。

11月12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单位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时,有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被带进公私合营企业,把他们统称为私

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是不妥当的。文件下达后,按照文件精神,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被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身分。

11月26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外国朋友,谈话中,他首次论述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他强调,实现现代化是一场新的大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他并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12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明确提出中国本世纪末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并将他首次提出的“小康”概念界定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

1980年

1月1日 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80年代是实现四化的重要年代,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根本的一条。我们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这是邓小平继1979年3月30日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首次阐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以后他在各种场合又多次强调这一点。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指出,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80年代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邓颖超则就祖国统一问题在会上

指出：《告台湾同胞书》宣告的大政方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决策。

1月7日至25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确定1980年年纪律检查工作的中心任务。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并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

1月1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干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指出了80年代应做的三件大事，即：1. 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 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3. 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是三件事中的核心，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1000美元左右，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还在报告中首次明确论述了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60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另一方面要看到，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他强调：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于把党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月11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全国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最近在北京举行。彭真副委员长在会上讲话，他说，选举是各级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础。县级直接选举，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再由县级人代会选举县级人民

政府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样9亿人民就可以通过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命运。他强调指出,这次选举制度有两顶很重要的改革,一是县级代表直接选举,一个是候选人和应选人不等额。

2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改变省、市、自治区及以下各级党委纪委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的批语说:中央同意,将各级党的纪委会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国务院各部、委、局党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亦适用于上述双重领导的原则。

2月23至29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3月15日 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坚持党的路线、坚持集体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等12方面的问题作出原则规定。同年6月6日至21日,中纪委为进一步贯彻准则,召开国家机关各部委贯彻《准则》座谈会。座谈会提出,贯彻《准则》一定要注意扫除封建意识。当前很多不正之风都同封建意识有关,如干部制度上实际存在着的终身制、个人迷信、任人唯亲、一言堂、阿谀奉承、搞特权等。

3月19日 邓小平看了根据中央决定成立的起草小组提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宜粗不

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向前看。

4月8日至16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建议,认为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会议据此通过《关于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建议删去有关“四大”的一段文字,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决定。会议还决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通过了《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划问题的决议》、《关于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草案的决议》。

4月11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罗德克谈话时说,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是鉴于国际的经验,也有我们自己的经验。邓小平还说所谓集体领导也不排除某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特殊作用,比如说毛主席就是这样突出的典型。

4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丧失工作能力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这是中共中央为废除实际上存在着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5月31日 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提出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原则。他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是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6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统战部的报告指出: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划了右派分子49万余人,

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 55 万余人。1959 年 1964 年,先后 5 批摘掉约 30 余万人的右派帽子。1978 年又根据中央指示着手进行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工作。《报告》还就上层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工作的三个重要问题向中央作了请示报告:1. 关于 27 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问题。2. 关于“章罗同盟”问题。3. 关于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统一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问题。反右斗争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了扩大化的错误。肯定反右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目的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中央在批转了统战部的报告之后,通知并要求各地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这是中央根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

6 月 21 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基本结束。下半年各地将普遍进行县级直接选举。当时全国大约有 550 多个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进行了选举试点。

7 月 30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指示》。《指示》指出: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仍有一些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纪念文章多了一些,一部分纪念文集重复积压,特别是许多纪念方法严重地流于形式。有时甚至为了收集个人文物,成立专门小组,跑遍全国。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文件针对以上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8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主要内容为,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顾问和顾问组(3 人以上可设立)在同级党委(党组)和行政负责人领导下工作;其任务主要

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帮助党政领导出主意,当参谋,并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年轻一代;党员顾问组长不设顾问组的顾问可列席同级党委(党组)会议;顾问为在编干部,一般不再兼任人大常委会、政协的职务。

8月18日至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及相应有关问题。18日,邓小平向会议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其核心则是权力过分集中。这类弊端,大多是由于缺乏经验,对一些问题采取了不科学的解决办法而形成的,但它们也“多少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同时,还有一个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在提出这些历史性任务的同时,邓小平还代表中央提出了准备实施的若干具体改革措施。他还强调,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邓小平这个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8月21、23日 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回答了他的提问。当谈到毛泽东时,邓小平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当被问及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我们干部职务

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这种现象重复,要从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8月21至26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议程;通过了提请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以及国籍法草案、婚姻法修改草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个人所得税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意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8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北京市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说,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切实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指示,废除党委审批案件的做法。这是关于党委领导司法工作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改变了党委包揽司法业务的习惯做法,有利于克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的弊病,从领导关系上保障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

8月28日 五届政协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它在我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8月30日至9月1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等问题。会议检查了因1977年、特别是1978年追求经济建设上过高指标,导致建设上的“冒进”所造成的一百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与会代表直率地对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质询、批评和建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

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不再兼任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辞职请求,另由适当人选担任。这次会议,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9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叶剑英担任这一委员会的主任并讲话指出:修改的宪法要能反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使全国各族人民更能充分地行使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权力;使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得到更充分的实现;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工作,它们的常务委员会的权力和工作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加强。

10月19日 彭真在会见外宾时说,现在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国家体制问题,也牵涉到党的体制。我们国家体制最大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中央集权过多,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兼职现象比较严重。现在我们准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都不兼职。要把中央权力分下去,就是把权力下放,同时要健全和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去我们的立法权都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要将一部分立法权分给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只要跟国家宪法和法律不抵触,地方可根据需要制定本地区的法律、法令。

10月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0月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出版,收入陈云1956年9月至1962年期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23篇重要文稿。

11月10日至1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

方案。会议讨论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重大错误。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华国锋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阻碍解放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他热衷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损失，他有重要责任。中央政治局认为，他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宜的。会上，华国锋要求辞去现任职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决议：1. 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2. 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会议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是有功劳的，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希望六中全会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11月14至24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传达和阐述了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重要意见，并就坚定不移地搞好党内问题作了重要讲话。1981年1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座谈会的《纪要》。中央指示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是当前全党一项重要的任务。邓小平去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陈云在这次纪委会会议期间提出的重要意见，是我们搞好党风的基本指导思想。从领导做起，层层带头，一级抓一级，是贯彻执行《准则》、纠正不正之风的关键。特别是中央一级党政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部队军以上领导干部，更要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首先做出榜样。

12月14日 胡耀邦答希腊《黎明》报主编问。胡耀邦说，我们党一致的看法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一场灾难。这十年使我国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思想、党组织都遭受很大破坏。

他还说,我们实行的改革是两个方面的。第一是政治方面,主要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恢复党的好传统好作风。第二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前重要的是进行经济调整。

12月28日 《周恩来选集》上卷(收入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在全国发行。以后,下卷(收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也于1984年11月出版。

1981年

1月6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国家机关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共中央认为,加强党和非党的联盟,充分发挥非党同志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是当前干部工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不仅要选拔党内的优秀干部,同时也应大胆选拔党外人士包括他们中的中年人。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应该建立和恢复与党外同志合作共事的好传统。把他们中符合条件的人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包括少数条件适当的党外部长、厅长、局长、市长、县长等),共同管理好国家,这不仅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需要,也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四化建设的需要。

1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依法做出宣判,判处罪大恶极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其它主犯也分别判刑,给予法律制裁。

1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近几年来,它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

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经常和系统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言论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中央指出,对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等工作,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认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一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2月中旬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部分领导人以及其它部门的负责人听取了云南省和省人民政府负责人关于当前云南民族工作情况的汇报。经过座谈会讨论,形成了汇报会纪要。7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纪要》明确指出:“党的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是,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方面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

2月24日至3月4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回顾了1980年的工作,讨论了1981年的任务。会议决议强调,各级纪律检查部门应当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邓颖超于2月24日向会议作了《坚定不移地搞好党风》的讲话。指出:纠正不正之风,反对官僚主义要从每一个领导干部、每一个党员自身做起,决不能只是空喊。她要求各级干部警惕那些吹喇叭、抬轿子、阿谀奉承的人,并说使抬轿子的人没有市场的关键在于坐轿子的人。她还强调反对官僚主义问题,她说,最普遍、最严重的一种官僚主义作风就是四个字:压、推、拖、了。她要求各级党委,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工作质量,讲究工作效率。

5月8日 陈云在发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一届六中

全会与会者的阅读文件中,就提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提出几项建议。他指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我党现在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党内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最后被迫仓促地提拔一些很不适当的中青年干部。这是对党的事业很不利的。另一种是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也是应该努力去做的。

5月29日至6月8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会议指出,职工代表大会制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项根本制度,是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据初步统计,全国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的企业单位已有3.6万余个。其中,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大中型企业已有90%建立了这种制度。7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并通知要求各地,要有准备地、切实地把国营工业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起来,还指出,改革企业领导制度的内容是: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加强和改善党对企业的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发扬职工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实行民主管理,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由厂长(经理)负责统一指挥。

6月22日 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上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问题。他说,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会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

6月27至29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

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为这条道路初步总结出了10条内容。决议还正确地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中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决议》的通过是六中全会最伟大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胜利完成。六中全会并顺理成章地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

7月1日 首都党政军机关和各界群众代表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要完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关键就在于我们党。他还就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的核心这一重大问题提出：1. 我们全体党员，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不顾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 我们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3.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4. 我们要善于经常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在执政条件下永葆革命青春；5. 我们要把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选拔到

各级领导岗位上来；6. 我们要坚持国际主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7月17日 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人谈话，肯定了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有显著成绩。同时严肃指出，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这种状况必须克服。他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自由化，搞无政府主义。”其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于8月3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上，传达讨论了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谈话，强调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要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

7月2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领导同志在国内侨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这个座谈会是5月31日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胡耀邦、李先念、乌兰夫、薄一波、韦国清、方毅、廖承志等参加会议并讲话。《讲话要点》指出：对华侨工作，要使我们全党在根本方针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就是：保护和发扬侨胞爱祖国、爱故乡的热情。哪个地方挫伤或压制侨胞的爱国爱乡热情，都是错误的，是违犯党的政策的，是同中央的方针相违背的。要提倡爱国一家，一视同仁。我们侨务工作的旗帜就是爱国主义。

7月30日 胡耀邦会见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政治局委员苏莱曼时谈话说，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取得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是：一个革命政党，一个革命的军队，在掌握了政权之后，最重要的是把国家的经济搞好，让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得到利益。我们一个失败的教训就是没有把经济搞好。这几年情况好一点，

这是因为经济搞得好一些，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是灵魂。

8月3日至8日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会议讨论了邓小平7月17日同中央宣传部门领导人的谈话。胡耀邦和胡乔木在会上讲了话。胡耀邦讲话强调要改变思想战线上领导的软弱状态，使之变得统一坚强，需要正确地对待历史经验，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增强团结，改进工作。胡乔木讲话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以否认和反对党的领导为核心。8月11至14日，中共中央先后转发邓小平、胡耀邦和胡乔木的讲话。并在转发时批示指出：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要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恰当的斗争。

8月25日 胡耀邦在会见马里人民民主同盟总书记穆萨·特拉奥雷时说，这几年来我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党在执政后特别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同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县以上党委常委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以外，同时要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生活会要以认真检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准则》的情况为主要内容，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应把健全组织生活作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抓。

8月26日 邓小平在与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谈话时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政策，他说，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他还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原有的

制度、生活方式。

9月9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建设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国人民的生活只能逐步改善。如果我们不强调道德、风尚，不重视精神文明，没有远大理想，只是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那就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在谈到农业生产负责制时，他又说，实行生产责任制不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所有制。这种责任制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也是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

9月30日 叶剑英向新华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提出9项具体建议，核心是建议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还建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予改变。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载明的关于国家统一问题的原则立场，至此已经完全具体化。它表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决策，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所谓“统战攻势”。

10月4日 胡耀邦在接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时说，我国当前有两项政治任务，一个叫大统一，台湾回归祖国；一个叫大团结，任何时候也不要忘了加强民族团结。

10月9日 首都各界人士隆重集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胡耀邦在会上讲话指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民族的一切革命者。对于孙中山的崇敬和怀念，至今仍然是把中国大陆和台湾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的精神纽带。胡耀邦还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分向蒋经国等人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回大陆和故乡看看。他说：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现

在为什么不可以为建设统一的国家而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呢？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屈武和民主建国会领导人胡厥文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11月2日 胡耀邦在辽宁省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几十年来我们党吃了大亏，就在于对情况没有吃透，目前调查研究少是一个通病。有一些调查是不可靠的，有的统计是一级一级报上来的，一级一级就相信，这样不会有正确的判断。他要求，任何一级领导都需要亲自搞调查研究。他还说，把国民经济和精神文明搞上去，这是我们的战略思想。精神文明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党要有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最好的党风。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有打不垮、拆不散、相依为命、亲密互助的民族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工农关系、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第三个方面，我们国家既要有高度的民主生活，又要有严格的纪律和社会秩序。第四个方面，要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有优美的环境和清洁卫生。这四个方面要经常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1982年

1月10日 《刘少奇选集》上卷在全国发行。选集收入了刘少奇建国以前最重要的讲话、文章、书信和电报等38篇。

1月11日 中共中央就广东省一些干部中存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发出《紧急通知》。中共中央指出，对一些干部甚至一些负责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制裁。中共中央还派出数名领导干部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地，传达中央常委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活动。

同日 邓小平在与来访客人谈话中,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第一次把中共中央的设想概括为“一国两制”。他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指以叶剑英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一事)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指台湾)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上也是这几条。”这标志中国共产党用“一国两制”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基本形成。

1月11、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亡党亡国。他还说,这一次精简机构,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1月19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讲话印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随即开始进行。

1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务使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在1982年内有个明显的好转。并指出,要加强基层工作和基础工作:农村一般应当以区、公社(乡)或集镇为中心,逐步建立公安派出所和设置司法助理员,县以上逐步建立法律顾问处和公证处;要扩大、充实、整顿和提高政法队伍,主要来源是从大专和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合格人才,从转业军人和基本建设队伍中挑选合格干部、战士和职工,动员有法律知识的人员尽量归队。

1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几年,要求出国出境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不少人去而不归,这个情况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中央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归侨政策,进一步消除党内和社会上对他们的偏见。《通知》提出,对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是否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并取得成果,应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和单位领导工作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在上半年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切实研究制定改进措施,力争在短期内作出成绩。

2月12日 中共中央转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这次会议是1981年12月21日召开,到1982年1月6日结束的。会议着重讨论了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这次会议的《纪要》。《纪要》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的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各级领导,逐步清除“左”的影响,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成绩显著。3年来,我国八个民主党派共发展成员35000余人,现共有700多个地方组织,4000多个基层支部,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会议并明确了今后统战工作的任务。

2月18日 邓小在北京会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体制改革工作,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 and 政策的连续性。现在我们正在搞体制改革,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消除。干部老化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晚一年解决这个问题,干部就又多了一岁。

2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从革命事业要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战略角度阐明了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必要性。并强调要大胆地提拔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从而以对于干部制度的深刻改革，来保障新老干部的顺利交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2月25日 邓小平在会见摩洛哥王国首相马蒂·布阿比德时说，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主要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吸收我们有用的资金。但是贪污、行贿、走私等坏东西、腐朽的东西决不能引进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会随之而来。问题是要清除这些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甚至实行严厉的法律制裁。在反对这些坏东西的同时，我们要提倡精神文明，教育我们的后代要有理想，讲道德，守纪律、有礼貌，要艰苦奋斗。每个人要有爱国主义精神，要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

3月8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京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报告》阐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介绍了进展的情况。《报告》提出减少副总理，设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的13位副总理，拟减为2人。现有的98个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将裁减合并为52个。国务院和各部、委机构精简之后，工作人员编制约3.2万人，比原有的4.9万将减少1/3左右。其后，国务院即对这一方案进行了组织实施。

4月10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时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四项必要的保证：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纪律，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他还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

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5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机构改革、配备领导班子的工作进展顺利。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中共中央有30个直属单位，各单位按照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指示，经过定任务、定机构、定编制，局级机构减少了11%；处级机构减少了10%；总编制减少了17.3%。部委级的领导班子除了需要经过选举产生和一些单位正在酝酿研究外，正副职都严格按照3至5人配备，共减少了15.7%，平均年龄由原来的64岁降到60岁。局级机构正副职一般设2至3人，减少了14%，平均年龄由原来的58岁降到54岁。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在新配备的领导班子中，部级占13%，局级占16%，部局两级领导班子的文化水平都有所提高。

7月10至24日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政法系统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会议，共有400余人参加。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会议强调指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规定了当前政法工作的各项具体任务。8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的纪要和彭真讲话的要点。

7月24日 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用电报发往台北。信中希望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竞祖国统一大业。26日至31日，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界人士及港澳同胞、华侨纷纷座谈，切盼蒋经国捐弃前嫌，依时顺势，择善而从，共图振兴中华大业。

7月26日 邓小平对“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发表意见。邓小平说，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现在资金太散。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

后落实到集中统一。中央下了决心，地方会接受的，行得通的。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怎么能把现有的500万知识分子用起来？需要一套办法。人才，只有大胆起用，才能培养起来。我们的企业要想办法给“明白人”开一条路出来，让这些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起来，不要老把这些人才卡住。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规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六五”计划就是这样子了，定下来，以后要聚精会神搞长远计划，关键是要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的关键，又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大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煤、电、油项目的前期工作要抓紧，尽快做在前面。要搞出规划的进度时间表，这样抓紧，才能赶上计划的需要。企业的技术改造计划要专门搞。总之，一个是长远规划，一个是重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一个是企业的技术改造规划，一个是知识分子使用规划，要认真抓紧进行。

7月30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

同日 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党的干部交接班的问题历来是党的一件大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严重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我们现在主动地有意识地来进行这项工作，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他还就提拔青年干部谈了两点意见：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是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8月6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前召

开了预备会议,对十一届七中全会的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七中全会决定,9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提交十二大审议。

8月24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法制建设近几年来取得了可喜成绩,到目前为止,中国已颁发了约300个新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其中近250个是经济法规。目前全国政法工作人员100多万,有2000多个法律顾问处,有律师近1万名。全国还有4个政法院校和22个大学法律系或专业,每年可为国家培养4000名左右专业法律工作者。

9月1至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名,候补代表145名,代表着3900万多名党员。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提出,它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宣告自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的历史性的转变已经胜利实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二大批准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总任务,并按照邓小平“核心是经济建设”,“是解决

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的思想,把继续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十二大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提出在本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大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社会主义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要用革命的思想 and 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大会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些理论和任务的提出,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构成、充实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

经 济

1 9 7 9 年

1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规定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保护,不允许无偿占用和调用;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

要补充,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文件还强调加强党和国家对农业的领导,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和技术装备的支援,规定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 25 项政策措施(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

1 月 四川、云南和广东等地的部分社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四川广汉县农村普遍推广了“以产定工,超产奖励”的办法。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在全州推广了包产到组(作业组)。广东省的社队普遍推行“五定一奖”的经营管理制度,给生产队的作业组规定产量任务,在管理上实行责任制,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同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队 18 个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偷偷”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他们在一张纸上按了红指印,发誓:“哪个因大包干进大牢,全村养活他一家。”邻村得知后,也模仿着悄悄干起了大包干。6 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我国农村一场深刻的革命就此开始,亿万农民群众蕴藏着的长期受到束缚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迸发出来。它表明,自农村开始的,三中全会所开创的改革事业,从一开始就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解放。

2 月 15 日 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宝安、珠海两县规划设想,决定从国家预算内拨款投资 1.5 亿元,在两县设立外贸基地。

3 月 1 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 3 月份起,陆续提高粮、棉、油、猪等 18 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按此规定,1979 年全国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总指数平均提高 22.1%;由于提价,当年农民收入增加 108 亿元。

3 月 21 至 23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议题是讨论 1979 年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陈云讲话指出:我国 9 亿多人口,80%在农村。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从这种国情出发。他还强调,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不能认为指

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下来是修正主义。现在的比例失调，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要有两三年，最好三年时间调整。邓小平讲话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过去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这次会议，是在经济建设上冲破左倾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一次会议。它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形成“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

4月5日至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分析了当时经济战线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的必要性、重大意义和方针任务。会议针对在左倾指导思想影响下，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同时，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会议对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措施表示同意，并通过了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 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关于吸引海外资金发展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时讲：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

7月13日 国务院下达《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在少数国营工业、交通企业组织试点。这5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对

经营有盈余的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在增加盈利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对企业实行固定资产有偿占用制度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制度；为了鼓励企业发展新产品，有关新产品的费用（增添设备等措施所需的费用除外）可以规定一定比例，从企业实现的利润中留用。还规定，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条件可以制定补充计划，产品可以自行承担协作任务和进料加工；企业有权向主管部门申请出口自己的商品，并按规定取得外汇分成；有权按国家劳动计划指标择优录用职工；有权决定自己的机构设置，任免中层和中层以下的干部；有权对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实行有偿转让或出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企业摊派各种费用，不经批准，不准随便向企业抽调人员、设备、材料和资金。5个文件下发后，在国务院统一布置下，截止到这一年年底相继有3000多个企业进行了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是改革我国企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把生产搞活起了积极的作用。据对四川、北京、上海等22个省、市、自治区2963个试点企业的统计，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实现利润增长20%，上缴利润增长13.4%，超过了试点前的水平。

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财政管理体制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办法；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地划出部分地区搞试点。中央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决策，对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

8月7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安徽省委决定，在部分工厂试行从利润中提取奖金的办法。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指出：发奖金与革命献身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应该用经济办法推动经济发展，重新认识奖金的作用，纠正了我们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8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当时，全国急待安排就业人员800多万人，其中城市知识青年约占57%。北京市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广开就业门路，大力组织集体所有制和各种生产服务事业，解决了一部分青年就业问题。北京市的经验转发以后，全国各地大小城镇参照北京市的经验，广开就业门路，到当年底全国共安置了902.6万人就业（包括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其中城镇新安排的就业人员就达800万人。

9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决定从11月1日起，对部分农副产品提价，同时对职工实行物价补贴，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中共中央在有关调资的《通知》中指出，中央、国务院强调，调整职工工资，一定要和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按照劳动态度，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进行考核，并以贡献大小作为主要考核依据，择优升级，以各行各业生产好的工人和工作好的干部作为这次升级的重点，坚决反对平均主义。

11月26日 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了应邀访华的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兼副总裁弗·吉布尼等一行。会见中，邓小平同志就计划和市场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是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方针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国家所有制，都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

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会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与这些问题有关。把这个当作方法,它不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因为不产生剥削。归根到底,不产生剥削阶级。用这种方法为社会增加的财富归社会所有,归全民所有。”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层中以肯定的、断然的语气讲采纳市场经济方法必要性的最早的声音。

1980年

3月4至15日 外经部召开全国对外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今后仍然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援外八项原则,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

3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指示》说,目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2.7%,在全世界占第120位。到本世纪末,要力争达到20%。为完成上述任务,要坚持贯彻依靠社队集体造林为主、积极发展国营造林,并鼓励社员个人植树的方针。

3月8至20日 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书记处成员的分工。3月27日,经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央发出通知,赵紫阳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负责书记处全盘工作。

4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文章指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即包产到户)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一种形式,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包产的个人岗位责任制。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是1977年秋从安徽、四川开始的(更早的1961年安徽省委就曾支持过一部分农村社队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仅3个月左右,安徽全省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生产队就发展到4.1万多个,约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15.2%。与此同时,四川省委在农业政策上,也实行了“放宽政策”、“休养

生息”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占总耕地面积的 15% 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组织生产。这是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

5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中共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两省在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次会议总结的经验和提出的措施是可行的，要认真贯彻落实。

7 月 21 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去年开始的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 6600 多个，占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 16%，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上述企业总产值和利润的 60% 和 70%。这些企业今年上半年一般都实现了增产增收。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8 月 2 至 7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解决劳动就业的根本途径，这就是：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实行在政府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就业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会议强调：在今后几年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时，要大力发展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适当发展不剥削他人的个体经济，发展服务业，建筑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8 月 17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议定的文件《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

8 月 21 至 26 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准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定：1. 特区鼓励外资到境内投资设厂或与我方合资设厂开办企业，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和应得利润。2. 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给以减免税方面的优惠。3. 特区企业用工其手续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办理。4. 设立广

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对特区实行统一管理。5. 客商用地,按实际需要²提供收费给予优惠。这一条例的批准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就此诞生,特区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

9月14至22日 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系统地总结了党在农业经济工作上的经验教训,全面清理“左”的错误。9月27日,中央印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指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村的形势越来越好;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9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强调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号召,并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10月27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各地过去和现在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视察准备的住房(包括住过的未住过的),一律开放,做招待所。

11月16日至12月21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是大好的,但是有潜在的危险,必须下决心狠抓调整,关键在压缩基本建设,适当控制消费,搞好关停并转,根本改变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为今后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再走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而要走另一条速度不那么高,但国民收入、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的路子。

12月16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邓小平在12月25日所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第一次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概括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他肯定这几年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提出要把改革、搞活、开放的方针坚持贯彻下去。会议充分肯定了建国31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形势;同时主要对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后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左倾主体错误作了分析,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方针。会议要求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坚决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以进一步加强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会议的这些决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对于从现实国情出发,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1981年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传达、学习、坚决贯彻执行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认识,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去克服困难,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务院各部委派出400多个组、2241人到基层调查,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协助解决经济调整中和当前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3月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多种

经营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提出，发展中国的农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因地种植，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逐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除了抓紧粮食生产外，还要十分重视发展多种经营。要争取用二三十年时间，把我国的农业结构和粮食结构逐步改变过来。调整农业的步子要稳，不可太猛，但看准了方向，就要坚定地逐步走下去。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报告还明确规定可以因地制宜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社员自留地是家庭副业的一个重要阵地。这是繁荣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顶战略方针。

3月12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全国工业管理改革体制座谈会最近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在经济调整时期，如何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对现有工交企业进行改革和联合等问题。两年来，全国已有1.93万多个工业企业，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组成了1900多个专业公司。

5月4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当前社队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发展中存在着盲目性，对发挥经济效益和充分利用资源注意不够；在利润使用上，生产队和社员直接得到的经济利益偏少；还有不少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不正之风比较严重。规定强调社队企业必须从宏观经济的要求出发，根据社队企业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和整顿。

7月3日 《人民日报》报道，最近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重要意见：关于国土保护问题，不能光是停留在城市的环境保护、三废治理这些问题上，要考虑中国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的保护问题，应当有全局安排。要求国家建委同国家农委配合，搞好国土整治。

7月6至15日 国务院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8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批语指出: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以后,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种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各级领导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决打击走私、贩私活动。

7月7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规定了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经营范围及如何扶持与保护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等问题。在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个体经济发展很快,到1981年底,全国城镇个体经营者已有83万户,共113万人。这对搞活经济、繁荣市场、安排就业和缓解群众的生活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7月19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并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由国务院于5月27日至6月14日召开,着重讨论了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和有关经济特区的一些问题。《纪要》强调要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继续推进两省经济体制改革。并明确了建设特区的一系列措施。

10月5至21日 农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新形势、新问题。总结交流了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问题。会议强调,要加强对各种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领导,思想要解放,步子要稳妥,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尊重群众的意愿,按照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宜统则统,宜包则包,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强求一种模式,坚持责任制长期不变,坚持集体方向长期不变。

10月1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城镇青年就业是搞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三年来,经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

力,全国共安排了 600 万人就业,对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促进安定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以便进一步解决城乡青年的就业问题。

10月29日 国务院就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出《通知》。《通知》肯定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强调这种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经营管理制度,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要加强领导,摸着石头过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82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 1981 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全国农村已有 90% 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要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兼顾。《纪要》还指出:落实党在农村的一切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都必须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包括党的组织、政权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团体。要把社队的领导班子搞好,使生产队把应负的经济职能和政权职能担当起来,注意精简人员,减轻群众负担,逐步建立各级干部的岗位责任制。

1月2日 中共中央颁发《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这一条例和已经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以及即将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国营工业企业共同遵守的根本原则是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

1月13日 国务院决定对各省、市、自治区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不变的办法。

1月14日 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发言。他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 and 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他还着重谈到:1. 为了有效地吸引国外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起上,当前以中小为主。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要有胆有识地放手地干,又要谨慎。2. 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路子要宽广,不要理解得太狭窄。向科学要本领,拜行家作老师,这两句话应当成为一个行动口号。3. 面向全世界,积极发展国际劳务合作。4. 正确认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要服从政治的提法不全面。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对外国一切先进科学文化和经营管理知识,一定要努力学习和钻研;而对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一定要坚决抵制。

1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贸易座谈会纪要》时,发出通知指出: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在新形势下,要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1月21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下达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的通知》,并转发了国家计委《关于下达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数字的汇报要点》和《1981年至198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控制数字》。国家计委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汇报要点》中指出,今后20年

我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1. 把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作为考虑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2. 要围绕发展消费品生产来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使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保证整个社会生产持续稳定地增长。3. 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积极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在战略部署上，今后 20 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 10 年主要是为后 10 年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前 10 年又可分为两段，“六五”要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七五”要继续完成经济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全面推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更广泛地进行技术改造，并逐步以较多的资金用于农业、能源、交通和智力开发的建设，用于环境保护的建设。《要点》还提出“六五”期间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计划上都定为 4%，在执行中力争超过。

2 月 11 至 13 日 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决定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3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

2 月 20 日至 3 月 4 日 全国工业交通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分期分批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整顿企业的目的是把各项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4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5 月 31 日，万里在中纪委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各单位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认真开展起来。随后中纪委又派出司局级以上干

部 154 名,分赴各地充实、加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工作。到年底,据初步统计,全国揭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有 16.4 万余件,已结案 8.6 万多件,依法判刑的 3 万人,追缴赃款赃物价值 3.2 亿余元,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8 月 14 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社队企业进一步得到发展。1981 年中国社队企业总收入为 670.36 亿元,固定资产 375 亿元,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0.8%。3 年中,全国社队企业的纯利润为 335.68 亿元,用于支援农业生产建设的达 66.09 亿元。现在全国社队企业的从业人员达 3000 万人,工资总额 130.63 亿元。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1979 年

1 月 4 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1978 年—1985 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不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考虑,不搞基础科学是不行的。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6 日 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周扬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邓小平的祝词充分肯定了我国文艺事业的成就,并指出: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任务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说,

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文艺工作者要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邓小平的祝词受到会议代表的热烈拥护，一致认为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

1980年

3月15至23日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向大会作题为《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的工作报告。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表示祝贺，并提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三项措施：1. 建立一支能够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2. 大规模地培养我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和后备队；3. 我们全党都要充分支持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大展宏图。大会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选举周培源为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主席。23日，胡耀邦在闭幕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发展科学，发展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开发人类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四个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开发。”

7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说，最近中共中央改变过去曾经提出过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出了文艺工作总的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也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起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全面、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的规律。

11月17日 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1978年—1985年全国技术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纲要》规划了三年和八年两个

阶段的奋斗目标,总的要求是:研究解决一批与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能源、激光技术以及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所需的现代化成套设备有关的技术科学问题,要在一些技术科学领域内,为解决四个现代化提出的重大课题,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作出贡献。

12月25日至1981年1月5日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是:1. 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2. 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的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的技术结构。3. 必须加强厂矿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4. 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5. 把学习、消化、吸取国外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

1981年

1月30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自学者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可以获得毕业证书和单科合格证书。中央书记处在一次指示中提出,提倡青年自学,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2月9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高通量原子反应堆,最近在西南建成,并成功地进行了高功率运行。这座反应堆的建成,标志我国反应堆工程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月28日 为响应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要求把它当作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抓好。3月,一个以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月活动,在青少年和全国人民中生动活泼地开

展起来。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军队的特点,在全军开展了“四有、三讲、两不怕”(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活动,以恢复与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培养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进一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武装力量。

5月11至21日 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团结起来,发展科学,振兴中华”的口号。大会听取和审议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所作的工作报告,制定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明确规定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19日,学部委员民主选举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经主席团推选,著名化学家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科学家代表聚集一堂,讨论、决定科学院的重大问题,民主选举科学院的领导机构。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8月1至11日 全国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学校的领导。学校党委要拿出主要时间和精力抓好思想政治工作。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同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形形色色的思潮和倾向进行斗争,努力改变软弱无力和涣散状态,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9月20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组空间物理科学试验卫星。这是中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是空间技术的又一项突破。

11月27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从今年起将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将主

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自力更生地解决四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科技和社会问题。

1982年

1月13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研制的电火箭最近首次进行空间飞行试验成功。继美、苏、日后,中国有了一种新型空间微推力火箭发动机,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进行电火箭空间飞行试验国家的行列。

1月23日 胡乔木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会议上重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50年代规定的文字改革三项任务:推广普通话;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

2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进一步阐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要求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大力提倡晚婚晚育。

2月1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报告》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

5月28日 中共中央转发4月26日至5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所形成的纪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中共中央批示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阵地,对各种错误的,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 and 行为,理直气壮地、有说服力地进行批评;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打击邪气,扶植正气,使我国的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

军 事

1979年

2月17日至3月16日 为保卫我国边境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西、云南地区边防部队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12月 人民解放军海军奉命开始重新组建海军陆战队部队,至翌年5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第1旅在海南岛某地正式成立。

1980年

3月12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他说,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我们的军队体制有很多问题,不改革不行,体制和制度问题,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

4月18日至30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贯彻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中心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加速军队现代化、革命化建设。韦国清讲话指出,把现代化革命军队搞上去,一定要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5月18日至21日 我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火箭获得成功。

1981年

1月14日至2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内容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讲话。胡耀邦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当前要抓住两个很重要的环节，第一，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第二，切实搞好我们党的作风。同时，还要研究我们党对国家领导的体制问题，制度问题。胡耀邦还把三中全会以来健全党的生活的新鲜经验总结归纳为6条：1. 今后少用党内斗争这个提法，但不是废除；2. 工作搞得不好，可以辞职；3. 犯了错误，必须调开，必须改变工作职务；但不要逼着人家写检讨；4. 不要轻易讲路线斗争，但也不是取消这个话；5. 一概不要上转下联；6. 犯了错误下去了的，经过考验确实改正了的，做出了成绩的，可以重新上来。2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胡耀邦的讲话。

3月27日 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人谈话。他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关于“三支两军”的问题，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护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

9月19日 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北京部队和空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并检阅了演习部队。邓小平在向指战员讲话时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并强调必

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82年

5月19日至28日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个中心,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改善和加强部队管理教育工作,主要是如何带好兵的问题,并确定了今后管理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即: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坚持治军从严的原则,以“五统”、“四性”为标准,进一步贯彻落实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正规的工作、生活秩序,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搞好武器装备管理,预防各种事故,增强内外团结,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提高部队战斗力。其后,在这次会议基础上形成的《连队管理教育工作若干规定》于7月20日被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印发全军付诸执行。

6月23日至7月4日 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落实中央机构精简和体制改革方针政策问题。邓小平于7月4日在会上讲话指出,部队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

7月29日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同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在京正式成立、国防科工委隶属军委建制,其工作受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该委成立后,原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即行撤销。

8月19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

决定》，并要求于 1983 年底基本完成该兵种的撤销工作。基建工程兵自 1966 年组建至 1983 年，所属冶金、煤炭、水电、建工、石油化工、公路交通、通讯等各部队，先后担负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和单项工程 132 项。累计完成的建筑安装工作量，可折合人民币 83 亿元，工业与民用建筑竣工面积达 1800 万平方米。兵种所属水文地质部队从 1974 年组建以来，共完成普查面积 224 万多平方公里，钻探工作量近 80 万米，查明了工作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资源。所属黄金部队和铀矿地质部队，每年也都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

毛泽东诗词

《水调歌头·游泳》写作背景考

张保山 沈世昌 陈书壮

1950年9月下旬,当时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周世钊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途经许昌时即兴作了一首五言律诗《过许昌》,诗曰:“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邙中王!”很显然,诗的前四句写作者的行迹和历史上许昌的萧条荒凉;诗的后四句写作者对许昌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感受。全诗借称颂邙中王曹操,热情地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创造新生活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但此诗呈送至毛泽东手中大约有六年时间,未曾见到作答。

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说:“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诉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信函中所附词作则为毛泽东1956年6月所填,即:

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对于这首气魄宏大的词作，人们一般只知道它是毛泽东畅游长江、歌颂长江巨变，抒发“不管风吹浪打”豪情壮志之作，很少有人知晓它就是周世钊《过许昌》一诗的奉和之作。

对照上述两首风格各异、心境相通的诗词，我们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毛泽东，为什么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出于党史工作者的责任感，我们经过查对历史资料，多方信函外调之后，得到的回答是：毛泽东不仅有1918年秋路过许昌的经历，而且当年还有《过魏都》的诗作传世；汉魏故都许昌作为三国文化特别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颇深。这便是作为开国元勋的毛泽东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的真正原因，当然也是鲜为人知的原因。

一、1918年那次“秋风过许昌”成为毛泽东终生难忘的经历

1952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的陪同下，到南方视察工作，路过许昌。罗瑞卿电话通知中共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请你立即赶到许昌火车站，有人要见你。”由于没有说是谁要见，纪登奎激动之中带有几分猜测。等他赶到许昌火车站时，喜出望外地看到身材魁伟的毛泽东正在站台上散步。见面之后，纪登奎便随毛泽东一同上了火车。

在许昌至驻马店的列车上，纪登奎对许昌工作有条有理的汇报，博得毛泽东的好感和赞扬。此后再见面，毛泽东称纪登奎是“老朋友”。纪登奎记得很清楚，就是在那趟南下的专列上，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许昌我早年就来过。那是建党前两三年时，我和湖南一些青年去北京，到这里因铁路坏了，临时停下，住在车站附近一个小旅店里。曾上城墙上转了一圈儿，记得许昌有很多荷花，开得很好。”毛泽东讲到这里，放慢了语气，昔日的往事唤起他难忘的回忆……

毛泽东这次北上途经许昌大约是 1918 年的八九月间。那时没有粤汉铁路，毛泽东率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罗仲言、陈绍休、罗学瓚和有志青年李富春、贺果等 20 余人，从长沙乘船到汉口，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乘上北去的列车，准备到北京会同已先期抵京的蔡和森一起向蔡元培、李石曾等接洽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当列车行驶到河南郾城时，因为郾城以北铁路被大水冲断，列车被迫停下来。于是，毛泽东等人在郾城火车站便停留了一天一夜。翌日，他们把随身携带的行李整成两三担，找几个当地人担着，向北步行 12 华里，走到孟庙火车站，再重新登车前往许昌。但由于大水的影响运行车次搞乱了，一时发不出列车，所以他们在许昌又停留下来。

至于毛泽东等人途经许昌的具体日期，我们为了有一个确凿的答案，曾于 1992 年初致信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询问。同年 3 月 2 日，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回信答复：“据查我们仅藏有罗（仲言——引者注）给他祖父一信，言他们初十在郾城住了一晚，再搭车至大石桥，步行 30 里到许昌，然后乘车（十三）至京。其它材料均未收藏。”这封珍藏 70 多年的书信告诉我们，“初十在郾城住了一晚”应是八月初十，而且按照阴历才有初几的传统说法，应是阴历八月初十。根据历法推算，1918 年阴历八月初十是阳历 9 月 14 日。第二天，毛泽东等人从郾城出发，先步行 12 华里到孟庙

车站，“再搭车到大石桥，步行 30 里到许昌”，已是 9 月 15 日下午或晚上。“然后乘车(十三)至京”这表明毛泽东一行离开许昌并前往北京的时间是 9 月 17 日。如此推断，毛泽东等人 1918 年秋天在许昌停留的具体时间是 9 月 15 日晚上和 9 月 16 日全天。在许昌停留一整天加一晚上，这就为毛泽东等人在许昌附近农村考察并且凭吊汉魏故都遗址，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这真是救国救民探索路，秋风萧萧过许昌”。32 年后的 1950 年 9 月下旬，当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吟出“秋风过许昌”之句时，无怪乎毛泽东时常记得并引起共鸣呀！

二、《水调歌头·游泳》与《过许昌》律诗的 奉和原始于联诗《过魏都》

1977 年，走过半个多世纪坎坷之路的罗仲言，调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不久，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赴京访问他，询及 1918 年秋天毛泽东等人途经许昌之事。对此，罗仲言回忆道：“毛主席和我们到(许昌)附近农村去考察了大约半天时间。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在这里等等，我们三人(指毛泽东、陈绍休、罗仲言)到许昌老城去看看。老城离许昌一二十里(实际有 30 多华里——引者注)，是三国时的魏都。曹操是毛主席心目中最喜欢的，认为最有才能的人，诗文颇佳。魏都还有一些遗迹，我们在那里徘徊很久，并作了几首诗。在游览魏都旧墟时，我们诵曹操的《短歌行》及《让县自明本志令》。观眼前景物，抚怀古今，萧条异代，激情慷慨，不能自己！乃作《过魏都》联诗一首：‘横槊赋诗意飞扬(宇)，《自明本志》好文章(润)。萧条异代西田墓(润)，铜雀荒伦落夕阳(宇)。’回来后，在许昌上车前往北京。”

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我们想方设法查找原始资料，函访当年凭吊汉魏故都遗址的当事人。由于当事人只有毛泽东、陈绍休

和罗仲言三人。其中，毛泽东主席已经逝世，陈绍休曾留学法国，也早已于1921年病故，唯一健在者就是罗仲言老人了。1993年5月上旬，我们致信罗老询问1918年毛泽东和他联诗《过魏都》的始末。5月13日，我们又致信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罗平海同志（罗仲言之子），询问此事。5月20日，罗平海遵照其父的嘱托给我们回信说：“来信收悉，前一时期家父因病住院，迟复为歉！现家父稍愈，他记得曾有此事……”

诗言志，诗亦传情。如果把毛泽东和罗仲言联诗《过魏都》同周世钊五言律诗《过许昌》的前四句相比较，诗中所表达的人物、情调、韵律何其相通相近啊！两首诗所称颂的人物，都是雄才大略、文武兼备、横槊赋诗的曹操；两首诗所流露出的感情都十分丰富，带有浓厚的苍凉悲壮的情调；两首诗不仅合拍押韵，而且还有“落夕阳”与“卧斜阳”等字词的重复。这说明，青年毛泽东和罗仲言的联诗《过魏都》很可能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早已传诵。周世钊作为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早已知道《过魏都》这首诗。因此，周世钊《过许昌》的律诗与青年毛泽东和罗仲言《过魏都》的联诗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照这样推断，周世钊《过许昌》的律诗首先是对毛泽东和罗仲言《过魏都》联诗的奉和，然后才有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对周世钊《过许昌》律诗的酬和。

与国民党谈判释放张辉瓒身历记

涂作潮^①

1930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活捉了国民党“围剿”军的前敌总指挥兼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此,当时的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也是张的亲戚的黄信宜通过关系和我党中央在上海接上了头,接头人是龚饮冰。

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翔梧作为红军代表和我(化名吴思浩)作中共代表,随黄信宜自上海前往南昌谈判释放张辉瓒事宜。我在临行前听说对方许诺的条件是,只要不杀张辉瓒,他们将使国民党朱耀华旅西去投降红军,并向红军提供弹药、钱款及药品。当时药品对红军似乎更加需要,因为大批红军伤员死于缺医少药。

供谈判用的文件,我始终未能看到。交到我们手中的是已经拍摄好的、但未显影的照片底片,用黑纸包好。因为我在苏联时,除学习过无线电通讯外,也由红军情报局进行过爆破、驾车、摄影、暗杀等培训(我刚入东方大学时,教官听说我在五卅运动后用手枪在上海打伤过工贼,就给我起了个俄国名字,叫沃罗达尔斯基,历史上的沃氏是二月革命党人,因行刺沙皇而出名)。这样,需

^① 涂作潮(1903—1984)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24年入党。1925年参与发动“五卅”反帝革命运动,同年11月受党派遣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工人班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党中央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工作。本文系根据他自传中的一段回忆整理而成。

要时我们就可以将拍有文件的底片显影出来指导谈判。龚将我二人引见给黄信宜后，即由黄陪同李翔梧和我在龙华乘他带来的水上飞机飞往南昌。我们飞抵南昌，下了水上飞机又乘上来接人的船，在船即将靠岸时，来接我们三人的人对黄说了句半吊子的话“回来了……”，便不再有别的话。

黄信宜将我二人在旅店安顿下后说，我有事先走一会儿，回来后今晚陪你们吃饭、看电影、洗澡。

黄走后，李翔梧在街上买了份晚报，上面的消息是，张辉瓒首级已随赣江漂至吉安，还说是绑在一块门板上漂过去的。看来，我们已经不可能按原计划去吉安了。

我问李说，怎么办？李说，逃呀。别人都人头落地了；我们在人家手中，人家怎么处置我们都有可能。我又问，假定不走，分析看看？李说，我们不是叛党；再说张辉瓒已经死了，谈判已无基础，我们的任务已不存在了。从国民党掌握中逃脱也算不得违背中央命令。时不容缓，马上行事。

我们将拍有谈判文件的照片底片曝光销毁后，决计向东逃脱。我们当时身着国民党军装，又背着照相机，在经过一个飞机场时，站岗的士兵还向我们敬礼致意哩。

出了机场，我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乡村小路中跑。李是近视，夜间行走困难。他拉着我，说我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吧，今天只有闯了。

跑着跑着我们发现前面有国民党军队，几乎是山穷水尽了。突然又发现有火光，李说，我们孤注一掷了。结果发现是老百姓在盖房子，烤火取暖。这个村子只有卫姓，好客。其中一个中农模样的人叫卫朝鹏，在留我们吃饭住宿时，相信了我们是开小差的国民党军官后，问我们去哪里。他是个小生意人，颇有江湖义气。

我们说，希望从九江坐船去上海。卫说这万万不行。他承诺帮我们到上海，他自己也顺便做趟买卖。他的方案是多吃些苦，走小

路，走景德镇、祁门、青江、长沙、上海这条路。当他置办好土产等货物并为我们买到一些伪装用的衣物后我们就上路了。

这年旧历年的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的样子，我们乘小木船到了鄱阳。卫要我们摆出些架子，他以佣人身份去应付。果然，在经过饶州时，这个办法就用上了。沿途住小店时，他弄洗脚水等，装得真像佣人一样。

我们三人于1931年2月初终于到了上海，住新鹿鸣旅馆。期间，顾顺章来看过我们。卫和我们在上海拜了把兄弟，换了红帖，我当时的姓名是宋友才。为了感谢卫先生的帮助，李强还买了批绸缎等送给了他。

党中央对于我们自南昌脱逃一事，后来表示完全同意。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是：那次逃脱不应该走小城市，因为麻烦多，小地方的人吃不准我们是什么人，反而容易暴露。

对李志民回忆录《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几点补充意见

陈 鹤 桥

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第7、第8和第11辑的李志民同志的回忆录《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反映了抗大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段历史，有很丰富的材料，对于学习和发扬抗大精神，研究抗大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李志民同志是从抗大第三期起入抗大先当学员后当干部，只参加了抗大第三至第五期的工作。1939年冬，抗大转移至敌后，志民同志就留在晋察冀二分校工作；抗大总校则自1940年1月起移到太行山，在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又办了第六至第八期。这一时期，抗大在艰苦的敌后环境中一面战斗一面办校，并先后在各大战略区办起了一些分校。1942年，在日伪军对我太行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过后，中央于这年冬又决定抗大转移回陕北办学。由于，志民同志只经历了抗大第三至第五期的工作，故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些错漏之处。我自己从1937年到1943年一直在抗大工作（第三期至第八期），从机关到大队都工作、学习过。这里，我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对志民同志回忆录中若干不准确或遗漏之处提出几点补充意见。

由于李志民同志的回忆录分别登载于三辑《中共党史资料》上，以下我在提出自己的补充意见时不再逐条提该回忆录的名称，而只就载于《中共党史资料》某辑某页的说法谈出我的意见。

一、《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第43页第2段说，抗大第一大队是军事大队，第二大队是政治大队，这是对的。政治大队大队长是

苏振华,大队政治协理员是穰明德(现在长沙)。而该回忆录说协理员是王赤军显然是记忆有误。回忆录还说第三期政治大队只有四队、六队,没有五队这也是错的。政治大队是四、五、六三个队,到1938年春因新生来得多,成立了一些新的学生队,便以五、六队学员中调出不少红军干部去学员队大队部和校部机关工作,我就是1938年3月调到校部当秘书的。这时五、六两队人少了就合并成一个队,还叫六队,并从一大队调来郭林祥同志当合并后的六队队长。

二、《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第44页第1段说六队学员中有6个红军女干部。我是六队的学员,我只记得有林月琴、汪荣华两同志是红军女干部。六队女生中还有刘亚楼的前妻袁凌猗、有张如心的妻子(名字记不得了)、有林彪当时的妻子刘醒民,这几个都不是红军干部。说六队中红军女干部还有李贞、蹇光任、王长德、冯明英等人也属记忆有误。因为我从开学到翌年3月离开,半年左右在六队都没有这几位,她们可能在别的队。我是六队党支部委员兼管救亡室工作,经常找六队几位女同志一起组织编墙报等事,所以特别熟悉。最近我问了林月琴同志,她也说李贞等4人当时不在六队。

三、《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第128页第1段说史紫千烈士是抗大第八期附设之陆军中学的校长,此说不确。据我回忆史紫千只是副校长,当时陆军中学校长是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兼任的。

四、《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第128页第3段说升任张际春为抗大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但据我的记忆是1942年8月滕代远调走后,军委同时任命教育长何长工升任副校长,张际春由政治部主任升任副政委兼主任。我没有听到过传达张升任抗大政委的命令。此外,1979年1月24日,中央在北京为张际春同志召开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中,韦国清宣读的悼词中说张际春任抗大政治

部主任。我手中还有两份张际春同志在 1968 年亲笔写的他的历史经历,也都写的是他在抗大任政治部主任。但我的确记得他任过抗大副政委,最近我看到张际春的秘书王宗伯写的张际春的小传(可能在《解放军将领传》一书上),王宗伯写的张在抗大担任过“代理”政治委员,既然际春同志当过副政委、代理政委,他自己为什么不写,我想可能是他认为只当了几个月就调到北方局了。因而没有写出来。至于际春同志是否当过抗大政委,只有靠《中央档案》才能查明白。

五、《中共党史资料》第 7 辑第 130 页第 3 段说抗大陆中“暂时留在浆水镇继续进行教学外”,此说法不确切。后李志民同志在登载于《中共党史资料》第 8 辑第 170 页第 1 段自己的回忆录中已更正为“抗大总校迁回陕甘宁边区时,陆军中学仍留在浆水镇,改为太行陆军中学,直属一二九师领导。”此说符合于当时的历史事实。

六、《中共党史资料》第 8 辑第 170 页第 1 段说“成立了附属陆军中学,由滕代远同志兼校长(后为任白戈同志),史紫千同志任副校长,陈鹤桥同志任政治委员。”此说亦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实际是抗大附设陆军中学于 1942 年创办时,系由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兼任陆中校长,史紫千为副校长,徐兴华为政治处主任(因为滕兼任校长,陆中未设政治委员)。陆中于是年 5 月 1 日开学后不久,即遇到日寇开始大“扫荡”。到七八月间,因陆中的兼校长滕代远调去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陆中副校长史紫千又在反“扫荡”中牺牲,抗大总校首长这时才决定任命校部政教科长任白戈任陆中校长,同时任命抗大上千科政治处主任陈鹤桥为陆中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七、《中共党史资料》第 8 辑第 171 页第 2 段讲到太行、太岳和冀鲁豫三个军区都成立了陆军中学,但却漏提了冀南军区也成立了陆中。实际上冀南军区也于 1942 年在河北元氏县成立起一

所陆军中学。由冀南军区司令陈再道兼校长，副校长是王波（后为石惠轩）。冀南陆中招收学员 400 余人共编五个队。1943 年初，冀南军区敌我斗争形势紧张，冀南陆中奉 129 师首长命令开到太行山区轮训。该陆中于当年 4 月到达太行山后，一二九师首长决定将一部分学员划归抗大六分校，并将其余 100 余名青年学员合并到太行陆中。这部分学员划归到太行陆中后，除少数学生编入三队、四队，还单独编了一个第七队。

八、以上是我对登载于《中共党史资料》上李志民同志回忆录的补充和订正，李志民同志这篇回忆录后来单独成书，这就是 1986 年 3 月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熔炉》一书，在这本书中该回忆录的内容也略作充实，但后充实的部分亦有不准确之处，这里我也一并作些补充，以便读者充分了解这段历史。

（一）在《革命熔炉》一书的第 319 页中提到了张际春同志在抗大一次联欢会即兴吟诵的一首灯谜诗，这首诗共 4 句，第一句都暗含了一名抗大学员的名字，即白路、赤茜（即罗瑞卿同志夫人郝治平）、沙旅和胡家，但在《革命熔炉》一书中，这首灯谜诗 4 句有 3 句写错了，如第一句原话是“瑞雪铺满道”，该书写成“雪花铺远道”。这一句的谜底是政治部女干部白璐。意思是下了瑞雪，把门前近处的道路都铺满了，成了白路了。而“雪花铺远道”，如是“远道”被雪盖住了，就是一片皆白，不可能看出那里是路了。

第二句是“晚霞照野溪”，该书写成“红霞照野西”，谜底是指女生队的政指赤茜，谜语诗中用晚霞表示赤色，显示了赤茜的赤字，用红霞的红字来表示赤字就太明显了，而“照野溪”三字是指晚霞照到山野小溪边一种开黄花的草本花，这个花叫茜。而“红霞照野西”，这野西就说不清是什么意思了。

第三句是“朔方漫游去”，是指政治部的干部沙旅意思是到朔方有沙漠地方去旅游。而书上写成“朔风漫游去”。朔风是指朔北、朔方的风，不是指地方或地区，怎能随着朔风去漫游呢。

第四句是“何处把身栖”，这句是对的，是指政治部干事胡家。这四句话，当时在抗大很多干部都很喜欢念。认为既风雅又有趣。不少同志都记得，可惜书上把它写的既不像诗，更不成谜语了。

(二)在《革命熔炉》一书的第324页中写太行陆中第四队的政指、队长都是在1942年5月大“扫荡”中牺牲的，这里在时间上有误。事实是1942年5月反“扫荡”中，四队队长王希珍带领部分学员在河北赞皇县五指山中遇到敌人搜山，王希珍为掩护学生而英勇牺牲。四队政指杜敬农的牺牲则是在第二年即1943年5月的反“扫荡”中。当时他正率领部分学员在山西和顺县境内转战，当遭遇到“扫荡”之敌时，杜敬农是为掩护年龄小的学生突围，只身与敌人搏斗而英勇牺牲的。1943年反“扫荡”后，我在四队亲自主持了为杜敬农等同志召开的追悼大会，所以记得十分清楚，而四队队长牺牲是在1942年，那时我还未到陆中工作。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